

红旗增刊

HONGQI ZENGKAN

一九六四年 第 1 号



红旗

增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一号 ★

目 录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

——新西兰共产党的坚定立场

.....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维·乔·威尔科克斯 (1)

马来亚人民的经历驳斥了

修正主义者的谬论《马来亚箴言》月刊 (42)

☆ 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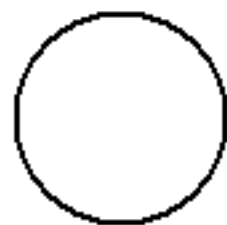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

——新西兰共产党的坚定立场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維·乔·威尔科克斯

序 言



这是一本关于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的小册子。由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两个重要的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文件——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党声明——的解释存在着某些分歧，所以有必要发行这本小册子。这两个宝贵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才产生的。它们一般地指出了朝着可靠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前进的道路。

新西兰共产党认为这两个文件具有重大的价值，它在这两个文件的进一步的帮助下发展了党纲——这就是我们拿到工作场所、拿到工厂和地方上去的那个纲领，也就是政府不让我们在电台和电视节目提出的那个纲领，在上次大选中资产阶级报纸实行封锁而不予报道的那个纲领。

那么，为什么会在对这两个文件的解释问题上产生这些分歧呢？我们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我们的看法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根据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知和领会得出来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匆匆忙忙地得出来的，而是在对现在可以得到的越来越多的有关整个问题的材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来的。

我们始终努力保持客观的态度，避免发表某些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所耽迷的主观的激烈言论。我们的确曾希望这些分歧能在各国共产党的大家庭内部得到解决，而不要变成公开辩论的问题。如果过去在最初阶段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现在也就不需要发表这本小册子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将在以后加以说明——我们早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就向有关各方面提出的解决办法并没有被采纳。资产阶级宣传机器抓住了这些分歧，加以歪曲和扩大，把它们作为阻挠全世界人民向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愈来愈强大的进军的一种办法。它们把这些分歧看作是有助于支撑它们垂死的帝国主义世界的某种东西。

所有这一切，你们想必已经从电台广播中听到过了，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了，从我国的



资产阶级报纸上、从《真相报》以及其他这一类的出版物上读过了。有人指责新西兰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工具，并且赞成把世界核战争作为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手段。

由于这一切，有必要使凡是愿意了解新西兰共产党看法的人，都能够通过我们自己所阐述的来了解，而不是通过那些一向不仅激烈地反对共产党人而且还激烈地反对一切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和进步人士的人们所说的来了解。

这就是写这本小册子的原因。

分歧同每一个人都有关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可能会认为这与你毫不相干。也许你对于什么叫“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不管是不是这样，事实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的确是与你有关的。它同一切要求和平和进步的善良的人都有关系。争论中的那些问题将决定：我们是不是继续前进，通过消灭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来建立世界和平的可靠基础；新获得解放的前殖民地国家是不是继续前进，走向社会主义，不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在把帝国主义从前门赶走以后，新殖民主义是不是会从后门再进来。

在新西兰，这场争论中用了许许多多深奥的字眼和论证，它们涉及通过“和平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涉及人民群众在“核世界”中是否仍然是决定性因素，或者说时间的因素是否已经使“领袖们”处于支配地位；还涉及帝国主义没落的时代里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的性质；涉及议会在这个“新时代”里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这是早在我们本国的劳工运动初期就存在的问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很久，在核时代来到之前很久，就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在较早的时期，新西兰工党抛弃它原有的不多的马克思主义成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渐进的不可避免性”（费边主义者曾经使用的术语）上面，寄托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上面，寄托在“通过立法实现”社会主义上面。在这种过程中，除了在选举日拿铅笔写选票以外，人民群众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今天，在数届工党政府执政以后，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实现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大企业、垄断资本一天比一天更加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

在工业方面，在旧“赤色”劳工联合会于一九一三年衰落以后，劳工运动接受了劳资调解和仲裁就是前进的道路这种观念。他们指望资产阶级的国家能“公平对待”工人。归根结蒂，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唯一的真正的武器——不付出劳动力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当时被多数人抛弃了。

历史正在证明，这种态度是多么错误。工人们正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工人在对付垄断资本时，都不得不使用他们最后的武器。我们发现，已故的劳工联合会主席芬·帕·华尔希先



生在去世以前曾說：

“事态发展的趋势已經证明工党领导人諾德迈耶先生在上次劳工联合会大会上所說的那番話是不真实的。他当时說阶级斗争是一种陈腐的观念，今天我們沒有阶级，事实上，工人、农民、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利益同大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

如果你对此加以思考，你就会发现，我們对于新西兰当前这些问题的态度，同我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爭論问题的看法是以同样的原則为依据的。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会了解这两者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即使你觉得馬克思主义的名詞有些麻煩，也要記住馬克思主义是一門科学，它同其他各門科学一样，有它自己的專門術語。还要記住这本小册子不仅是給新西兰人看的，它在国际上的发行量也会相当大。所以有許多問題必須比只在本地发行的书刊解释得更充分一些。

如果記住了这些，那么，我們相信，考虑一下新西兰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观点，就会在你的脑海中不仅消除资产阶级宣传的謊言，而且也会消除那些应该更为有腦子的朋友們的謊言。这会帮助你了解如何更有效地发展新西兰日益壮大的阶级斗争，使你明白在新西兰的政治战綫和劳工斗争战綫上的原則和策略。

我們曾到莫斯科去会談

一九六三年八月底，新西兰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曾到莫斯科去就意識形态分歧問題举行兄弟般的会談。这个代表团是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請前往的；这个代表团的成員包括团长、总書記維·乔·威尔科克斯和团员、全国委员会主席默·威廉斯、政治委员会委員阿·奥斯特勒和政治委员会委員迪·沃尔夫。

你們大概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广播电台和报纸上曾經报道过。从那以后，許多非党的朋友曾經問道：“你們当时到莫斯科去究竟要談些什么？”我們想在这有限的篇幅內，像我們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們說明的那样，尽可能清楚和确切地闡明我們的立場。

但是，首先，我們必須扼要地說明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我們为什么会被邀請。

一九六二年二月，我們在听取了作为兄弟党代表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党的乔·杰克逊所作的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之后，就作出了某些决定。这些决定不仅是根据关于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进行情况的报告作出的，而且是根据一九六〇年年中以來我們所了解的一系列事件作出的。一九六〇年年中，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杰·滿生曾作为兄弟党的代表出席羅馬尼亚党代表大会，他发现自己是在出席一次匆匆忙忙召集的世界各国党的代表會議——这是在其他許多党事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由苏共领导召集的。在这次



會議上有人企图造成对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政策的全面譴責。杰·滿生明智而正确地拒絕表明新西兰党的态度，他說，他的党沒有授权給他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来的目的純粹是参加羅馬尼亚党代表大会。

我們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双边会談的时候就指出，苏共领导事先沒有經過应有的集体討論就这样专断地单方面采取行动，企图使自己的意見得到贊同，是多么錯誤。苏共中央書記米·安·苏斯洛夫說：

“首先，讓我們談談你提出的关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問題。威尔科克斯同志，难道你不知道，召开那次會議的原因是中共领导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起了公开的进攻嗎？难道你不知道，早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北京就出版了一本冠冕堂皇的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不仅由中国领导方面而且由形形色色的叛徒在全世界各地广为散发嗎？”

他們就是用这样的理由来为那官僚式的行徑辯护。然而，《列宁主义万岁》这本小册子，当时正被許多党作为党的学习材料。至于知道在羅馬尼亚代表大会之后将举行一次世界會議的問題，我們要向米·安·苏斯洛夫指出，当时許多党沒有派代表到布加勒斯特去——他們不知道——还有許多党沒有他們的中央领导核心出席，而如果要开一次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會議，他們的出席是必要的。在塔斯曼海对岸的我們的兄弟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就根本沒有代表出席。事实上，澳大利亚共产党是事后才非常感激地得到了我党代表杰·滿生的报告。

因此，看来当时許多人都不知道議程上有举行世界各国党代表會議这一項。

正是这类事情促使新西兰共产党领导对苏共领导的許多做法以批判的态度提出了疑問，最后并对他們的許多“新的”理論和实践同样也进行了批判的研究。

自然，这个問題在布加勒斯特並沒有解决。这样一次匆匆忙忙召开的會議是解决不了这个問題的。因而，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正当地組織起来的世界各国党的會議，新西兰党正式派代表出席了这次會議。

但是，在苏共負責組織的这次會議上，我們也对苏共所采取的程序感到不滿。在这次會議上，正確地向所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文件草案，这个草案經過修改以后就成为由出席會議的所有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簽署的八十一党声明。但是在会上也散发了苏联领导在布加勒斯特的声明。这是这次會議的正式文件之一。但是，中国党的答复却沒有散发，而不得不从中国代表們那里取得。由于这种做法，出席會議的許多党的领导人甚至沒有看到这个文件，更談不上研究这个文件了。苏共答复中共的另一个声明也散发給全体与会者。但是，中国的答复却又沒有散发。

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客观地研究一切能够得到的事实和意見。但是並沒有这样作。



更恶劣的是，当时（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苏共提供的材料中談到的关于从中国撤走技术人员甚至撤销工业企业以及削减“援助”（注：一切物质“援助”都必须在以后付款）的原因，同苏联最近的材料——以及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向我们代表团說明的原因完全不同！苏斯洛夫对我们代表团說，中国领导拒絕接受技术援助和其他援助。但是，他所指的是一九六一年的事情——在中国已經有过以前这次經驗之后的事情。

我們不禁要为这些做法感到不安。

然后，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从諸如免費供应面包（从一九六四年起）和废除所得税这样微小但是重要的措施着手的“二十年走向共产主义”的綱領。我們曾經期望这个綱領将成为促进新西兰为實現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一个重大因素。到今天，事实已經证明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人們已經把注意力集中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突出的其他方面去了。资产阶级报刊对此热烈欢迎并且开始在把这个走向共产主义的綱領埋葬掉。

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甚至没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同志出席来闡明阿尔巴尼亚党的立場，在这种情况下，却有人指望所有的代表都来譴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是非馬克思主义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我們的代表将这些情况向我们党汇报之后，我們拒絕这样作，并要求召开另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

我們当时就认为，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公然对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进行猛烈的攻击，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們认为，这不仅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感到高兴，在我們自己的队伍中散布混乱，而且直接违反我們世界各国党关于应当如何处理我們运动中的分歧的决定。

我們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沒有談到阿尔巴尼亚党的立場的是非曲直問題。他們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在我們世界运动的内部来为自己讲话。作为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他們有这种权利。

說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已經公开攻击了苏共领导，继而引用諸如《苏格兰人报》和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妄加猜测的文章来为自己辯解，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妄加猜测的文章是一回事，资产阶级利用苏共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党进行的公开譴責所发动的宣传攻击，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在我們队伍之外的所有的人和我們队伍之内的許多人的心目中，这些攻击成了人們注意的唯一的問題。而苏共走向共产主义的綱領完全被人忘記了。

（的确，从現在已經公开的有关苏联的农业和工业的問題中，可能产生这样的疑問：整个概念是否提出得为时过早。但是这个问题已超出了这本小册子的論述范围。）

要求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兄弟党的代表譴責阿尔巴尼亚党的领导的那种



做法是錯誤的，当时这些代表沒有被授权这样做。这样一件世界范围的事，只能由一次世界性的會議来决定。我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錯誤的，是违反我們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世界性的決議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是怎么說的呢？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說：“會議参加者交換意見以后，得出了結論，认为在現代条件下，除了举行领导人員的双边會談和相互交換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會議，以便討論迫切的問題，交流經驗，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場，協議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

——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說：“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們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要获得成功，需要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的同情支持。每个党都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負責，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負責。

“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會議来討論迫切的問題，交流經驗，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場，通过协商途徑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爭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問題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會談和协商。”

这些做到了沒有呢？我們說，沒有。的确，他們也曾經作过一些嘗試要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举行會談。但是，他們有沒有根据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这个精神来作呢？

而实际上在这以后出現了怎样的情况呢？赫魯曉夫代表苏共领导集体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讲了下面这番話，而且从那时以来一再地重复这些話：

“如果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珍視本国人民的利益和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如果他們真正希望同苏共、同所有兄弟党友好，他們就应当放弃自己的錯誤观点，回到在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中团结和密切合作的道路上来，回到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上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肯定是这样的：在举行双边性质的會談以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必须声明，自己在一切有爭論的問題上都是錯誤的。在这里，苏共的态度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任何这种观念都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既然話全說了，事情都做了，那么，按照苏共领导人自己的說法——姑且不論这种說法是对还是錯——在他們看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理論和实践上的立場也正是十年或者十五年前苏联的立場。



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说，在斯大林时期，从三十年代起，布尔什维克党已经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了呢？

再来谈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作为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苏共中央在给我们党的信中和在其他许多场合都曾经说：全世界各国党都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搞分裂活动的，等等。事实决不是这样。所有各国党并不是个个都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我们并不想在这些问题上使你们生厌，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事实是，一切经验都表明，错误的实践是从不正确的理论中产生的，而且事实上它是以不正确的理论为根据的。

苏共领导人和其他党的某些领导人所作的大量的断言，使我们严重忧虑；我们认为，这些话不是以事实作根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永远从事实出发，必须从已知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某人想望的情况出发。社会民主党人为了适应自己的目的而采取后一种做法，但是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态度。我们来引述一段话：——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使他们同苏共、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尖锐化到极点，——”（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不错，对于中国领导人及其所做的事，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说“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就不正确了。这是不确实的。人们说话如果离开了已知的事实——不论他们多么不喜欢这种事实——他们就开始踏上了危险的道路。

我们作为一个党，是以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为依据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文件仍然是有效的，任何一个党也没有任何权利来改变其方向或重点。只有通过我们世界运动的集体决定才能这样作。看来有许多党在独自修改这些文件，断章取义地摘出一些片段来适应他们自己的想法，使文件遭到歪曲。

我们认为，这样做的党当中包括苏共。

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我们党的政治委员会才决定，不能照着其他一些党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指使下所做的那样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相反，我们要求为再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党的会议作准备，以便按照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决定来考虑全部有争论的问题。宣言和声明中的有关部分，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述过了。我们建议，应当由最直接有关的方面举行双边会谈，以便为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创造适当的气氛，一种不会导致主观的攻击而会对一切问题作客观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估计的气氛。

因此，我们写了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連串的信接踵而來。中國黨同意我們的意見，他們自己也提出了有些相似的建議。後來，蘇共中央委員會建議需要召開一次世界性會議，但是出發點是他們的意識形態絲毫不成問題，召開會議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範圍內更有效地把他們的意識形態付諸實踐。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當時對於同蘇共領導舉行會議是否能取得任何有價值的成果仍然表示懷疑。

當蘇共中央終於發出邀請要新西蘭共產黨派一個代表團去莫斯科討論分歧的時候，情況就是如此。這個建議恰好是在新西蘭共產黨一九六三年復活節舉行代表大會之前來到的。

同時，新西蘭共產黨領導對我們世界運動的形勢、對意識形態分歧的嚴重性進行了很多思考，這種分歧在各方面的活動中也像在理論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上一樣變得日益明顯了。

我們得出了我們的結論，這個結論不是通過別人教我們怎樣考慮問題而得出的，而是通過我們自己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鬥爭經驗、通過我們自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而得出的。

我們斷定（這種看法得到了我們黨上次代表大會的批准）：蘇共領導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已表明，他們基本上已經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站到修正主義的立場上；如果不加以糾正，就會導致完全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他們也像從前的修正主義者一樣還在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

這個判斷並不是輕易或愉快地作出來的。這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經過了一些痛心的時刻才作出來的，因為我們多少年來一直忠誠於蘇共領導，這種忠誠差不多常常可以追溯到童年時代。這不是反蘇立場。蘇聯人民和他們的共產黨必定會向共產主義前進，但是在尼·謝·赫魯曉夫的領導下，修正主義的滋長若得不到糾正就會起很大的阻礙作用。的確，在全世界範圍內，這種修正主義的影響已經很嚴重，起了阻礙作用，這是由於蘇共對各國黨有着特別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追溯到列寧和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革命時代。

尼·謝·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的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據我們了解，在蘇聯還沒有發表過，但是《紐約時報》在一九五六年非常迅速地在特別增刊上發表了）儘管不公平，它本來應當把人們認為蘇共領導不會犯錯誤的觀念永遠打消掉了。從某些人今天的態度和言論看來，人們很可以問一問：“打消了沒有？”當然，任何相信哪個黨或者哪個領導人不會犯錯誤的觀念都是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道地的唯心論——但是這種觀念還是存在着。

我們再說一遍：像我們目前這樣在意識形態上同蘇共領導持不同的意見，並沒有改變我們對偉大的蘇聯人民，對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的光榮歷史和成就的尊敬和熱愛。

我們的觀點的基礎

除了對待兄弟黨關係方面採取的工作方法和組織方法問題外，我們在哪些問題上有不同



的意見呢？我們有不同意見的問題都是根本性的，天天影響着我們每一個人的。

在今天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這些字眼經常不斷地出現。一些黨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制訂它們的政策，即：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勝利和帝國主義衰落的新時代——這樣一個時代事實上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某些基本原則變得過時了，或者不再像過去人們所理解的那樣，是決定性的因素了。

這特別適用於對待如下一些重大問題的原則上和策略上的態度，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方法。

——國家的性質。

——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

——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它在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作用。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立場（以前大家都認為這是危險的修正主義傾向的例子，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到底）。

——社會民主主義。

這些分歧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人。因此，客觀地研究這些分歧就具有重要意義；進行客觀的研究，是為了澄清是非，在意識形態一致的原則基礎上達到團結。這種意識形態的一致則是通過以正確的辯證觀點來研究一切有關的已知因素而取得的。如果認為，給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人們簡單地扣上“教條主義者”的帽子就解決一切爭論了，那是無益的。基本的重要出發點是讓所有的人都認識到：沒有任何領導人、沒有任何黨能夠說，他們在一切事情上和一切方面都永遠是正確的。但是我們的代表團在莫斯科同蘇聯同志們會談的時候，就認為在他們的態度中內在地存有這種觀念。

當然，在這些深奧的理論問題上，我們黨並不認為我們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出席莫斯科雙邊會談的代表團，我們的政治委員會和我們的全國委員會，在重新考慮這整個問題的時候，更加相信在那些極端重要的問題上，我們的態度是正確的。否則，就不會發行這本小冊子了。

我們黨過去完全贊成，現在仍然贊成當時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黨通過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我們黨過去完全贊成，現在仍然贊成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結束時全體簽署和發表的聲明中再次作出的同樣的決定。那項重要的意識形態的決定是：修正主義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我們還毫不猶豫地說，事態發展證明，這個觀點不僅是正確的，而且自從一九六〇年以來，這個危險還大大地增長了。

列寧在世的時候是怎樣談論修正主義的呢？（我們要記住，列寧曾以他畢生大部分精力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隊伍中以及當時組織良好的第二國際的各社會民主黨內修正主義的滋長進



行斗争。)关于修正主义,伟大的列宁說: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我們认为,目前以尼·謝·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經站在这样的立場上。这样的形势势必深刻地影响其他許多党,并且把它們导向修正主义的观点,这并不是出乎意料的。我們再說一遍,由于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列宁的党”就有着广泛的影响,苏联党現在仍有极高的威信。

我們今天看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基本真理正在被篡改,或者被认为是过时了,我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一情况毫无必要地給阶级敌人增加了力量。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那就会肯定地导致公开的背叛,一如考茨基^①的修正主义在列宁时代所做过的那样。因此,新西兰共产党在这个問題上采取了这种原則的立場。

我們和八十一党声明一样,也認識到教条主义的危險。但是今天教条主义的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一些党的领导中的那些人,他們不加批判地接受尼·謝·赫魯曉夫等人所說的一切,他們不让他們的党员知道或有机会閱讀和研究各种不同的意見。不幸,在一些党内正在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我們党的领导已經尽我們的組織力量所及,向党员們介紹了各种观点。例如,我們党的每一个党员都得到一份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双边会談上的发言、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发言全文以及我党总书记維·乔·威尔科克斯在代表团从莫斯科回来后向全国委员会會議所作的报告。

在認識到教条主义的危險的同时,我們还不安地看到苏共领导不再认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險了。米·安·苏斯洛夫說,“自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許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們显然认为,在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問題上,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不再是正确的了。从下述的引語中就可以看出我們所讲的話的意思,

“苏共过去和現在都既同修正主义也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而有些人却只片面地強調同修正主义斗争,而且有时还把创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說成是‘修正主义’,从而給共产主义运动制造明显的混乱。……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問題的解决,是最严重的錯誤的根源。”

——《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編輯部文章

^① 他是二十世紀初德国一个居重要地位的馬克思主义者。他背叛了德国工人阶级,支持德国皇帝的战争努力,咒罵俄国革命,墮落到全面支持资本主义的立場。与此同时,他却仍然高喊他的新理論是馬克思主义,而馬克思自己早先的論点則已經过时。



“在目前情况下，‘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并不小于修正主义”。

——鲍·尼·波诺马廖夫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三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盟警告说，如果不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它们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最近时期的事件发展表明了这些结论的远见性。……左倾机会主义……在目前其危险并不小于修正主义。”

——《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社论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在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实。苏共过去进行了、今后仍将进行反对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任何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坚定地遵循一九六〇年声明中的论点，这些论点指出，必须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声明正确地指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同时也指出必须进行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坚决斗争，如果不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它们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

“我们党本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利益，今后仍将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其危险目前并不小于修正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

——引自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如果从这些引语来看，他们的态度还显得有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只能提醒你们读一下列宁所讲过的关于修正主义者的一些话。（见本刊第十页）

总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八十一党声明是这样说的：

“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利益，要求今后继续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坚决斗争——反对仍然是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请客观地把这一段话同引自《真理报》社论的那段话或上述其他引语比较一下吧。

我们认为这是危险地改变了着重点。这样做，鼓舞了各地的修正主义者，鼓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并且，一般地说，还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造成了一些混乱和分裂。它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谁要指出修正主义的倾向或者真实的理论根据，立即就被攻击为“教条主义”。明显的事实是：世界各地的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是根据“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是今天主要危险这种臆想行事的。

我们认为情况不是这样。我们持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已经说明了。无论如何，这种臆想，或者说这种观点，无论在字句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提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清楚地说明主要危险在哪里。有些人企图为这种方向上的改变辩解，说什么在我们生活的新时代里所产生的一些新因素改变了形势，这种辩



解是毫无道理的。

自从一九六〇年我們經過長時間集体討論后通过決議以来，沒有出現新的主要因素。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明确指出我們生活的时代的性质，并且概述了我們运动前进的一般道路。新西兰共产党在言行中坚持遵守这一点，并且期望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这样做。

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呢？逐步放松对修正主义、右傾机会主义的打击，終將导致什么呢？我們认为，自从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来的这几年中，苏共领导一直在发生这种改变。这种趋势不仅导致錯誤地过分強調我們的世界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危险，把每一个批評都夸大为教条主义傾向，实际情况比这更恶劣。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修正主义思想的滋长和接受这种思想。这种趋势，从一九五六年不公正地批判斯大林，相当快地发展到把斯大林貶得“一文不值”，抹煞他的积极成就，硬說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虽然建設社会主义，却实行了“举世未聞的最殘酷的和血腥的专政”。

难道不正是在苏共二十大进行的这种攻击——我們已經說过它是不公正的——大大帮助了当时新西兰共产党內已經存在的修正主义的司各脫小宗派嗎？在他們不仅攻击党的政策和领导，而且攻击关于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組織形式的公认的基本原则——党的章程和規則——的时候，《紐約时报》刊印的那个秘密报告不是成了他們的“聖經”嗎？

不論斯大林犯过什么錯誤，他不是修正主义者。因此，現代修正主义者在他逝世后同他发生誓不两立的冲突。“个人迷信”变成了一切麻煩、一切失败的根源——不仅是苏联国内农业或其他方面失败的根源，而且是一切地方一切錯誤和一切困难的根源。这一直是近年来圍繞所謂“个人迷信”問題而采取的态度，尽管事实上斯大林逝世越来越久远了！这种态度是什么問題也解决不了的，但是由于这种态度是从一个捏造的前提出发的，因此它会导致进一步的失败和挫折。占主导地位的是歇斯底里，而不是辯证的、客观的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样就为修正主义的得势大开方便之門。

如果各共产党之間在某些理論問題方面产生了分歧（当然这种分歧会不时产生），那么显然要責怪中国人，因为他們奉行“对毛的迷信”。对朝鮮党及其领导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指責，同时还对其他的人进行影射。对爭論中的那些問題並沒有认真地加以考虑。占上风的是主观，而不是客观。

什么构成修正主义？

现在讓我們来看看一些具体的重要方面，看看苏联共产党和一些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今天在理論上和实践中对于这些方面是怎样說的和怎样做的。我們尽量說得簡短一些。



关于领导劳动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对这一点感到十分担心，即：今天在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对世界总的看法中，有人过多地强调了并不存在和平可能性的地区的和平可能性，而对其他方法则强调得不够。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末说今天在存在着从民族解放斗争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国家里有一种明确的起阻挠作用的影响，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影响到处侵袭我们各国党的革命核心，为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的渗入开辟道路。

其次，我们还认为，有人过多地强调和信赖社会主义世界各国的物质进展对各国人民思想的影响，而对促成进步的真正核心，即资本主义地区、殖民地地区和新解放地区的群众积极性，则强调得不够。

在我们看来，进步的基础仍然是阶级斗争，非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战斗。我们同意，社会主义的胜利，苏共纲领的胜利实现等等是重要的，并且将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是难道不应当把它们看成是次要的事情吗？

我们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是，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中英勇和胜利的红军曾经到达或者迫近因而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影响的地区之外，历史上还没有和平过渡的第一个先例。然而我们知道，一些党实际上已经得出，或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是和平的道路。

对于这种严重的修正主义发展，我们认为目前的苏共领导起了促进作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概念一直在发展和扩大，直到造成了上述局面。就我们所知，苏共没有对这种发展提出过任何认真的批评，而最近却不断地对认为和平过渡在大部分非社会主义世界里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这种想法进行正面的攻击。

的确，认为我们非社会主义世界所有的人可以舒舒服服地骑在社会主义世界的背上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受到了鼓励，从而损害了依靠群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为了说明我们认为这种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只简短地引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共纲领中的一段话。

“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說：‘我们赞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不是通过同其他国家进行战争的途径，而是用更完善的社会组织的范例，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通过为人们幸福安宁的生活制造一切条件，来争取人民群众的思想与心灵的。”

如果这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有耐心，我们就可以袖手不动，因为主要因素将是阶级战斗已经获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范例，那么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能赢得资本主义的、非社会主义世界的群众的思想与心灵呢？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而产生的阶级斗争到那里去了呢？

我们认为，这样过分强调一个方面，可能是很危险的，并且可以导致错误的结论。但是，



我們同时要着重指出，我們并不低估一九一七年革命对于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极为重大的影响；也不低估从那时以来苏共领导、党员和苏联人民这些年来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以及他們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作出的牺牲。

苏联的一位主要理論家波諾馬廖夫同志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紀念列宁誕辰九十三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說：

“列宁主义把和平共处政策同进一步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活动結合起来。在和平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大家庭日益强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充分表現出来。保卫和平与在世界政治中维护和平共处的原則，根本不会削弱世界革命的进程，只会加速这个进程。正是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从而继欧亚两洲之后，社会主义在世界第三大洲——美洲获得了一个据点。”

在某种程度上我們同意。但是古巴革命是在冷战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且是通过古巴人民的武装斗争赢得胜利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嗎？（附带說一句，我們了解，不幸的是，这场斗争既不是古巴人民社会党领导的，而且在一个长时期中也没有得到这个党的支持。）在我們前面引用的一段話中所強調的，是和平共处的条件，而没有提及起作用的有效因素——武装斗争。阶级斗争是每个国家内的根本因素，在这种观点中看不到这个因素。

在我們党看来，在每个国家里，工人阶级政党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中，总是希望和平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但是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积蓄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上，必须为非和平过渡作充分准备。这样，如果统治阶级拒绝接受人民的意志而对革命采取武装镇压，那么工人阶级政党就能狠狠地予以还击。坦白地說，我們认为，指望得到反动统治阶级完全而自願贊同的和平过渡，这将不可避免地要挂伤人民的革命意志和葬送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我們认为，以为统治阶级会自动交出政权的幻想是一种现代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問題，一九六〇年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是怎么說的呢？我們簡短地摘引几段：

“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为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它們所面临的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任务，提供新的可能性。

“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它們进行忘我的斗争，争取在当前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保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改善他們的生活条件，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不把这些事情拖延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鋒队認識到，他們自己肩負着为使本国人民摆脱資本压迫而斗争的主要重担，他們将在本国政治、經濟和思想生活的一



切领域里，向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统治展开越来越有力的进攻。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锻炼群众，为推翻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决战创造着条件。”

一九六〇年的声明把事情说得恰如其分。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根据本国的条件肩负起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重担。声明如实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成就的影响所起的辅助作用。声明没有修改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群众在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是在本国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的确，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对我们的代表团说过，苏联共产党主张根据当地的条件采取一切过渡的方式。别的人也的确多次谈到过这一点。但是，事实仍然是，一九六〇年的大争论是关于应该比一九五七年宣言更多地还是更少地强调和平的过渡方式问题。主张更多地强调这一点的观点，是由苏联共产党领导、特别是尼·谢·赫鲁晓夫带头提出的。意味深长的是，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一九六〇年八十一一个党会议声明的初稿，只谈到一种方式，即和平方式。别的党不得不进行斗争来把它修改成后来的样子。了解到这一切之后，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的态度提出疑问。

其次，我们感到担心的是，我们认为有人未能看到，随着条件的变化，正在发展中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中心不可避免地已经转移了。在一九一七年，风暴的中心是在俄国和欧洲。今天难道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风暴的中心吗？

这里，我们想从列宁的报告中摘录几句话，虽然不是直接适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恰当的。

“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

“今后，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去进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今天在我们世界运动中提出来关于资本家将和平地投降——不仅是作为一种策略手段而作出让步，而是面对着议会的多数或者其他保证要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和平组织机构交出国家政权——的总的概念，简直不适用于今天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它是否适用于别的地方，对这一点我们也表示怀疑。这个概念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要末是接受这种概念，而使有效的斗争开展不起来，因为整个状况要求准备和进行武装斗争。要末是这些国家的同志反对一九五



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这种解释。实际上在许多国家里正在发生后面这种情况。

老实说，我们觉得，在当代世界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往往是更多地由被认为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当前国家政策、而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来决定的。这一切的背后似乎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它们需要同帝国主义长期保持和平的关系，因此“不要去刺激野兽”。建议在某些尚未攻克的重要帝国主义堡垒里准备和进行武装斗争，那是非常“刺激人的”。因此，我们在听到有人大谈什么“明智的帝国主义者”正被说服接受和平投降的同时，帝国主义者实际上却在继续采取一成不变的强硬路线（很难说服越南南方人民相信帝国主义正在变得明智了！）。

这种理论家是不是始终考虑到世界各地的情况仍然各不相同，因此走向社会主义的方法也必然有所不同呢？在新西兰，武装斗争目前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必须运用其他的斗争形式。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任何其他的人都应该运用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方法，也决不能单凭我们自己的处境来作出判断。

在新西兰工人运动中，我们共产党应该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总目标，在反对垄断资本、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和各种形式的日常的經濟和政治斗争中，给予积极的领导。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希望实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必须时时刻刻警惕这样的想法：认为这是唯一的或者甚至是很可能的道路。我们党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提高革命觉悟上，同时它本身必须为非和平的过渡作好充分的准备。

这样，随着条件的发展，当争取实现社会主义成为新西兰的一个迫切问题时，如果统治阶级拒绝接受人民的意志并对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话，我们党就将随时狠狠地予以回击。

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陷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得到反动统治阶级完全欣然赞同的和平过渡上的那种境地，那么它就将挫伤人民的革命热情和葬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正如早期的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在当年大卖力气干的那样。我们认为，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该重新研究一下那个时期。因为，难道不正是那些修正主义理论家，在世界规模上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造成分裂，结果才成立了第三国际？我们极其严肃地提出这一建议，因为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我们正面对着世界规模的分裂。我们希望我们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并避免这样的发展。

但是苏共中央的代表们就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是怎么说的呢？现在把他们的话引述如下：

“我们完全不同意你们的如下论点：社会主义革命的風暴中心（如你们所称的）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和南美。这不仅是对莫斯科各次会议文件的重新估价，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修正。这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可能性缺乏信心的表现，是对世界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领导权缺乏信心的表现。如果風暴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那么，工人阶级



的历史作用在哪里呢？作为工人阶级的产物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又在哪里呢？我要重说一遍，你们的论点完全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愿意提醒你们看看八十一个党的声明是怎么说的。我们时代的中心因素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些因素是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两个对立的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进行斗争的领域，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战场。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则是我们时代最巨大的革命力量。为什么你们要反对这个明显的事实呢？对这一事实的了解，决不会贬低你们所提到的那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而是有助于了解那场斗争及其前景的真实情况。

“对我们时代的特点作出不正确的估价，使你们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进行修正。”

这确实是重要的谈话。我们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根本性的“修正”了。然而我们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说：

“同志们，我们重说一遍，我们所担心的是，我们认为有人未能看到，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中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风暴中心已经不可避免地转移了。在一九一七年，风暴中心是在俄国和欧洲。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难道风暴中心不是在亚洲、东南亚和南美洲吗？”

同时也让我们指出，尼·谢·赫鲁晓夫本人讲过这样的话：

“民族解放运动正在给予帝国主义以日益沉重的打击，有助于加强和平和加速人类的社会进步。目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中心。”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第十五届

联大进行一般辩论时发表的讲话

我们只好让苏斯洛夫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他们自己去争个明白了。我们坚持我们所提出的主张。人们所注意的是薄弱环节，而今天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这些薄弱环节正是我们所指出的那些地方。我们并没有背离我们世界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并不否定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堡垒里的作用。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苏联党领导人的最近的文章和讲话中，可以找到许多这种普遍的混乱和矛盾。我们要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我们的下述看法是正确的。我们的看法是：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经不再是把他们的观点坚定地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而是虽然有时也满口革命词句，实际上却已让某些危险的修正主义思想渗透进去了。

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抛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势必首先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实现的陈旧



思想。历史证明，进展是出现在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上。在一九一七年，当时的许多修正主义者反对俄国革命，其理由是：由于“沙皇俄国的落后状态”，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们借口把希望寄托在革命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突破的“资本主义的优点”上，实际上是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

我们的苏联同志们应当仔细地看看这一方面，而不要指责别人背离了总路线。

社会主义世界的巨大进展及其普遍影响丝毫也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应当指望资本主义世界较薄弱的地区正在战斗和组织起来的人们，并且向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我们应当，并且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丝毫不会削弱主要工业国家的斗争。这两者是携手并进的。

谁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修正主义者。

怎样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

今天，各国党都说它们同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关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策略主张的提法，这是就我们的党的活动来说的。大家都同意，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广大阶层的群众开展有效的斗争，即使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世界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争取和平的斗争应该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它涉及哪些问题时，分歧就开始产生了。

我们认为，这些分歧的产生是由于有些人没有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争取和平的斗争首先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现代战争的根源。在争取和平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将采用各种方法，千百万人将被吸引到这场斗争中来，他们当时不会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行动不仅是为了争取和平，而且是针对着帝国主义的。

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不会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只局限于某些方面，不管这些方面是多么重要。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全面斗争，其中包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国家政策的基本特征的和平共处政策；包括吸引帝国主义世界的群众——通过他们的工会和政治团体，并且通过新的形式——参加有组织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包括自然而然地扩大到殖民地和解放地区的各种类型的和平运动。

但是是否应该到此为止呢？有些人似乎是这样想的。我们怀疑，依靠群众这一点是否还被看成是斗争的重要基础；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把他们吸引进来这一点是否还被看成是进行有效斗争的目标。这个运动似乎往往依靠吸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参加并依靠他们来领导，它的组织也是以这些人为基础的。当然，他们可以起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次要的，而



不是主要的；同样地，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之間就有关和平的各种問題所达成的協議是有价值的，但是与群众对于爭取和平的觉悟的提高，从而意識到必須采取有組織的行动这种情况相比，却是次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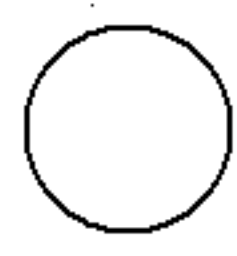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根据随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大会的报告，我們所得到的印象是，上述做法上的缺陷是一清二楚的。根据我們的观点，更糟糕的是这个事实，即作为爭取世界和平斗争重要組成部分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不是被忽視了就是遭到反对。但是我們要說，这是爭取世界和平斗争的重要部分。

我們认为，在这方面产生的混乱——如我們在前面說过的——是由于沒有能够認識到，实质上，爭取和平的斗争是在一切战綫上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沒有能够認識到，在我們的新时代，帝国主义的本性沒有改变；沒有能够認識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

真正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者是沒有的。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矛盾的。我們要問，帝国主义头子有时候不是錯誤地被划为这一类人么？例如，艾森豪威尔曾被赫魯曉夫称为“爱好和平的人”。此后，对于肯尼迪也說了些类似的話，毫無疑問，这种話不久也将应用到約翰遜身上。

在这里，我們必須說，我們认为，今天我們的世界运动在这个和其他重要方面的某些分歧，是由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的那些概念所产生的；后来許多人把这些概念这样地加以发展，以致当我们估計我們新时代的时候，我們不禁要問，着重点是不是有点紊乱了。这种“新”是真的新呢，还是一种新形式的修正主义？指責我們提出的观点是教条主义的那种說法是正确的嗎？还是只不过是掩盖对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真正严重的倒退行为的外衣？

因此我們要問，我們所說的和平共处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它有变成各人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的东西的危險。我們要問，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能实行和平共处的时候和地方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其本身就意味着可靠的世界和平，这种想法是不是不正确？我們援引一两段苏联的言論來說明使我們担心的是什么。



“和平与和平共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和平共处不单纯是没有战争，不是战争与战争之間的暫时的、不稳定的停战，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共处，它建立在相互放弃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爭端的手段的基础上。”

——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在当前条件下，已經开辟了一个前景：能够爭取到一个直到使当前分裂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問題得到解决为止的整个时期的和平共处。”

——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把它们的对外政策总路綫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作为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所宣布的口号的实际表现；争取和平的行动是各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鮑·尼·波諾馬廖夫在一九六二年《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座談会文章：《革命运动中的若干問題》

“和平共处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或某种暂时的、靠不住的休战。它首先是相互拒絕使用武装部队作为解决国与国間爭端的手段。”

——多列士在一九六二年《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座談会文章：《伟大革命变革的时代》

（把多列士的言論也列在里面是为了表明和平共处的概念是多么各种各样。）

上面这些引語都不是罕見的。还可以列举許多其他的話來說明，关于所說的那种和平共处，究竟我們是已經获得了呢，还是在获得的过程中；是意味着持久性质的和平呢，还是不是持久性质的和平等等，是不明确的。

我們要問，为什么这样不明确？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說得很清楚。我們引述如下：

“和平共处的路綫是动員群众开展积极行动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綫。

“各国間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間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現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問題的核心难道不是这个事实，即和平共处为帝国主义世界中的群众作为争取和平的一支力量而发生作用，为发展阶级斗争和为扩大民族解放运动，創造有利条件嗎？

列宁是否曾經从“相互”的意思考虑問題呢？我們认为，列宁的概念是，共产党人必須努力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同时反对导致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但是他有没有忽視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各种矛盾依然繼續存在，各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各垄断集团之間的矛盾也依然繼續存在？在我們看来，列宁认为，不能忽視这些矛盾，同时共产党人必須积极利用这些矛盾来随时随地促进革命斗争。尽管社会主义世界发展壮大，列宁看到的那些矛盾仍然存在着并且起着作用。至于我們引述的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所談关于和平共处的真正目的——难道不是往往被放在十分次要的地位嗎？难道不是存在着这种幻想，认为维护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重要因素，是同帝国主义政府达成協議而不是在各地把群众組織起来采取行动嗎？我們认为这种幻想是存在的。



我們的意見是：和平共处的概念决不能在实际上变成压制殖民地和資本主义世界革命力量的政策，唯恐这种革命力量会扰乱同帝国主义关系上所希望的“平靜”时期。因为，这样一来，人們就开始走上投降的道路，并利用修正主义的論点来为他們改变了的态度辯解。

我們完全同意苏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會議作出的決議中的如下論点：

“帝国主义陣营日益疯狂地从事軍备竞赛、奉行欺騙人民的政策、侵略和国际挑衅的政策，用这些办法来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

的确是这样。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仍然是軍备的力量；核武器仍然存在；在越南南方，某种程度上在老撾、朝鮮和其他地方，还存在着挑衅行动和战争。在我們談論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战争的世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不正視这些事实。事实是：这样的世界将是一个帝国主义連同它目前那样为非作歹的力量都不再存在的世界。

也許再引述一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会有助于人們正确地看待事物：——

“苏联将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強国。中国将成为強大的工业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业产品将占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和平地区将更加扩大。資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附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取得新的胜利。殖民主义体系将完全崩潰。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将占絕对的优势。

“在这些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資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現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实际上，今天，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內的某些共产党的政策，难道不是建立在认为上述一切已經实现——虽然帝国主义肯定不承认这一点——这样一个概念的基础上嗎？就和平共处的正确政策來說，我們认为，必須使我們的脚跟站在稳固的基础上。

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資本主义国家关系上的国家政策的基础。我們也同意不可能有其他別的。但是讓我們把列宁的著作牢記在心。讓我們記住，社会主义体系生产的工业品还没有占世界工业品的一半以上，殖民主义体系还没有最后崩潰，而新殖民主义却在一天天滋长。

就我們的世界范围的运动而論，就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实际上奉行的政策而論，如果我們不記住这些，那么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一种政策就会导向冒险主义的行动和不可避免的退却。

这里，我們认为我們必須提一下近来使新西兰党深感不安的、同苏联政府政策有关的一些事情。前些时候我們听到許多关于“戴維营精神”的談論，虽然事实上在帝国主义領導人和社会主义領導人之間根本不能有什么精神上的一致。我們并不是說有时进行最高級談判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当时，对那次談判的提法，可能在群众中造成这样的幻想，以为是“領導人”而



不是人民能够得出结果和实现持久和平。这样的事情涣散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斗志，特别是在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在新西兰，工党政客一直在鼓励劳动人民让领导去包办一切。

还有，不久以前，我们相信而且鼓励大家相信：苏联的政策意味着他们决不会第一个恢复核试验。突然，像个晴天霹靂，他们宣布他们将重新开始一系列核试验。当时我们了解其中的原因并表示同意，然而新西兰的一般工人却不能理解。由于苏联政府没有预先说明被迫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从而大大损害了和平运动。大多数工人终于说：苏联和美国——“让你们两家去遭殃吧”。这是事实。

人们提出的论据之一是这个事实，即法国正在进行试验。我们党支持这种论点，但是现在，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之后，对于法国不久将用比前一个时期还要先进的武器在南太平洋进行试验一事，又能指望我们说些什么呢？对新西兰人民来说，这种试验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它就在我们的后院进行。然而，实际上，它所表明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仅在使我们免受继续存在的核战争威胁方面，而且甚至在使我们免受大气层试验的威胁方面，都是完全无效的。难道指望我们说，法帝国主义是新西兰和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而避而不谈原子毁灭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帝国主义这一事实吗？我们会走向何处呢？

在古巴，曾经否认建立了导弹基地，可是突然又出现这样的情况，导弹基地已经建立了，并且是必要的。难道指望我们把这样的事情巧辩过去吗？在苏联对“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概念加以责难之后，我们知道有人就在帝国主义战术上最强大的地方把导弹基地建立起来。自然，为了避免战争不得不把导弹基地撤除，可是当时还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和平的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不能不问一句：起初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到那里去呢？——特别是因为现在我们听说，苏联反正可以从自己的国境稳稳地击中美国的要害。

顺便说一句，我们也许可以说，关于今天帝国主义的处境，我们同意它是“垂死的和腐朽的资本主义”和“泥足巨人”。换句话说，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它是虚弱的，虽然从战术上来说，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古巴和导弹问题上，它可能是很强大的。因此，从战术上来说，必须根据当前斗争的情况和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当退却是不可避免时，为什么硬要去攻打坚强的据点呢？

现在谈谈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苏联政府曾多少次约定了同东德签订和约的日期——可是每次都没有下文。有时候看来签订条约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又好像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很严重的，因为现在一般人（至少在我们国家的一般人）并不相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苏联政府今天是说话算数的。信任已经丧失了。在过去并不是这样的，那时不管人们的政治见解如



何，他們知道苏联說話算数，說到做到。在資本主义世界里，現在只有信念坚定的人还相信这一点，但是不可避免的趋向是：这种信念坚定的人将越来越少。

在世界形势沒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而突然改变了政策，这种做法的最近一个例子是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

事实是，現在被說成是和平事业的如此重大的胜利和标志着沒有武器或战争的世界的时代开始来临的这项条約，它同美国和英国在前些时候所提出的建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当时苏联曾正确地拒絕了那个建議，认为那是一个企图掩盖帝国主义者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这一实际阴谋的騙局。

我們发表了苏联早些时候拒絕英美建議的消息。現在我們该怎么說呢？是参加大合唱，叫喊那是对和平的一大贡献，从而同他們和我們在先前說过的話自相矛盾嗎？

这里略引苏联领导过去就帝国主义关于部分禁止核試驗問題的建議所說过的一些話。尼·謝·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四日在最高苏維埃第四次會議的报告中說：“我們想再次強調指出，苏联坚决主张：必須停止在空中、地上、地下和水中进行的一切形式的核武器試驗。如果仅仅通过一項只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試驗的決議，那么，这将会打破各国人民对彻底停止試驗的希望。”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尼·謝·赫魯曉夫在接見《紐約时报》評論員苏茲貝格時說，

“如果軍备竞赛繼續进行，軍事工业繼續全力生产越来越多的核武器，停止試驗有什么用？

“我要說，这有点等于欺騙輿論，使人們放松警惕。人們將以为已經为阻止战争做了一些工作，而实际上什么也沒有做，相反地，軍事机器將繼續全力开动。

“此外，肯尼迪和麦克米伦的建議一点沒有談到停止地下試驗爆炸和所謂的用于和平目的的爆炸……。

“因此，肯尼迪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提出的建議的目的不在于保证各国的安全，而在于追求宣传目的来把責任推給別人，同时自己却悄悄地繼續实行儲存热核武器和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老政策。我們不能同意这个。我們必須清醒地估計局势，关心我們自己的安全。”

我們要問：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除非美帝国主义者現在可能认为他們儲存的不会因時間过久而变坏的核武器已經够多了！

这一切前进和后退，以及突然改变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我們必須寻找思想根源。而且，當我們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沒有遵循一种原則上稳定、策略上灵活的对待政策的坚定馬克思主义路綫。事实上，事情已变得如此捉摸不定，以致我們党不得不問問自己，它是否知道这一切將导致什么后果。我們要問：这是否同修正主义滲入总的观点和意識形态有很明显的关系？我們认为是有关系的。这一切肯定要



在世界工人运动的队伍和一切进步人士中间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核弹”有没有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最重要的方面，即今天我们世界运动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呢，还是反对核战争和争取和平？

我们认为，前者是目标，而后者是主要的策略手段。如果看不清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堕落到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去；就永远不会正视现代武器发展的真正含义；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核武器等等已经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概念。这样我们就会说，由于“核弹”的出现，战争已经不再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的根源不再是产生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

换句话说，我们就会开始说，已经发生的变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及其根源的基本学说过时了。这种说法同认为战争是由于个别人的一时的念头或者一些事件所引起并没有社会根源的唯心主义立场只有一步之差。照这样推论下去，我们就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而否认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及其重要性。

这里，除了最近十年来苏联的外交政策突然反复改变之外，还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事态。一个是依靠群众作为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因素，并且认识到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反帝斗争。另一个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呢，还是反对核战争和争取和平？我们已经说清楚，我们认为，前者是目标，后者是主要的策略手段。

苏共中央的代表们是怎样回答我们代表团的呢？他们说：

“你们知道，防止热核战争的问题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世界共产党人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说：‘各国共产党把争取和平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坦白地说，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呢？这同你们的讲话差得很远。你们贬低了争取和平斗争的作用，但是八十一党声明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当代最迫切的问题；我们，首先是世界工人阶级，担负着防止世界核战争的重大责任。争取和平的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基础之一。八十一党声明说，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剥削和贫困，以及从人类生活中永远消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而且在于就在现时代使人类摆脱世界战争的惨祸。”

我们的态度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虽然我们毫不低估核战争的危险，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态度仍然是正确的。我们不认为放弃或者逐渐取消我们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会对防止核战争或者其他任何战争有任何帮助。除非我们隐蔽到外层空间去，否则无法逃得那么远来使这种政策见效！



另一方面，苏共中央所提出的观点，难道不是使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有许多空子可钻吗？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运动的战略目标正在失去重要意义，而其他事情——事实上是当前行动的重要目标——却变得和主要目标一样重要了。

现在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认为帝国主义者拥有核武器这一情况对革命斗争所产生的影响是什么。难道从长远来讲群众已经不再是强有力的因素了吗？从下面引述的《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的编辑部文章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我们要说明的问题：

“不能用老的尺度来对待现代战争。世界战争如果不能防止，立刻就会变成热核战争，会造成千百万人的死亡和破坏大量物质财富，会使整个整个的国家遭到毁灭。那些不考虑现代战争的后果，对核武器估计不足，或干脆不去考虑它，而把它当作对人们来说是次要的东西的人，是犯了大错误。”

我们知道，核武器具有可怕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那将是一场大悲剧。我们这些在新西兰的人认为，必须把群众组织起来防止核战争，我们欢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有助于防止核战争的任何行动。例如，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国政府呼吁世界各国政府举行会议，来寻找途径和办法，不仅禁止一切核试验，而且销毁现在储存的核武器、撤除一切基地和停止制造一切核武器，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主张，可以把人们团结起来，展开斗争反对我国政府支持美帝国主义政策的政策，我国政府曾说过，不管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对与不对”都予以支持。

我党政治委员会一九六二年决议中所表达的我们的观点是：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一种广泛的斗争，它包含着各种因素。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个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殖民地世界，在受到新殖民主义威胁的地区，在革命形势非常接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和在帝国主义世界本身，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认为，这场斗争是以群众及其战斗组织为基础的。在同帝国主义领导人举行的最高级谈判中取得成果，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仅仅是暂时的，因为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不能局限在反对核战争方面，但是我们认识到核战争的危险，我们要求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这就是说，不仅禁止核试验，而且要禁止制造核武器和禁止储存核武器。这就是说，要销毁现在储存的核武器。

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像某些共产党现在所说的那样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已经过时而必须修正呢？难道因为核武器的发展，我们就得采取根本上是和平主义的立场么？难道我们现在能说这些武器已经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能说现在由于核威胁，任何正义的战争都不能进行，因而就没有正义的战争这类事情了么？

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不是就将导致采取否定的态度而认为：在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正义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保卫自己的战争、革命的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再也不能进行了么？那末帝国主义只要以“投核弹”相威胁，我们就会



退却。

我們一旦抛弃了必須竭尽全力防止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的思想，开始认为必須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战争，那末，我們很快就会嫉視任何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武装斗争的开展，以及一切民族解放战争。认为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性质的概念已經过时的新理論，把这些事情从日程上一笔勾銷了。这正是那些抱有这种观点的人目前所力图做到的，虽然他們在实践中还不能完全把这一点付諸实施，而且将来也无法做到。

我們党正致力于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禁止核武器和禁止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武器，但是我們沒有忽視，这必須經過革命斗争。我們記得，尽管帝国主义进行了“核讹詐”，而且就在帝国主义掌握的核弹的阴影下，通过武装斗争，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越南北方、社会主义的朝鲜北方和社会主义的古巴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另一方面來說，帝国主义在哪个地方容許过和平地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几年在苏軍到达或者有压倒的影响的一些地方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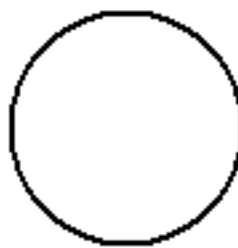
我們已經說过，今天在东南亚、南美、南非和許多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地方，存在使社会主义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可能性——只要我們的运动不在帝国主义核讹詐的威胁面前屈服。

但是，一旦让帝国主义看出，如果他們用核弹来进行威胁，我們的运动就会从我們的革命斗争中退却，那末他們就会大规模地进行这种威胁。他們必然会采取这种策略，因此，可以看到，这种恐惧，归根結蒂会把我們的运动引向什么地方去。

明明白白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它們的本性，是不会对别人发善心的，也不会諒解别人的恐惧的。事实上它們利用这种恐惧。他們也不会听取关于人类福利的議論。在我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在帝国主义沒落的时期里，在我們看来，最大的危险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全面退却。

我們也觉得奇怪的是，在关于帝国主义拥有核弹这一情况的种种新的談論中，社会主义世界也掌握了核弹这一事实似乎却被忽視了。幸而帝国主义倒沒有忽視这一点。阻止帝国主义“扔核弹”的这种威懾力量，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保证帝国主义在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不敢搞核讹詐的强有力的因素。

我們认为，把核武器問題而不是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动力是錯誤的。阶级斗争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管核战争的前景多么可怕，阶级斗争并没有被消灭。我們运动的斗争决不能局限于促使帝国主义奉行和平政策、不使用核武器，因为要有可靠的和平，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請看，即使在要迫使帝国主义实行和平政策的时候，有些党在实际上也已經撇开了在这方面的决定性因素——群众的作用。



讓我們再說一遍：我們運動的戰略目標是消滅壟斷資本，由工人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並以此為起點建設社會主義；而我們時代的主要策略集中點則是防止帝國主義戰爭，特別是防止核戰爭。

本世紀最大的謊言

因此，我們要談談人們正確地稱之為“本世紀的謊言”的言論，那就是不斷地指責中國共產黨領導主張通過核戰爭在人类的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代表團在莫斯科會堅定地說，不僅是資產階級的宣傳，而且還有一些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蘇共領導人在散布這種想法，從而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使有些工人得出社會主義的中國希望戰爭這樣的結論。許多人一向認為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希望戰爭，而現在他們不僅聽到帝國主義者說，而且還聽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說，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希望戰爭的，從而播下了不團結和失望的種子。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或者能夠讀一讀中國人自己究竟對這個問題是怎麼講的。據我們了解，中國黨的領導在他們的綱領或政策中從未這樣講過。事實上，他們一向主張以對全世界群眾的信心為基礎的積極的和平政策。他們親自肯定地對新西蘭共產黨領導說，他們不主張通過核戰爭實現共產主義。他們所說的只是，如果帝國主義者發動這樣一次戰爭，並不是一切都完了，人類遭受嚴重的損失後，將會生存下來，社會主義終將勝利。事實上，一九六〇年八十一黨聲明講的和這一樣！

但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們一九六三年九月四日在莫斯科回答上述的話時，再一次地說：

“中國同志頑固地宣傳這樣一種思想：通過一次熱核戰爭，在帝國主義毀滅的廢墟上，世界人民將會創造更好一千倍的文明和建設一個真正美好的生活。他們所說的是：消滅帝國主義，而用不着管整個民族和國家的毀滅；歸根結蒂戰爭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而且中國同志正企圖把我們的整個運動導向這個結論！他們懷着這樣的目的宣傳戰爭並不是那麼可怕。一九五七年，中國共產黨的主席在莫斯科提出過這樣的論點：如果人類毀滅一半，那也沒有什麼可怕，這將埋葬帝國主義。但是你們不想一想，所有的新西蘭人民可能在這一半人類里嗎？那末由誰來在你們的土地上創造美好的未來呢？問問你們的工人們，他們是否同意。”

中國人沒有講過這樣的話。我們知道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實際上是怎樣講的。我們黨的政治委員會委員阿·奧斯特勒當時作為新西蘭共產黨的代表出席了那次世界共產黨會議。

為什麼總是歪曲地引述別人的話呢？肯定是一個人理虧的時候才歪曲地引述旁人的話。



这不是任何自称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应当耽迷的一种习惯。

这給我們的世界运动造成极大的損害。

和平和民族解放斗争

我們坚持这一主张，即：对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各个方面，对于它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以及在为使社会主义取得进一步进展鋪平道路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必須給予充分的考虑

对于我們这些在新西兰的人來說，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問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帝国主义通过新殖民主义的門徑卷土重来的企图的失敗和东南亚从民族解放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为新西兰的进步打开了大門。这使我国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垄断資本的枷鎖，特别是摆脱美国政策的章魚般的控制，正是美国的政策使我們处于东南亚条約組織的最前綫，并且带来了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被卷入战争的危險。

我們已經指出，就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而言，我們认为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所起的极关重要的作用沒有給以足够的注意。还有某些其他方面，特别是关系到最近苏共政策的一些方面，使我們深感不安。对于帝国主义对东南亚和南美的傀儡政府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功，对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印度等国家里重新发展，或者对于过去一年中在伊拉克发生的更可悲的事件，沒有一个人能感到高兴。

在我們看来，下述引語似乎概括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般态度，这些引語虽然很长，但却說明問題：

“民族解放革命不是由于外界影响或压力引起的。它們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的直接結果。但是任何这种革命要取得成功，有利的国际局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应该結合新的和更为有利的国际局势来看过去十年中这一运动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它在这时已經形成——正在发展成为决定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步伐的主要因素。

“今天，社会主义大家庭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它的成員給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支持，是民族解放革命获得成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际因素。

“这絲毫也不会貶低殖民地、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群众斗争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人民没有表现出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沒有清楚地了解他們的最終目的，任何革命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但是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大多数新发展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口都較少，并且缺乏进行現代战争的手段和經驗。

“相反，它們的帝国主义敌手們却既有武器又有經驗。特别是它們有导彈，而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却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武器。



“虽然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但是它们并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一个年轻的国家的独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首先是苏联的支持，是保障独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苏联是唯一拥有制止任何侵略者的军事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每当帝国主义对这一或另一年轻国家进行侵略的时候，苏联的行动总能对它们起到使其神志清醒的影响——帝国主义者深知，苏联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它的军事力量来制止侵略（然后举出了关于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例子）。

“苏联的军事力量是如此显赫，以致有时只需要苏联政府发表一纸声明，便能促使西方国家不敢采取军事行动。例如，当苏联政府说，它将支持印度把果阿、第乌和达曼从葡萄牙法西斯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西方关于要对印度进行制裁，包括进行军事制裁的一切谈论都马上消声匿迹了（作者说在西伊里安问题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军事力量来自经济力量。这着重说明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对所有正在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国家的价值。这是一个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纲领。这个纲领实现以后就会使苏联在经济上具有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

“这样一来，苏联便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归根结蒂将使帝国主义没有能力为推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革命政府而发动侵略。

“因此，成功地执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是符合一切争取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利益的，也是符合这种解放运动的一切忠诚的战士的利益的。”

——引自一九六三年第二十六期《新时代》杂志所载尤里·

鲍奇卡廖夫的文章：《苏联和民族解放运动》。

实际上，这篇文章无非是说，发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们有武器又有经验。至于如上面所引述的关于争取群众的“心灵”，使它们想望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又是苏联，又是它所取得的越来越大的成就和日益增长的威力是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而不是人民的积极性，不是在斗争中的群众。

我们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它极容易不自觉地导致大国沙文主义，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采取了新的形式，但是其内容却仍然是可以感觉到的。

列宁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我们从他所著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提纲》一文中，引述如下的几段话：

“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二十世纪初叶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及中国爆发革命后，已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苏维埃政权，使这些群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它们成了世界政治和用革命行动摧毁帝国主义事业中的积极因素，但欧美那批有教养的市僧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却顽固地无视这



一点。”

我們知道，由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苏联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英勇努力，苏联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們知道帝国主义者发展了新武器。但是，我們不相信有任何事情能使得人民的斗争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事实上，在对待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方面，他們所說的和所做的却正是这样一些东西。

我們对像老挝和越南这样一些斗争激烈的地区的局势也感到不满意。在南越，存在着把斗争推进到使社会主义取得新的胜利——扩大社会主义世界——的可能性。把和平共处的政策运用到这种局势中来，是否意味着由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作出的一些官方的安排，社会主义在目前就必须局限在它現存的疆界之内呢？在研究了老挝等国家内的事态和人們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之后，我們认为实际上事情正变得非常接近于这种情况。

难道某些共产党不是往往把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好像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就会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好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新解放地区不起作用，而我們所熟悉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现在就不存在了吗？

我們认为，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結果是为新殖民主义敞开大門。人們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以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的态度来处理。列宁說：

“11.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

“第五、必須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組織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們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第六、必須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說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实行的欺騙政策，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經濟、財政和軍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們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以外，附属国和弱小民族別无生路。”

是否曾經鼓励印度党去贯彻执行列宁的路綫呢？他們最近围绕“保卫祖国”这个口号所提出的概念使我們不能抱有这种看法。



让我们暂时先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我们注意到，有人经常说必须在解放了的落后国家里建立工业，以便有足够强大的无产阶级基础来把斗争推进到社会主义的斗争。无论我们从哪一方面来看，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是在提出某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在目前不能考虑在新的地区争取社会主义的新胜利。难道马克思主义在过去曾经提出过否定非工业国家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理论吗？这种进展现在主要正是在这些地区发生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大概也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越南北方。

今天，帝国主义正在提供“援助”方面同苏联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就解放了的地区而言，它还是做得相当成功的。例如在印度，美援正在迅速增加。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是真正的援助，帝国主义的援助只不过是為了掩飾将来的剥削的一种外衣，促使在印度和诸如安哥拉、莫三鼻给等一些非洲国家内的新殖民地化得到发展，并且越来越猖狂地试图在其他地方，如在印度尼西亚这样重要的国家里进行这种渗透。但是，要解决这种问题并不能依靠许多修正主义的新理论，而是要依靠列宁在下面的引语中所提出的办法：

“如果我们不背叛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支持反对我们主要敌人即大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起义，只要这不是反动阶级的起义。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就是兼并者。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只有通过这种做法，在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才会出现前进的可能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才会比较迅速地消除。

我们的代表团是否得到了任何有力的答复，可以使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怀疑消除，使我们相信他们目前政策的基础是一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呢？答复是：没有。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对我们的代表团是这样说的：

“首先，你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工人运动对立起来。你们说民族解放运动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起着最重大的作用。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巨大的革命重要性，但是它不能在世界革命进程和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你们指责我们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没有足够重视民族解放运动，对于这个指责，我们已经一再驳斥过从中国共产党口中听到的这个指责了。

“我们的党纲对于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纲领说，新解放国家人民的力量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的力量在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中的



团结，是争取世界和平的最大因素。这个反映亿万人类的意志和力量的和平阵线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以及世界解放运动。

“你们谈到某些中心，东南亚和南美。你们痛心注意到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发展。我们有同感。

“沙文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增长是同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直接有关的。高士同志在一九六〇年的会议上说过，‘……它助长了这个国家里的反共宣传，这种歇斯底里是被用来反对这个国家的——这里讲的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我们要坦率地告诉你们，中国领导在印—中冲突中的政策，表明它从和平共处原则——包括万隆会议所确定的原则——后退了。它对印度共产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之不得不面临极端困难的处境。而你们却硬说是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危害了斗争中的人民。

“不是别人，而正是苏联给予了民族解放和反帝斗争以全面的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斗争中所使用的是苏联武器。许多新解放的国家是用苏联的援助和武器来保卫自己对付帝国主义的。一旦需要，苏联就毫不犹豫地全部力量投入斗争，古巴就是最生动的例子之一。”

在东南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可能性就这样被忽视了，而且也没有客观地研究一下像印度这样的政府到底在多长时间內仍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政府。苏联领导人断言，印度是对的，而人民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侵略者。但是，亚洲或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这样说过，而其中大部分国家还是非共产主义国家。事实上，他们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们说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有任何侵略的迹象。

请原谅，我们想问一下，尽管他们说了那些漂亮话，就他们对印度的政策而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顺便提一下，苏共的代表们在同我们的代表团的会谈中，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提到过新殖民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发现，这种事态发展很难同他们的公开的政策性言论相吻合。因为提到这种威胁会使人们再次同帝国主义正面对抗。

所有这一切导向何处？不仅导致我们的运动出现世界性分裂的危险，而且导致这样一种局面：今天再也没有人能谈论磐石般的社会主义世界并且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了。我们发现，有人对印度提供了大量援助，而印度本来就从来就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援助（附带说一句，我们的代表团在参加莫斯科双边会谈后回国途中曾在德里着陆，在那里的机场上我们看到一架美国空军的飞机就停在苏联提供的一架运兵和轰炸用的飞机旁边），但是却拒绝向社会主义的中国提供任何援助。这些人谈论什么维护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却拒绝对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

是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唯一的办法是坚定不移地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問題

争取比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群众摆脱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束縛的問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問題——是我们在新西兰的这些人特別关心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我们是采取根据长期經驗得出的看法——我們終生都卷入了这场斗争，尽管肯定地说，到今天为止，無論在哪里，还没有任何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已經存在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地区的情况下，修正主义再次提出这种主张：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問題的时候，意識形态問題是无关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包含广泛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党有工人階級的群众基础，它不是资产階級政党。

（这也是今天如此公开地表現出来的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新爱情的基础。）

列宁曾經称新西兰为“第二国际的天堂”。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在我国出現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在当时的几届自由党—工党政府执行的政策中出現。所以，就这个問題而論，我們有过一段漫长的历史。

我們认为，我們当前所关心的是，基本上是修正主义的理論已經把馬克思和列宁所闡述的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經典理論当作过时的或者在新条件下不适用的东西而摒弃了。这就在我們的世界运动內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及其理論和实践这个重大問題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使人們忽視思想問題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把社会民主主义說成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或者是不需要在思想上作任何根本改变就可以被爭取过来，成为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一支有用的同盟軍。

这不仅是危险的，使人們忽視我們共产党作为工人階級政党的领导作用，而且不可避免地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滲入我們自己的队伍打开方便之門。那样我們就会成为左翼工党的“鞭策派”，而不能看到左翼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资产階級思想的一种形式，它有时像右翼社会民主党一样对階級敌人有用。有时，它在出卖工人利益方面甚至比右翼社会民主党更有用，因为它用比較有战斗性的言詞来掩盖它的反动行徑。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性质的話，今天仍然是正确的。我們扼要地援引如下：

“事实上，‘工会运动的政治組織’或‘政治表現’这两个概念是錯誤的。

“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組成的。但是，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的，而且要看是誰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



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从这个唯一正确的标准来看，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最坏的反革命分子”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

但是，今天不是有许多人有忽视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主要因素的危險嗎？在我们看来，甚至连苏共纲领也没有提到这一点。苏共纲领說：

“历史經驗表明了社会民主主义既在意识形态上也在政治上的破产。即使在改良主义政党执政的时候，它们也只限于进行一些局部的、不触及垄断资产阶级統治的改革。反共主义把社会改良主义引入了思想政治的絕境。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自苏共纲领

并不是反共主义把社会改良主义引入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絕境。反共主义只是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思想观点的必然結果。

我們认为，这会造成把在这个問題上的战术与目标混淆起来的危險。我們的战术是尽一切可能同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群众联合行动，而我们的目标则是从劳动人民的脑海中清除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使他們树立真正的工人阶级观点，了解我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正确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群众自觉地支持我們共产党。我們认为，如果我們不这样做，那就是敞开大門让修正主义进来，并取消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产党。

我們认为，在新西兰按照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路綫，并結合我国情况圍繞着爭取和平和反对垄断資本展开更为有效的斗争的时候，我們所碰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工人思想的影响。对我们來說，建立工人阶级的統一战綫是起点。而在这方面，这种思想立即就起了阻碍作用。它使人們接受現狀，认为进行斗争是没有希望的，人們只需依賴工党領袖就可以了，而工党領袖的政策清楚地表明，他們本身就是垄断資本的工具。这种思想造成了一种观念，即“領袖們会安排的”，群众是无足輕重的，他們的全部作用只是每隔三年乖乖地投一次票而已。

这就是我們在新西兰所面临的情况。

在我们看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是维护帝国主义、即垄断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的一根重要支柱。列宁早就指出过，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变种。

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日常斗争中以及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同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受他們影响的工人群众一道，采取广泛的联合行动。但是，与此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須同社会民主党严格而清楚地划清思想界綫，并且努力把正直



的工人阶级分子争取过来，使这些人能够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开展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新西兰，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变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本身正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我们并不想制造一种幻想，以为在群众当中正在形成一种牢固地建立在斗争的基础上的工人阶级思想观点。情况并非如此，但是，相信新西兰工党下次当选后将会解决工人的问题这种看法却正在迅速消失。社会民主主义对工人所以能有影响，往往是依靠大多数产业工人认为工党比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要好一点这样一种不牢靠的情况。

我们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没落的时代，这种发展是合乎逻辑的。但是，我们担心，这一方面的情况并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明确地被指出来。相反，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正在改变的幻想似乎正在日益滋长。

列宁是怎样阐明社会民主主义在工人队伍中产生的呢？他认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列宁大体上是这样说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由于帝国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不严重影响当时不断增长的利润和帝国主义扩张的情况下，在各主要工业国家里造成一个“工人贵族”。列宁说事实上，由此所造成的工业化国家内阶级斗争的削弱，使他们在那个阶段的所有盈亏账上得到了盈余。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像某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什么资本主义在使人民群众得到较高的生活水平。不是的，那个时期是他们迅速扩展的殖民帝国进行最残酷、最严重的剥削的时期。但是，在现在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占有阵地的国家里，当时是有可能通过向劳工运动领导人吹捧夸赞，给他们荣誉，给他们拿干薪的差事，对最有能力的一部分工人，则在牺牲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利益的情况下让他们有较高的生活水平等等，来收买劳工运动的。统治阶级的这种手法，在我们现在称之为“西方”的整个地区以及当时的英帝国的某些部分，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普遍采用的。

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这样写道：

“拿占领殖民地和扩大殖民版图来说吧。这无疑是上述时代和多数大国的特点之一。

“这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资产阶级得到相当数量的超额利润和特权，其次无疑的是意味着极少数小资产阶级以及高级职员和工人运动中的官吏等等能够得到这些‘大块蛋糕’的一点碎屑。

“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在殖民地和特权的利益当中‘享用’一点油水，这样的事情在英国就有过，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承认过和指出过。

“但是在当时，只有英国才有这种现象，而随着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先后占领



大量的殖民地，随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就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现象。”

我們談這個問題是因为在我們看来，下面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說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因是如同列宁所論述的那样，那必然就意味着，現在，由于帝国主义在沒落，它从事剝削活动的范围在縮小，可以进入的新地区很少，而且由于帝国主义的世界危机也因而日益加剧，所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工人队伍中的物质基础也正在消失。

我們必須充分掌握住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正在衰亡的思想这一观念，并且认清它的种种含义。这样，我們各党在这些国家里的领导作用将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将有可能在坚持原則的条件下运用灵活的策略。如果我們不明确这一点，那就会作出不必要的让步，就会产生幻想，认为必要的統一战綫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就会认为抛弃社会主义目标的一切伪装的工党領袖，不再是老板的工具，不管是有意識的还是无意識的工具。

我們认为，今天在我們的世界运动中正是沒有明确这一点。我們希望能作出更加深刻的分析。

不幸，我們去莫斯科的代表团所表达的上述这些看法沒有得到任何贊同，虽然在会談結束时大家同意有必要更深刻地分析有关当前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并且表示欢迎我們参加作这种分析。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

无疑，这个国家里許多积极关心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人过去一直认为，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下所发生的情况，对新西兰來說，是一个有点学院味道的问题。

我們自己曾經一度陷入这个陷阱。但是，事实上，結果证明它不但对我們的整个世界运动，而且特别是对我們新西兰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南斯拉夫，我們从理論和实践中看到了一个背离社会主义的成就而开倒車的例子。之所以出現这种开倒車的現象，是因为他們把人們从列宁的許多著作中可以讀到的修正馬克思主义的早期修正主义者的理論付諸实行了。

因此，我們认为，批判地审查而不是欢迎回到我們的队伍来，才是我們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应当采取的态度。

我們认为，自从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以来，铁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情况絲毫沒有改变，而一九六〇年的會議极其严厉地譴責了它。他們可能进行了一些改良来消除南斯拉夫国内的某些弊病，但是，这些改良是在修正主义总的范围内进行



的。如上所述，我們认为这个问题同我們刚刚談过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整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是个重要问题。

我們认为，尼·謝·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初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代表苏共表示的目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是违反一九六〇年声明的。

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在保持南斯拉夫現存的“社会主义”和鼓励其发展的借口下，朝着欢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归队的方向走了第一步。如果要作任何修改的話，都需要經過世界性的集体討論这一点則被忽視了。

我們將引用我們党簽了字的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党声明中的一段話。这个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問題是这样說的：

“各国共产党一致譴責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陣营，使它依賴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所謂‘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們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結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我們并不认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有什么改变。但是我們认为另外有些人却是改变了。他們不再支持八十一党声明。我們要問，如果不經過集体研究就可以加以改变的話，那么作出决定又有什么用呢？

同时，我們要強調指出，我們絕對不应当在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的問題上发生思想混乱。这种关系的存在是正确的。但是我們說的是共产党人之間的关系，我們觉得，看到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而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却断絕了关系，这是令人非常不安的。

尼·謝·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說：“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們的言論中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还說：“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綱領实际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許許多多修正主义綱領的并不高明的翻版。因此，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是走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



說的道路，而是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其他叛徒所开辟的道路。”

我們同意尼·謝·赫魯曉夫当时的态度。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理論根本上是沿着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倒退，难道不正是这一事实才使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重要問題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仍然坚持他們在国际事务中的第三种力量的概念，那就是說他們繼續置身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正如尼·謝·赫魯曉夫过去曾經清楚說明的，这是背叛，那么，为什么現在却不是背叛了呢？

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领导作用应当縮小到次要地位，必須避免企业由国家集中管理，不应当实行农业集体化，他們的这种观点改变了嗎？沒有改变。今天，他們可能試圖糾正分散化所引起的某些重大弊病，但是他們只是作些拙劣的修补工作而已。我們重复一遍，他們的修正主义理論仍然沒有变，其結果也仍然沒有变——在工业上，存在着一种新的自由企业家，他們事实上是按照同资本主义公司的經理一样的原則办事的；在农村，小块私有土地正落入数目越来越少的一些人的手中。

我們认为，南斯拉夫新宪法只是证明了一九六〇年声明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問題的結論是正确的。我們不能认为米·安·苏斯洛夫對我們的代表团所說的下述这番話是有力的答复：

“关于我們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我們的印象是，在这个問題上，你們的了解是錯誤的——关于你（維·乔·威尔科克斯）在北京所談的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講話。我們希望，更好地了解事实会使你們回到較正确的立場上来。南斯拉夫领导人过去曾經犯了重大錯誤，我們曾經十分正当地本着有原則的方式批評了他們。但是，我們必須正視这个事实：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們有一个共产党，我們的国际义务是，不仅仅无休止地重复你們就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所講的話，而是应当尽我們的最大力量，幫助他們克服他們的錯誤，恢复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作用。不能說，我們所采取的这种行动是违反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

然而，当这种行动給予南斯拉夫和全世界的修正主义以更大鼓励的时候，人們就可以說这些行动是违反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了。我們过去就曾經說过这种行动会产生怎样的結果。我們現在仍然持这样的看法！

另一方面，人們可以問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不采取这种态度呢？他們在給新西兰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信中說过，他們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它的领导犯了“錯誤”。那么，为什么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呢？

苏联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同意修正主义是我們的世界运动中的主要危險，他們当时对把南斯拉夫领导人划为修正主义者並沒有疑慮。人們只能认为，他們在上述講話中所提到的錯



誤是指修正主义的錯誤。为什么可以同修正主义者紧紧握手以帮助他們，而拒絕同那些被认为是教条主义者的人紧紧握手或帮助他們呢？說什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罵人和誹謗人”太甚了，这并没有回答問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有着謾罵和誹謗苏共领导的突出的纪录，他們絲毫沒有道过歉，也沒有承认过錯誤。

这不仅是我們在这本小册子里多次提到的在原則和实践問題上的混乱的又一个例证，而且是同修正主义日益亲近的例证。难道不是这样嗎？

我們的話就說到这里吧。

結束語——在新西兰的任务

上面我們试图簡要說明我們对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分歧的一些重要的理論方面的观点。我們沒有特別挑出苏共领导来談，因为其他許多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我們之所以不能不談談苏共领导的观点，是因为他們的观点具有普遍的广泛影响。

可是，我們不能接受去年八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双边会談中苏斯洛夫向我們代表团表明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一看法，当时，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說：

“最后，我們請你們注意下述情况。一向对兄弟的新西兰共产党抱有兄弟般的同情态度的苏共中央，对新西兰共产党领导目前的立場感到不安。我們认为，你們党由于背弃宣言和声明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由于疏远了共产党兄弟大家庭，正在走上很可能給你們党造成严重損害的錯誤道路。

“我們认为，坦率地向你們指出，你們現在所持的态度可能給你們党、給新西兰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带来多么大的損害，是我們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們认为，我們两党——苏共和新共——之間的分歧还没有达到无法弥补的地步。而且，也没有客观原因妨碍苏共和新共恢复兄弟关系。如果新共领导表现出对当前事态有所了解的話，如果它設法争取到足够的力量来維護世界上絕大多数共产党現在所奉行的唯一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的話，它就会胜任它在当代复杂形势中所面临的重大任务。要这样做，現在为时还不算太晚。

“就我們來說，我們党将尽一切力量来保持一向标志着我们两党之間的关系的兄弟情誼和誠意，这种关系首先符合新西兰共产党的利益、苏联共产党的利益、你們国家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苏維埃社会主义联盟各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坦白地說，这番話很像是說：“要同意我們的观点，否則你們就不再是兄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一部分了。”但是，任何一个党都沒有权力作出这样的决定。人們把这种言論称作“揮舞指揮棒”。普通的新西兰人，無論是在共产党內，还是在共产党外，都不大可能接受这种态度。我們确信，苏共领导終于会認識到这种态度是多么不对，因而在同其他兄弟党举行任何討論时将不采取这种态度。



我們认为，对一些問題有意見分歧，并不排斥兄弟关系。事实上，我們同我們的代表团在莫斯科所会見的苏共主要代表的关系中也沒有发生任何这样的破裂。而且，下述事实也說明了这一点：在我們两党双边会談結束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和我們的代表团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其中还提到将进行进一步考虑和討論。这是非常受人欢迎的。目前，事情就处于这种情况。

在新西兰，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里，在圍繞着我們自己的党綱展开的活动中，在反对国际垄断資本越来越厉害的入侵的斗争中，在反对日益扩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影响的斗争中，在爭取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兰的斗争中，实践将证明我們的意見是正确的。

如果我們全神貫注于在国外进行爭論，以致忽略了我們在國內的經常活动，那将是致命的錯誤。我們的工作就在新西兰这里。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政策带到工业企业、輪船、矿山和农場中去。我們必須爭取到对这个政策的支持，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影响越来越大。

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衰落給我們党、給新西兰工人階級和所有进步人士不断带来新的問題。但是，它也为工人階級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机会。

我們这里反对像殖民制糖公司这样分布很广的垄断資本——这种垄断資本的活动严重地影响了我們的生活水平——的直接斗争表明，需要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有正确的思想認識。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这样一些方面，如我們爭取改善社会保险的斗争，爭取較好的教育和改善設備的斗争，爭取把税收負担加在大企业肩上和減輕工人、农民和其他收入少的人的負担的斗争。

我們在为新西兰工会运动制定一項更富有斗争性的政策而努力，这种努力牵涉到工会运动是朝着階級調和的方向发展，还是依靠階級斗争作为主要因素的問題。如果我們看不清資產階級国家的性质，我們就会开始认为，我們的“国家”——一个資產階級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而事实上，它保护的却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它对被剝削者不可能是“公平的”。

这就是我們在这本小册子里所扼要指出的意識形态對我們有直接影响的方面。

此外，我們还要竭力使那些认为工党能解決問題的工人和其他的人認識到，不管有多少工人参加它，工党今天也是一个支持大企业的政党，因此是一个資產階級的政党，而不是一个工人的政党。我們的这种努力是这场意識形态斗争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政策，不是人数或名称。这也就是我們对待意識形态問題的态度的最重要之点！

子

我們爭取和平的立場也是这种意識形态斗争的一部分。按照我們的立場，我們說，为了



争取可靠的和平，我们必须努力消灭帝国主义，而决不帮助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包含着现代战争的根源。

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对我们新西兰人确实是有很大影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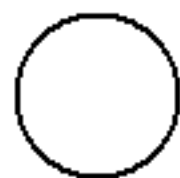
正因为这些情况，而且正因为我们的理由是正大光明的，所以我们直言无讳。新西兰共产党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广泛的兄弟关系的一部分，不仅有权，而且也有责任表明它的观点。这是我们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利益和为了我们新西兰运动本身的前途的利益所应尽的义务。

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如果发生分歧，应当采用辩证方法来解决。如果照这样做，那么就会出现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的了解和新的团结。这就是新西兰共产党在表明它的观点时所抱的期望。如果采取这种态度的话，目前的“争论”事实上会加强我们的整个国际运动。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创造性地把它们运用到一九六四年的世界局势中去。

因此，就我们运动在世界范围取得的进展来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瞻望未来。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的纲领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围绕它积极开展活动，那末，新西兰共产党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就会在工人和受国际垄断资本剥削的一切人中间日益扩大。

工党领导人一九三六年宣告来到的虚假的“红色”曙光已经消失。但是，我们可以像相信明天太阳会升起一样地相信，真正的红色曙光正在到来，新西兰工人将在新西兰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根据新西兰英·普林特出版公司一九六四年版译出】



馬來亞人民的經歷駁斥了 修正主義者的謬論

——紀念馬來亞人民武裝鬥爭十六周年

《馬來亞箴言》月刊

愛國的、反殖民主義的馬來亞各階層人民本月（六月）驕傲地紀念馬來亞人民向英帝國主義展開武裝鬥爭十六周年。十六年前，英帝國主義的武裝部隊凶惡地和背信棄義地屠殺了曾經幫助英國打敗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隊的英雄兒女；從那一天起，有人多次企圖蒙蔽馬來亞人民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起源和實質。

英國官方同一些無原則的“歷史學家”、無知的僱傭文人和革命事業的叛徒串通一氣，歪曲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馬來亞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為“恐怖”組織、“外國顛覆分子”的代理機構，等等。

對這些顛倒事實和歷史的人來說，遺憾的是，馬來亞人民這些年來所進行的英勇鬥爭是不能泯滅的真理的記錄；凡是不怕真理的人，都可以看出，誰是恐怖分子，誰是撒謊者。更重要的是，公正的觀察家可以親自看到，帝國主義者及其在馬來亞的代理人註定要完蛋。凡是不能從十六年來的證據得出這個結論的人，必定是愚不可及。

武裝鬥爭的正確性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馬來亞人民愛國力量，決定以武裝鬥爭對付帝國主義者的武裝進攻，這是極其正確的。暴力必須用暴力來對付。這是生存的第一規律，是科學的革命的的第一條準則。此外，某些禍害只能用暴力來鏟除，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禍害——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只有通過持續不斷的暴力行動才能鏟除。在整個世界史上，過去沒有，今後也不會有任何這樣的例子，即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勢力範圍內的民族、人民或集體能夠不通過某種形式的武裝鬥爭（即暴力）而獲得解放。當然，有一些靠帝國主義恩賜的所謂“自由”而獲得假“解放”、半“解放”和“獨立”的國家或集體。要是馬來亞人民要這種“解放”和“獨立”的話，他們



早就可以得到了。在过去二十年里，的确有人曾經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表示願意”給他們这种“解放”和“独立”；但是他們蔑視了这种“建議”，他們忠于馬來亞和全世界的反帝事业，并将永远如此。

在十六年前作出进行武装斗争这一重大决定时那些对武装斗争是否明智表示怀疑的人，很快就发现他們是錯誤的；因为他們越是向帝国主义的暴力和詭計屈服，他們就越是遭殃。这从反面來說，也是生存的第一規律和科学的革命的第一条准則。

共产党领导的馬來亞人民爱国力量对局势和問題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們由于作出了以人民的暴力抗击帝国主义暴力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从而使馬來亞免于遭到彻底的破坏和征服，而且对削弱亚洲和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要是当时沒有能够及时作出以人民的暴力抗击帝国主义暴力的正确决定并且坚持执行到今天的话，那么，就談不上今天馬來亞人民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也談不上等待着他們的光明前途。

暴力的作用和倫理

自从西方在十五世紀开始实行殖民統治以来，在过去五百年左右，平均每年发生两起有組織的鎮压人民的战争。这还不把所謂“綏靖”活动計算在內，而伴随着这种“綏靖”活动的是集中世紀的、中世紀以后的和現代的帝国主义鎮压之大成。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是同暴力分不开的。行动中的帝国主义（即从帝国主义开始出现到死亡为止）本身就是暴力的化身。因此，不論是在原子时代或在弓箭时代，只是通过对受害者施加最大限度的实际压力，也就是說，只是通过使用压迫国的非常有組織的武装部队，才得以征服其他民族的領土和蹂躪其权利的。

不論在原子时代或在弓箭时代，統治和暴力始終是压迫国的日常陰謀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也是事实。压迫者“統治”他們“自己的”劳动人民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对压迫者同被其套上殖民主义枷鎖的人民之間的关系來說，更是如此。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在侵略国初期用武装力量和暴力行动对一个民族实行征服和鎮压之后，对殖民地的被征服、被压迫和被剝削的民族來說，也不存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东西。在征服的初期以后，仅仅沒有采取軍事行动这种現象不管持續多久，适足揭穿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剝削和鎮压的真实性质。

那些根据第一手材料研究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尤其是身受殖民統治之害并起而斗争的人，很容易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初期軍事征服行动的結束，仅仅标志着一个长期



的、折磨人的暴力“綏靖”阶段——英国官員們所謂“維持法律和秩序”阶段——的开始。从下面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上述这一点是多么千真万确，在每一个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由于“綏靖”和“維持法律和秩序”行动而死于非命的人数甚至远远超过在軍事征服的初期被杀害的人数。

最后，在压迫国的“法治”“确立”的时候出現的所謂“保护”和“和平演变”时期內，死于純粹的剝削、貧穷和疾病的人数，甚至超过初期的軍事征服时期和“綏靖”时期死亡的总人数。馬来亚的情况就是这样。过去和現在的每一个殖民地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关于曾經有过或者可能有过所謂殖民主义“和平地”来临或保持之类的說法，适足揭穿压迫者自己或其代理人編造的神話，其目的在于欺騙他們現在的和可能的受害者，和窒息公众发自内心的責备的声音。

馬来亚人民和一切爱国的和爱好自由的普通人民一样，从来沒有主张过——更談不上实行过——为暴力而暴力。他們热切地珍視和平；事实上，他們在为抵抗法西斯占領者作出輝煌的和无私的牺牲之后，正在为和平地取得政权作准备的时候，却被他們在战时的“同盟者”（英国政府）凶暴地、背信弃义地从背后刺来一刀。馬来亚人民也不得不重新認識到，帝国主义永远不会改变它的本性，“英国統治下的和平”，正像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一样，是奴役、民族消灭和死亡的“和平”。

那些爱从哲学上来談暴力的伦理的人应当記住，世界上沒有使用暴力的特权这回事。这种“哲学家”怎么能够当真认为，拥有最大的战舰和轰炸机的国家可以用暴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別人却由于某种神圣禁令的約束不得使用暴力来自卫呢？如果这种“哲学家”的論点在不容置辯的事实面前站不住脚的話，那末，他們散播他們片面的“伦理”究竟目的何在呢？說穿了，他們的“伦理”原来是海盜、掠夺者、杀人犯、十足的伪君子的“邏輯”和“伦理”！他們实际上是說：“伙計，別忙！我扭断你的脖子，这沒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想踢我一脚，那就是彻头彻尾錯誤、不道德的恐怖行徑”！

解放运动和共产党的事业是无懈可击的

在良心和志向上洁白无瑕的人捍卫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武装斗争，是沒有任何顾虑的。他們的思想 and 感情不受任何隐私的搅扰，这种隐私像某种見不得人的恶癖一样，是由适应某种特殊需要的药物养成的。帝国主义和他們的辯护士典型地表现了双重标准和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无恶不作。看看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礼拜天在教堂里祈禱“和平”、礼拜一却去枪杀某个人的儿女，这确实是上了一大課。馬来亚天天都有这样的事情，过去有，現在也还有；



毫无疑问，凡是帝国主义插足的地方，这种事情过去天天有，现在也还是天天有。

马来亚爱国者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知道，不论怎样诡辩，怎样哄骗，这种事情是抹不掉的。事物产生的过程是：旧的不破，新的不立。

关于这一点，在旧秩序（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中占压倒多数的西方国家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们的统治阶级本身也经过了同样不可避免的暴力推翻旧事物——封建社会——的阶段，然后才能建立它的霸权，统治的资产阶级的霸权。

早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就在世界各地发出根本性的警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秩序的末日已经开始。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被压迫国家人民纷纷取得胜利，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秩序进入最后土崩瓦解的阶段。

这一事实是如此明显，甚至帝国主义者自己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几年前，当时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谈到殖民地的“变革之风”时，事实上就是带着恐惧和忧郁的心情反映出帝国主义者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他的政府企图阻擋这股“变革之风”，或把它引入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某种安全的轨道，但是被压迫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还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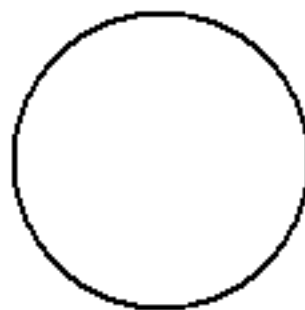
因此，无论是根据历史的规律还是帝国主义者自己主观的承认，被压迫国家人民走向自由的突飞猛进，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在道义上和伦理上是完全无可非议的，肯定是不可战胜的。

在作出走上这条斗争和破旧立新的道路的决定时，共产党所领导的马来亚爱国者不仅没有理由感到遗憾，而且有一切理由感到高兴，因为自己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完全正义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的一边。了解了这一点，他们将更加意气风发地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直到达到光荣的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的腐蚀

现代修正主义的发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许许多多麻烦，如果说马来亚解放运动没有身受其害，那是无益的。

是的，马来亚也有其现代修正主义的份额。我们的花园也受到了这种流行病的侵袭。马来亚人不必因为承认这一点而感到羞耻。承认是说明决心进行自我改造的第一步，这显然是健康的、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马来亚解放运动也不免受现代修正主义之害，任何人无需为此感到吃惊。马来亚毕竟是



一个殖民地；正如在历史最悠久和最受尊敬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堡垒——苏联——发生的这种可悲景况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免于这种疾病之害。即使在全世界消灭了帝国主义之后，也不能說人类的思想就能完全不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自然，由于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桎梏，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存在以及倒退的准则和实践复辟的物质基础也就随之而缩小。但是，除非把革命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作为争取解放、巩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的过程的一部分来进行，否则就可能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一、較老一代的有些人可能回到旧有的思想作风中去；二、在較年輕的一代中（他們沒有经历过革命思想、生活和斗争的严格的锻炼），有些人可能犯上一种新的社会病症，而仿佛这是新社会带来似的。

仍处于殖民地地位的馬來亞如何能免于已經侵襲了一些远为强大的堡垒的病症呢？現代修正主义——正如其历史上的前身古典改良主义一样——是帝国主义武器庫中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者镇压被压迫国家人民，使他們陷于混乱和分裂时，所凭恃的不单单是武力。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还借助于心理战——英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特别擅长。帝国主义者在他們的心理战中所使用的“秘密武器”之一是散播假革命的，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假反殖民主义的思想。这比原子弹危险得多，因为它们通常是以革命的，甚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色彩很好地伪装起来的，并且是由重要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甚至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成員散播的。

乍看起来令人吃惊的是，在世界上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注定要失败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社会主义和反帝阵营的大門口竟然受到帝国主义心理作战部門散布的意識形态細菌所带来的最有毒性的传染病的袭击。然而，再思索一番，这种矛盾一点也不奇怪或令人吃惊，虽然这显然是严重的。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意識到自己的末日就在眼前，因此把最后一件最危险的秘密武器投入了战斗。在工人阶级反帝运动的整个历史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統治阶级的最危险的秘密武器向来是制造思想混乱、进行歪曲和传布修正主义。镇压馬來亞解放軍的前英帝国主义部队司令田普勒將軍正是由于使用了这种武器，命令他的軍隊把屠杀同“争取人心”結合起来，从而从他的帝国主义主子那里得到了高官厚祿。英国殖民当局使用了类似的武器，收罗英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叛徒，在馬來亞人民中間鼓吹現代修正主义的理論。这些叛徒也得到了他們的帝国主义主子的豢养。

关于帝国主义者的心理战的这种例子既不新鮮也不罕見。总的說来，馬來亞人民已經通过“反面例子”从帝国主义者的丑剧中吸取了教訓。但是，馬來亞人民，特别是爱国者必須从



現代修正主义的发作中吸取教訓。除非把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民族独立的日常斗争的一个主要部分进行下去，否則这场斗争就可能遭受严重的障碍。作为这个重新估計和全国性自我整风时期中的第一步，馬來亞爱国运动的各个部分必須有条不紊地揭露和清除它們的活动各阶段中出現的修正主义思想。

他們必須警惕帝国主义的阴险宣传，这种宣传說什么現有的意識形态分歧只是或者主要是“莫斯科和北京”的事；或者說这只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事；或者說这种問題只同理論家有关，等等。帝国主义者传布这种宣传，其目的不仅是要解除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武装，而且是要解除广大的爱国反帝运动的武装。現代修正主义的病菌襲击着每一个人，不論是共产党人还是僧侶，不論是理論家还是空想家。这些問題也不能是“最好留給莫斯科和北京”。采取这样的态度（又是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在煽动），如果不予制止，其結果将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不能对国内外的反帝斗争作出貢獻。

如何識破現代修正主义思想并与之作斗争

只有勤奋和建設性地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別无他途。沒有健全的、日益加强的意識形态基础以及察觉、識別、决断和行动的能力，就不能胜任应付所面对的任务。

務必反对理論学习方面两种同样有害的傾向。一种是在具有資产階級教育背景的那些人中間普遍存在的有害的知識分子抽象主义傾向。这种傾向表现为傲慢地脫离构成革命运动的不可分割部分的人物和事件。只要看一看同取得成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形成对照的那些遭到失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状况，就可以看出，一个由知識分子抽象主义者领导的党，能在短短的时期里变成怎样无用的东西。

另一种傾向是“在思想上当懶汉”，那就是一种小資产階級情緒，这种人事实上在說，工人階級錯不了，因此不需要理論。有这种言論和这样工作的人落到如下的下場时不能怨誰：自己站在一个新法西斯运动的前列，而这个运动是由来自工人階級和农民中一向瞧不起理論的一伙蜕化墮落的最卑鄙的流氓无产階級組成的。

在反帝队伍中，上述两种傾向都是不能容許的。任何时候都必須提高政治觉悟水平；否則，帝国主义的新的阴谋詭計或新殖民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所施展的阴谋詭計就会得逞而在爱国者队伍中造成大破坏。

現代修正主义的阴谋詭計是不难識破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辯护士会用辞藻和政治姿态伪装出一副革命架势来，这正是他們的不可避免的弱点之一，但只要稍加追究，他們的帝国主



义和反革命的真正本性总是可以揭发的。

馬來亞共产党在最艰苦的年代里对馬來亞人民解放斗争的坚强和明确的领导，一直是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阴谋诡计的唯一最大的障碍。有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馬來亞人不惜从帝国主义的垃圾堆里捡起诸如“共产党不能领导”、“沒有影响”、“采取了錯誤政策”等等污蔑来中伤馬來亞共产党。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臭名远扬的现代修正主义领导，也玩弄起誘騙馬來亞的久經考驗和最忠心耿耿的党的把戏来，他們无疑希望为建立修正主义的领导打开一个缺口，以保证馬來亞奉行同西方帝国主义“和平合作”的政策。

“馬來亞”的严峻考驗

由于馬來亞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已經順利地展开了反对危险的帝国主义阴谋——“馬來亞”的斗争的新阶段。今天，从反对“馬來亞”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发展开来的馬來亞內外的范围广泛的反帝行动，已成为全面反帝斗争战场之内的一个主要部分。

在反对“馬來亞”的运动中已經积累起丰富的經驗。无疑，这些經驗中有許多現在已經为今后的行动提供了无可估价的教訓。

反帝斗争的反“馬來亞”阶段也是对朋友和敌人的一次严峻的考驗。由于馬來亞解放运动决心把对抗“馬來亞”的政策执行到底，它在国内外赢得了許多朋友。与此同时，許多假朋友被揭穿了，其中主要的是现代修正主义“同志”，他們企图灌輸他們的同“馬來亞”和解或“緩和”对抗政策的思想。

时过不久就发现，跟着国外某些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走的这些“同志”，实际上是把“馬來亞”作为既成事实而接受下来，一有机会就企图推銷他們的背叛政策。凡是真正反帝的人都不能在“馬來亞”問題上妥协。必須粉碎“馬來亞”，必須根除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占领和压迫机构，然后才談得上停止反“馬來亞”的运动。

不仅如此；反“馬來亞”运动的現阶段必須加紧和加强，来同現在在东南亚达到新高潮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結合起来。一九四八年六月以来，民族解放斗争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因素，其中主要的因素是，美帝国主义对在印度支那地区的馬來亞的近邻发动了不顾一切的进攻。馬來亞的爱国者可以为他們声援相邻地区的兄弟姐妹而感到自豪。馬來亞爱国者不管处境怎样困难，一向毫不犹豫地給予他們的反帝同志以兄弟般的支持。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和加强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不断高涨，是馬來亞共产党不辞辛劳进行领导的直接結果；因为馬來亞共产党取得了这种成就，它就遭到揮舞指揮棒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铁托



之流的朋友們的怨恨和煞有介事的“非難”。

民族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的发展和加强，也是对一些时候以来折腾某些地区解放运动的地方“革命家”及“和平演变者”派的胜利。地方观念和議會政治的白痴症必須从馬來亞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清除掉，因为这是滋长现代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主要場地之一。

历史的裁判

那些反对或者阻撓馬來亞人民爭取自由的斗争的人从两种立場出发：一、帝国主义者立場，二、现代修正主义者立場。前面一种立場是容易了解的，不需要加以解释。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立場却比較复杂。现代修正主义者会大叫大嚷說他們也反对“馬來亞”；但是他們反对并企图破坏对抗“馬來亞”的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制造紧张局势”，“有可能引起战争和全面大战”。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声称他們支持馬來亞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他們公然放肆地攻击馬來亞人民的武装斗争是胡乱浪费生命，是想“壮丽地死去”的幼稚表现，他們无耻地扶植資產階級改良主义的“領袖”来把馬來亞革命引入“安全的”軌道。现代修正主义者宣称他們尊重被压迫人民自决的自主权利，但是他們却协同发起帝国主义势力在作恶的联合国向馬來亞和其他发生激烈斗争的地区派出“調查”小組、甚至派出“監察”小組，企图利用所謂的“联合国部队”去压制爱国者的解放力量，由此可見，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在馬來亞制造一个“剛果”的危险是始終存在的，必須对此保持最大的警惕。

在过去十六年中，馬來亞爱国者所担当起来的具体任务是艰巨的。历史决定了东南亚将成为帝国主义的坟墓之一；这个地区的爱国人民有多年的宝贵經驗和极其丰富的传统，他們以只有善于把痛苦化为力量的人才具有的决心和坚定性，一定能够完成埋葬帝国主义的任务。历史的裁判已經給帝国主义下了判決；这也就等于在这场斗争中已經打赢了一半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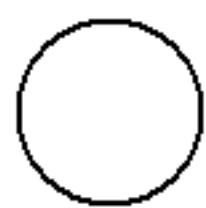
馬來亞人民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团结一致，加强决心，以使最后的解放加速实现。

【原載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馬來亞箴言》月刊】



红旗增刊

HONGQI ZENGKAN



一九六四年 第2号



红旗 增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二号 ★

目 录

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

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郑言实 (3)

前言 (3)

一 捍卫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理论 (4)

伟大列宁的形象不容歪曲 (4)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7)

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9)

通过暴力革命,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12)

应当有一个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14)

二 捍卫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16)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前途的两种根本相反的回答 (16)

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能的 (18)

否认一国能够建设成功社会主义, 就是背叛无产阶级

世界革命 (21)

.....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一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 (22)

以反对斯大林为名反对列宁主义 (24)

三 坚持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 (26)

 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不作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26)

 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内部积累 (29)

 批驳托洛茨基的“世界分工”论 (31)

 批驳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政策 (33)

四 为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而斗争 (35)

 不择手段、毫无原则的托季联盟 (35)

 所谓“恢复”列宁的党内制度究竟是什么东西？ (37)

 为什么这样恶毒地攻击斯大林？ (39)

 一再挑起争论，一再扬言停战，直到最后被粉碎 (40)

五 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到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的政策 ... (43)

 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 (44)

 在粮食战线上反对富农及其代理人的斗争 (45)

 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工农联盟不包括富农，必须消灭富农阶级 (48)

六 农业集体化是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 (49)

 不改造小农经济，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避免 (49)

 农业集体化要有准备，要遵循自愿原则 (51)

 坚持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 (5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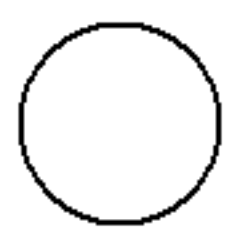


七 批判布哈林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56)
富农和资本家决不能自流地“长入”社会主义	(56)
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	(58)
必须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60)
八 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62)
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决不意味着革命的死亡	(63)
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	(64)
争取广大工人群众，使工人阶级革命化	(66)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67)
对机会主义决不能姑息迁就	(69)
九 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71)
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71)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巨流的汇合	(73)
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革命	
斗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的道路	(74)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支援殖民地革命，不能害怕得罪帝国	
主义	(76)
十 结束语	(78)

☆ 九月十二日出版 ☆







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 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郑言实

前 言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行胜利斗争的时候，曾经指出，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被击败后，一定还会出现新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

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这个科学论断。

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在列宁坚持不懈的斗争下可耻地破产了。列宁主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终结。在列宁病重的时候，托洛茨基等人就对布尔什维克党发动过一次反列宁主义的进攻。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接着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猖獗地活动起来，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既然先后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就面临着—场新的严重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资产阶级处心积虑要消灭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国内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时刻图谋复辟，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代表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企图从内部攻破布尔什维克党的堡垒，瓦解苏维埃政权。

面临着这些叛徒的挑战，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挺身而出，团结一切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担当了起来。

正是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同国内外一切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从一九二四年起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又同布哈林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正是斯大林，帮助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清除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



主义在各国的流毒，并且进一步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恶劣影响。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所进行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来，继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之后的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论战。

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在这个时期，斯大林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作了锐利的批判，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精辟的阐发。斯大林的著作，尽管对某些问题的阐述有不够确切的地方，或者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总的说来，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中的不朽文献，是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财富。

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坚持了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保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把一个落后贫穷的俄国建设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在很多方面帮助了各国共产党人，引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继续前进。

斯大林为苏联人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这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谁要想全盘否定斯大林，谁要想从历史的石碑上抹掉斯大林的伟大功绩，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而遗臭万年。

现在，我们来重温一下斯大林光辉一生中的这一段光辉的历史吧。

一 捍卫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伟大列宁的形象不容歪曲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与世长辞了。

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沉浸在悲痛中，决心以更加顽强的战斗和劳动来弥补因列宁逝世而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成千累万的群众，为了把列宁的事业推向前进，纷纷要求加入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很短的时间里，有二十四万多先进工人被接受为布尔什维克党



党员。

一月二十六日，列宁的学生，列宁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宣誓遵守和执行列宁的遗训，不遗余力地保卫布尔什维克党的纯洁和统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农联盟，加强红军；宣誓遵守和执行列宁的遗训，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积极支持西方和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加强苏联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斯大林这个著名演说，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体劳动人民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

同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相反，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托洛茨基，却起来攻击列宁，诋毁列宁。他迫不及待地写了《论列宁》、《十月革命的教训》等著作，肆意伪造历史，歪曲列宁形象，一面无耻地自我吹嘘，把功劳归于自己，一面恶毒地破坏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威信，把错误推给别人。

揭穿托洛茨基对历史的捏造，保卫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这个光荣任务落到了斯大林和他的战友的肩上。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斯大林作了《论列宁》的演说，十一月，斯大林作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一一揭穿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吹嘘和捏造。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就独自想出了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所制订的路线，即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

斯大林说，胡诌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是极其荒唐的，是把“小茅舍同勃朗峰相比”^①。事实上，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刚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就认为必须和托洛茨基划清界线，曾经几度声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毫无共同之处。

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说，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处于地下状态，曾经犯过错误，不是起义的领导者，十月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托洛茨基。

斯大林驳斥了这种奇谈怪论，指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只是执行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决不是什么十月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和“中心人物”。斯大林说：“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现在企图以地下状态为辞来抹杀党的领袖弗·伊·列宁是起义的鼓舞者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愚蠢可笑的。”^②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而在国内战争时期则是使战争获得胜利的唯一或者主要的组织者。

斯大林说，真正的革命者，不仅在革命胜利起义时期应当表现勇敢，而且在革命退却时

^{①②}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0、285页。



期也应当表现勇敢。但是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即在革命暂时失利时期，却张皇失措、畏缩退却了。在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正是抵制了托洛茨基的作战计划，才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反革命叛乱。

托洛茨基在他所著的《论列宁》一书中，阴险地把列宁描述成为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重要问题的官吏，描述成为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

斯大林根据列宁伟大的一生，驳斥了这种卑鄙的捏造。他说：“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领导集体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而突然地决定问题。”“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但是党也知道列宁是谨慎的，他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地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党知道列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深湛的理论家和最有经验的革命家，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①

斯大林彻底驳斥了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诬蔑，并且在自己的演说《论列宁》中，把天才革命家列宁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刻划了出来。

斯大林在这篇著名的演说中指出：

列宁“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雄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② 列宁在斗争中遭到暂时失利的时候，决不灰心，而是精神百倍地鼓舞自己的同志去作新的战斗，争取胜利。列宁处于胜利者的地位的时候，决不骄傲，而是更加冷静地估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为巩固胜利和彻底消灭敌人而斗争。

列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决不随波逐流。当俄国党内的孟什维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猖獗的时候，虽然跟随列宁的只是少数，但是他仍然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逆流而进。“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③ 正因为列宁坚持了革命原则，他就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把多数争到自己这方面来，在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①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7、308页。

②③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8、52—53页。

* 法国的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家，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统治。但是，他错误地认为，不必依靠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只要通过少数人的密谋和恐怖活动，就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思想被称为布朗基主义。



中成了胜利者。

列宁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能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①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像鱼在水里一样。’因此，列宁的策略口号是‘惊人的’明确，列宁的革命计划是‘出奇的’大胆。”^②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托洛茨基之所以诬蔑列宁，自我吹嘘，是为了反对列宁主义，偷运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说：“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的’（不要笑！）思想体系。”^③由于列宁主义享有崇高的威信，托洛茨基不敢公开反对列宁主义，“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④

托洛茨基为列宁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定义：“作为革命行动体系的列宁主义，就是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嗅觉，这种社会领域里的嗅觉，如同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一样。”^⑤斯大林在嘲笑这个所谓“定义”时说：“把列宁主义看做‘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这岂不是又新鲜，又奇特，又深奥。你们懂得一点什么了吧？（笑声）这些话都很漂亮，很像音乐，还可以说，甚至很雄壮。只是缺少一点‘小东西’：简单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宁主义定义。”^⑥

托洛茨基还散布一种谎言：列宁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才产生的，在这以前，如果说有什么列宁主义的话，那它也是不正确的；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由于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实现了“思想上的改造”，列宁主义才变得正确了。

托洛茨基诬蔑列宁主义的谬论，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附和。一九二五年，他们公开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列宁主义。季诺维也夫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

①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6页。

③④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1、304页。

⑤ 转引自《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4页。

⑥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4—245页。



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①。这个定义，也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才产生的，并且把列宁主义说成是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只适用于落后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从而否认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

这样，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就摆着一个任务：保卫列宁主义，阐明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教育广大党员特别是新党员，从思想上埋葬托洛茨基主义。

同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虽然已被列宁粉碎，但是它的阴魂不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许多年轻的共产党队伍中，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必须继续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各国共产党，以便把各国的革命斗争推向前进。

适应这些需要，斯大林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一九二四年四月，斯大林作了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以后，斯大林陆续写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有力地捍卫了列宁主义，论证了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国际意义，总结了列宁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许多新贡献。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为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他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②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斯大林又说：“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第一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产生的。其所以正确，第二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其所以正确，第三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③

斯大林在阐述列宁主义的定义时指出：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不同，列宁战斗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革命爆发的条件日益成熟；殖民地附属国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

① 转引自《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14页。



益尖锐，它们之间的斗争使它们互相削弱。帝国主义不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实践问题，而且造成了直接冲击帝国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里，列宁总结了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的条件，揭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颠扑不破的真理，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列宁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而不仅仅具有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俄国一国的意义。”“我所说的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件具有国际性，或者说，这些事件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应该承认，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这样的国际意义。”^①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这个论断说：“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说。”^②

列宁主义以俄国为策源地，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时代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并且，当时只有俄国才有解决这些矛盾的现实力量，那里掀起了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无产阶级，它拥有革命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军。因此，当时的俄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革命中心的发展变化，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只能产生在伟大的革命斗争当中。斯大林指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革命运动的中心在德国，因此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二十世纪初，革命运动的中心转向俄国，因此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说：“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抛弃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预备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预备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斗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对第二国际的骯髒马厩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列宁主义的肩上”^③。正是在这个斗争中，列宁复活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斯大林透彻地阐明了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作的新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页。

②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8页。

③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3页。



貢獻。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的无产階級革命論，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那些葬送无产階級革命的“理論”，是根本对立的。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不顾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說什麼在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无产階級不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国家，就不能够而且不应当进行无产階級革命。

斯大林駁斥說：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說证明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階級革命的前夜。由于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已經成熟到了爆发革命的程度，因此，这个体系中个别国家工业不够发达，无产階級不占人口多数，就不能成为进行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具有高度觉悟的革命无产階級，把绝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結在自己的周围，就能够而且应当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应当把无产階級革命看作純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結果，“首先应当把无产階級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結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綫的鏈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結果。”^① 斯大林着重指出：“帝国主义战綫的鏈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几，农民占百分之几等等的地方被突破。”^②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階級革命仍然不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接連不断地爆发胜利的无产階級革命，那末，一个国家的无产階級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这是托洛茨基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謂“不断革命論”的一个基本內容。

斯大林指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說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由于帝国主义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由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无产階級革命首先在个别国家内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維埃政权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胜利，证明了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階級革命的这个新原理的正确性，宣告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理論”的破产，宣告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論”的破产。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取消无产階級革命的另一个“理論”是：资产階級民主革命不能够轉变为无产階級革命，这两个革命之間隔着一座万里长城，隔着一个长达几十年的間歇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本主义将繁荣发展，而无产階級则应当忍受剝削。托洛茨基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謂“不断革命論”的另一个基本內容，就是混淆资产階級民主革命和无产階級革命的界限，主张跳过资产階級民主革命，抛开农民，由无产階級匹馬单枪地进行无产階級革命。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造謠說，在资产階級民主革命和无产階級革命的关系問題上，

①② 《論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6、87頁。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观点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是一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又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指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①。斯大林又指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诬蔑相反，正是列宁发展了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抛弃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一九〇五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就明确地阐述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論。这个理論，把民主革命看做革命的第一阶段，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革命的第二阶段，主张尽快地走完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则否认农民的革命性，主张越过革命的第一阶段，主张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实际上就是取消革命。这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毫无共同之处。托洛茨基只是窃取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詞句，而“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②斯大林說：“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領”^③。“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④。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既然根本不想引导群众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也就不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军的问题。他们轻蔑地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抹杀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在这些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

斯大林曾经多次指出：各国劳动农民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支伟大的直接同盟军。伟大十月革命开始的^⑤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在国内必须同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在国外必须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斯大林說：“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⑥他又說：“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

①②③⑤ 《論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8、93、91、110頁。

④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2頁。



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末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①。

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承认不承认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从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分水岭。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革命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制范围内，依靠和平的议会斗争，来更换内阁。他们宣称，不必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斯大林批判了这种谬论，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使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即无产阶级去执掌政权，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他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②“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③“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府的更换，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④

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种统治，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⑥斯大林强调指出，列宁一向反对模糊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政权。他引证了列宁的这段名言：“那个夺得了政治统治的阶级，是在意识到它是独自夺取政治统治时夺得了这个统治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内容。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夺取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普选的、全民视为神圣的’政权的空

^{①②④⑤⑥}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7、104、101、102、103页。

^③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页。



話来自欺欺人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才有意义。”^①

季諾維也夫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性质，胡說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领导的政权。斯大林批駁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它的阶级性质、綱領、任务来看，都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条件下，这个无产阶级独裁表现于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这个政党不与也不能与其他力量或其他政党分享国家生活的领导权。”^②

同时，斯大林又批駁了托洛茨基所謂无产阶级专政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的謬論。斯大林說，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和农民劳动群众結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才能确立并贯彻到底。”^③

斯大林还深刻地論述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原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必須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会进行拚命的反抗，以图恢复他們被夺去的天堂。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国内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具有牢固的联系，而国际资本总是力图破坏和扼杀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列宁的这些科学分析，斯大林在《論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說：“取得政权——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由于許多原因，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因此，全部問題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④

斯大林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規模和成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⑤。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負的历史任务主要有：“打破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們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级”^⑦，“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⑧。

要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需要很长的时间。斯大林說：“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

① 《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0頁。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結論。《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4頁。

③④ 《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31頁。

⑤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7頁。

⑥⑦⑧ 《論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6、97、99頁。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①

在这整个历史时代中，无产阶级专政会经历各个不同的时期。但是，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一任务或某一方面抽出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的唯一的特征，如果这样，就是歪曲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根据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写道：“在国内战争时期最明显的是专政的暴力方面。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不进行任何建设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明显的是专政的和平工作、组织工作、文化工作、革命法制等等。可是同样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建设时期专政的暴力方面已经消失或可能消失。现在，在建设时期中，也像在国内战争时期一样，镇压机关、军队和其他组织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些机关，专政就不可能稍微有保证地进行建设工作。”^②

斯大林就是这样明确地阐明了列宁主义关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

应当有一个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建立一个与“左”右倾机会主义彻底决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

被机会主义所统治的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拒绝率领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事实上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无产阶级容忍这样的党作领导，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就会使自己的斗争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

俄国的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根本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经济派的继承者孟什维克，力图缩小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主张建立一个没有定型的、成分复杂的、涣散的党。孟什维克中的许多人后来堕落成为取消派，公开抛弃党的革命纲领，主张取消党。而托洛茨基则是取消派的热烈拥护者，同取消派勾结在一起成立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八月联盟。托洛茨基一贯力图按照托洛茨基主义来建党，力图把党变成为脱离群众的宗派组织。他反对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要求党允许机会主义派别有活动的自由。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同俄国经济派、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建立和巩固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这个党的领

^①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9页。

^②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1页。



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赢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赢得了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胜利，建立和保卫住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的丰富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他说：“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①

斯大林概括地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党的特点，他指出：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它应当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无产阶级政党唯一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站在无阶级的前面，同时又和广大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把各个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当具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纪律，绝不允许存在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和派别组织，要同一切机会主义派别进行坚决的斗争。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当而且能够领导无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使这些组织按照一个方向，彼此协调地进行工作。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的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既要镇压剥削者，又要教育、改造小商品生产者和巩固无产阶级内部的劳动纪律，既要战胜资产阶级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又要战胜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反抗。要完成这样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没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②只有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无产阶级政党才会消亡。

无产阶级政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里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它如果不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就不能保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就会使自己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就会使自己受到机会主义的宰割而

^①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9页。

^②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5页。



不再成为革命政党。如果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进行破坏活动，“那末我们党就不能走上大道，就不能取得政权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①

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在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遗毒的斗争中，在引导布尔什维克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中，在帮助各国共产党人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推进本国革命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 捍卫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前途的两种根本相反的回答

在一九二〇年，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叛乱之后，苏联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来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到一九二五年，苏联人民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国民经济基本上接近和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在这一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资产阶级镇压了德国、保加利亚等国的革命，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暂时局部稳定的时期。

斯大林在分析当时苏联的国内情况和国际情况说：“目前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各国和我国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是我国内部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世界资产阶级企图在经济上包围我国，在政治上孤立我国，暗中封锁我国，并因苏联工人援助西方战斗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而企图对我国进行直接的报复，——这造成了外部的困难；我国由恢复时期过渡到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工业的时期，以及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因这一过渡而日益复杂化，——这又造成了内部的困难。”^②

面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大多数，是满怀信心的，他们看到党在千百万群众的支持下，正在克服这些困难，正在引导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托洛茨基等少数人却在

^①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61页。

^②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1页。



困难面前表示畏惧，陷于絕望，因而产生投降主义的思想。

这样，社会主义建設的前途問題，就尖锐地提到布尔什維克党面前。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苏联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条件下，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而技术上經濟上又很落后的苏联，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

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經濟建設时期的事业应导向哪里，朝哪个方向建設，建設些什么，我們建設的前途应当怎样，这些問題如不能解决，誠实的和細心钻研的經濟工作人員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假使他們願意真正自觉地和細心地来对待建設事业的話。我們从事建設是为了給资产階級民主制度施肥，还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这就是現在我們建設工作的根本問題。現時，在新經濟政策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条件下，我們是否有建設社会主义經濟的可能，——这就是現在我們党和苏維埃工作中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①

托洛茨基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前途，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一貫认为苏联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也建不成社会主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俄共（布）十四次代表會議前举行的政治局會議上也說，落后的技术和經濟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同托洛茨基等人的立場完全相反，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維克党确认必須而且能够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二五年四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就這個問題通过決議，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論作为党領導实际工作的方針确定下来。

十四次党代表會議以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把党的決議置之不顾，繼續坚持和散布自己的錯誤观点。在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他們长篇大論地发表演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列宁主义理論，反对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設引向胜利的正确方針。他們当时所宣揚的主要观点是：

一、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經濟发展不平衡比帝国主义时期更为剧烈。“帝国主义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并没有扩大这种水平的悬殊，相反地，而是大大助长了水平的均衡化。”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經濟发展不平衡很剧烈，那时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是不可能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經濟发展不平衡减弱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当然仍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

二、农民从来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不可能成为无产階級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的同盟者。无产階級掌握政权后，它不但会和资产階級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

^① 《再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5頁。



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三、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苏联，得不到经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援助，决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四、只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拯救苏联。“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五、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的門罗主义”，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

六、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是斯大林首先提出的，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完全违背了列宁的学说。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这一整套怀疑主义、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理论”。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力图反对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分子的这套“理论”，就是这些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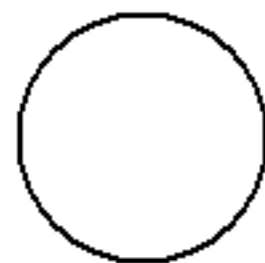
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六年間，斯大林写了一系列的著作，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这些著作主要是：《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和答复》，《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能的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是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为直接依据的。斯大林在驳斥托洛茨基分子的谬论时，深刻地论证和阐发了列宁所发现的这个规律的意义。

斯大林指出，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具有不同的形式，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还在向上发展，世界还没有瓜分完毕。那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不经过跳跃和战争，通过“进化的”方式，通过向“自由的”未被占据的地区的“和平”扩展，来赶上和超过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这个时期的具体条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国家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特点是：“第一、世界已被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完毕，世界上不再有‘自由的’、未被占据的土地了；为了占据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扩展势力，必须用武力从别国夺取这些土地。第二、技术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日趋均衡，使一些国家可能并易于跳过另一些国家，使不很强盛但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可能并易于排挤比较强盛的国家。第三、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常常和世界市场上新的力量对比发生冲突，为了在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和新的力量对比之间求得‘平衡’，必须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周期性地重分世界。”①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剧烈了。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日益加深，使帝国主义互相削弱，从而造成了帝国主义世界战线在个别国家内被突破的可能性。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具体条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个别国家内取得胜利。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不了解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之间的全部区别，不了解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意义和作用。托洛茨基分子既然否认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也就会否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日益加剧，这样，托洛茨基分子就滚到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滚到同列宁主义势不两立的立场上去了。

由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能够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则是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的内部条件。

斯大林说：由于资本主义道路使绝大多数农民贫困破产，而社会主义道路使劳动农民生活不断提高，因此劳动农民乐意和无产阶级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无产阶级也能够吸引劳动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论述了工农联盟的基础以及这个联盟内部的矛盾。他说：“第一，在根本问题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愿意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二，在当前问题上，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产生了这个联盟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按其比重来说，是被利益的一致性超过的，这种斗争在将来工人和农民不再是阶级的时候，即当他们都变成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劳动者的时候，是必然会消失的。第三，我们拥有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们是在维护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范围内根据两个同盟者的利益来解决这些矛盾的。”②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96页。

② 《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7页。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的錯誤是，他不相信无产階級专政国家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农民的革命性，不相信无产階級有力量领导农民，不相信工农联盟。托洛茨基的观点根本违背了列宁主义：“列宁說无产階級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階級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說‘无产階級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列宁說无产階級领导被剝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說‘在农民占人口絕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的地位有矛盾’。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間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①

无产階級专政国家，既然有强大的工农联盟作依靠，就必定能够战胜資产階級，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設。技术經濟落后，沒有經濟发达国家的援助，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設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斯大林說：“沒有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階級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經濟呢？有，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們已經在建設社会主义，我們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結合起来，我們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經濟納入苏維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我們在活跃苏維埃并且使国家机关和千百万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們在建設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②他又說：“沒有外援，我們也不会垂头丧气，不会喊救命，不会抛弃自己的工作，也不会惧怕困难。”“我們不是怕困难的人。我們既然是布尔什維克，我們既然受过列宁主义的鍛炼，也就不会逃避困难，而会面向困难并去克服困难。”③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从各个方面論证了苏联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充分地估价了国际无产階級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对于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巨大意义。他指出：各国人民援助苏联的形式，各国人民和苏联人民联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托洛茨基分子的錯誤是：他們只把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階級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看作是援助，“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給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④；他們只承认联盟的一种形式，即西欧无产者对苏联无产者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形式，輕蔑地否定联盟的其他形式的意义。斯大林說：“什么是西欧无产階級对我国革命的援助呢？欧洲工人对我国革命的同情，他們破坏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計劃的决心，——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帮助呢？当然是很大的帮助。沒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国家和附属

①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頁。

② 《問題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7—168頁。

③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9頁。

④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5頁。



国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①

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关于“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公式是完全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②

否认一国能够建设成功社会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托洛茨基分子否认能够在—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谬论，尽管披着“世界革命”的“左”的外衣，打着“反对民族狭隘性”的旗帜，其实却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理论。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如鲍威尔）和俄国盖什维克（如苏汉诺夫），一向宣称落后的俄国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点上和他們一样，完全否定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是没有前途的。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前途问题的争论一开始，斯大林就揭露了托洛茨基主义在“革命”外衣掩盖下的取消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实质。一九二五年六月，斯大林在《问题与答复》一文中说：“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們把我們的国家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我們拥有像列宁所说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那末我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这样的社会，来完全战胜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或者是我們不认为我們的国家是革命的基地，我們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我們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当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延缓的时候，就应当容許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占上风，容許苏维埃政权瓦解，容許党蜕化。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所以，不相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取消主义和蜕化。”^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在《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危害性，他说：

第一，“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不知道前进的目标，我們就不能前进。”“我們不能按伯恩

①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4頁。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8頁。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9頁。



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方式来生活。相反地，我們既然是革命者，我們就必須前进，我們的实际工作就要服从无产階級建設的基本階級目标。不这样，我們就必不可免而且毫无疑义地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

第二，“沒有我国建設的明确前途，沒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工人群众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設，他們就不能自觉地领导农民。沒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設社会主义的意志。”

第三，“削弱无产階級建設社会主义的意志就不能不引起我国經濟中資本主义成分的增强”，“就不能不鼓起資本主义成分对旧制度复辟的希望”。

第四，“削弱无产階級战胜我国經濟中資本主义成分的意志，既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势必延迟国际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展开。”^①

因此，斯大林一針見血地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即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原来是一丘之貉。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一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荒謬絕伦地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混为一談。他认为，在一个国家里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一个国家里也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他在反对列宁主义关于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时，又詭辯說，如果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无比，这个榜样将是对世界資本主义的致命打击，并把世界无产階級革命的价值降低到最低程度，甚至化为零。”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說，一国根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如果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就等于在这个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世界革命就不再需要了。

列宁提出和論证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学說。同时，列宁又一向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在一国范围内是不可能的。列宁說：“按事情本质來說，要想在一个国家內彻底战胜資本是不可能的。資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②“在一个国家內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是不可能的”^③。“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轉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④。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8—249頁。

② 《在全俄縫紉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3頁。

③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42頁。

④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7頁。



关于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问题，列宁是这样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①列宁在许多演说和论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不仅在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还在于它们企图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不仅在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包围这种外部条件，还在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代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内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仅在于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而且在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还会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②“米留可夫”是对的。他十分清醒地估计到了政治发展的阶梯，他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党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阶梯。资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阶梯，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傻瓜。”^③

根据列宁的原理，斯大林着重指出，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淆起来，是一种极其错误和危险的论调。

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国内矛盾，一种是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各国人民的支援下，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本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巩固工农联盟，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帝国主义敌视社会主义国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它。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仅不会消除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反而会加深这种仇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④这种矛盾，依靠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因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斯大林说：“这就是有免除外国资本家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有免除旧制度借这些资本家的武装进攻我国而在我国复辟的完全保障。我们用本身的力量能不能取得这种保障即能不能使国际资本无法进行武装干涉呢？不，不能。这是我們和全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5页。

②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2页。

③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32卷，第410页。

④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9页。

• 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1895—1943年），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首脑，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组织反革命叛乱，后亡命国外，曾在巴黎主办《最近新闻报》，鼓吹颠覆苏维埃政权。



西方的无产者的共同事业。只有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或者至少是欧洲主要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最后制服国际资本。”①

斯大林指出：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可能是最终胜利，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②

斯大林认为，既然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有赖于世界革命的胜利，因此，它就应当积极促进世界革命，成为“进一步展开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③。为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方面应当努力保卫革命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斯大林写道，苏联应当“集中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发展工业，来加强国防力量和集合世界各国的革命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④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执行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积极援助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仅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人民的利益。斯大林说：“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以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终胜利。”⑤他又说：“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⑥。

以反对斯大林为名反对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说，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是斯大林首先提出的，他所反对的并不是列宁主义，而是完全违背列宁主义的所谓斯大林主义。这是卑鄙的捏造。

斯大林指出：“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列宁是第一个人。”⑦

早在一九一五年，列宁就已经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

① 《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93—94页。

②③ 《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0、141页。

④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3页。

⑤ 《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9页。

⑥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47页。

⑦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2页。



此就应得出結論：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①。

从列宁开始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論起，托洛茨基就一再地反对列宁的这个理論。也是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就发表文章攻击列宁是“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是“社会爱国主义”，表现了“民族狭隘性”。

在此以后，直到列宁逝世，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这种分歧和因此而产生的論战一直没有間断过。

一九二二年，列宁指出，“我們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新經濟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②。一九二三年，列宁在《論合作制》一文中說，苏維埃国家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这就是：“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資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結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③。在这期間，托洛茨基又連續发表文章攻击列宁的上述观点，說什么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

斯大林根据上述确凿不移的事实指出，托洛茨基所攻击的正是列宁。在苏联胜利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問題上，早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綫。“一条是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路綫，另一条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綫。列宁主义对这个問題的解答是肯定的。相反地，托洛茨基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在我国可能依靠我国革命的內部力量获得胜利。”^④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更加疯狂、更加猖獗、更加放肆地反对列宁关于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說。为了掩飾这种可耻的勾当，托洛茨基把事情說成是他所反对的不是列宁的理論，只是斯大林的理論。斯大林彻底揭露了托洛茨基这种极其卑劣的手法，指出这是“一种手腕，一种詭計，一种怯懦的笨拙的詭計”。斯大林說：“托洛茨基的目的是要反对列宁的理論，但公开反对列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于是他决定装出和斯大林的‘理論’作斗争的样子来进行这一斗争。托洛茨基想借此使自己便于和列宁主义作斗争，想通过批判斯大林的‘理論’来掩盖这个斗争。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这和斯大林毫无关系，根本談不到什么斯大林的‘理論’，斯大林从未抱过在理論上創造什么新东西的奢望，他只是不顾托洛茨基修正主义的掙扎，竭力促使列宁主义在我們党内获得完全胜利。”^⑤

① 《論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321 頁。

② 《在莫斯科苏維埃全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400、401 頁。

③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23 頁。

④ 《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231—232 頁。

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104 頁。



正是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坚决斗争,在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上,列宁主义的路线胜利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被彻底粉碎了。

正像后来斯大林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靠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要发动工人阶级掀起劳动高潮和竞赛,要组织大规模进攻,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要组织农民的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并消灭富农阶级,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不可能引导劳动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理论。”^①

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对于苏联的巩固和发展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个胜利提高了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的信心,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思想上扫清了道路。

三 坚持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

从理论上批判托洛茨基主义,保卫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是苏联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奏。在这场斗争中,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除了从建设前途方面宣扬失败主义以外,还在工业化问题上,向党发起进攻。

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不作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时候,苏联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一九二五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产品占三分之二,工业品只占三分之一。工业本身也还存在着重大的缺点:技术陈旧,重工业很薄弱,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必须用新技术改造旧的工业,特别要创建过去未曾有过的机器制造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和电力工业,创建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工业,创建新的国防工业,以保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加强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国防能力。这就是说,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一九二五年以前,更迫切的任务是恢复农业。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原料和粮食,如果没有稍微发达的农业作为工业的基本市场,工业化就没有可能。所以斯大林说:“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②。

^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8、309页。

^②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0页。



到一九二五年，农业已经大体恢复，于是党也就能够把工业化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一九二五年底，在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

斯大林说：党的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这条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展我国工业，但是这种扩展要估计到并且要适应我国拥有的资源。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①

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和平地”进行，而是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当中进行的，因此，经济建设的路线必须是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路线。斯大林说：“我国的经济和我国的建设将在我国经济体系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和冲突中发展起来。这种矛盾我们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一种范围，在这种范围内，两个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必定进行着斗争。此外，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建设不仅要在它同外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并且要在我国内部各种不同的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即在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② 必须把苏联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单位，就是从这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中得出来的结论。

这条工业化的路线，将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下面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强国，因此它引起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惊慌和反对。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条叛卖性的路线，同党的路线相对抗。

索柯里尼柯夫说，“发展”苏联工业，“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但是，苏联太落后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搞不成工业化。要发展工业，最好的道路莫过于向外国借钱，借不到钱，剩下的就是“发展农业品输出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从国外输入装备和原料，才能使苏联工业发展起来。

斯大林在批评这条路线的时候说：“我们现在不得不输入装备。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却把这种需要变成原则，变成理论，变成发展前途。索柯里尼柯夫的错误就在这里。”^③ 斯大林指出，索柯里尼柯夫的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道威斯计划”* 的需要，并不是什么“工业化”路

①②③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7、246、293页。

* “道威斯计划”是美国人道威斯所领导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制订的1924—1929年德国向协约国支付赔款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加强美国对欧洲的控制，恢复德国垄断组织的势力，以便消灭苏联。按照这个计划，德国可以从国外榨取金钱向协约国偿付赔款，这些国家又利用德国的赔款向美国偿还借款。为了使德国既可以缴付赔款而又不至于和各战胜国竞争，道威斯计划规定，把苏联这一块没有被资本主义占据的市场给予德国，让德国工业品充斥苏联，以便破坏苏联工业化，将苏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



綫，而是收縮苏联工业的路綫。“这条路綫将使我国永远或者差不多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将使我国客观上必然由依靠国内市場的独立的經濟单位变成资本主义总体系的附属品。”^①

斯大林說，要使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成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强国，就必须发展生产資料的生产，必须发展重工业，因为没有重工业，便不能从技术上改造整个国民經济，便不能从經濟上保障苏联的独立。帝国主义者想使苏联只生产花布和皮鞋等等，苏联决不能这样。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仅要生产花布、皮鞋、汽車等等，而且要生产制造花布、皮鞋和汽車所必需的机器。斯大林坚定地宣布：“我們决不願意变成受其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德国）支配的农业国”。“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們总路綫的实质和基础。”^②

一九二六年四月，斯大林在給列宁格勒党組織积极分子做的报告中，解释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制訂的工业化方針。他明确地指出：“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經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經濟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經济受制于那些出产并輸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經濟上的独立。”^③

斯大林还反复強調实行工业化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性，他說：“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能保卫住我們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最高的技术，就不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④“我們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設。他們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經濟上的弱点来进攻我們，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錯過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⑤“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經成了剝削者的規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規律。你落后，你軟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正因为如此，我們再也不能落后了。”^⑥

发展工业，也是巩固工农联盟所必需的。斯大林說，要巩固工农联盟，不仅要滿足农民

①②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7、294頁。

③ 《关于苏联經濟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3頁。

④ 《論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4頁。

⑤ 《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8頁。

⑥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頁。



群众对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农民对生产资料日益增长的需要。他指出，工农结合决不能长期停留在旧形式上，只满足农民的个人生活需要，供给农民花布、鞋子、各种日用品等等。应当以工农结合的新形式补充旧形式，即工业不仅供给农民以花布、鞋子、各种日用品，而且要满足农民的生产需要，供给农民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只有这样，工农结合才能是巩固和持久的。斯大林解释说：“纺织品方面的结合很少触及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所以一般说来，它不可能以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农民和消灭阶级；而金属制品方面的结合则恰恰相反，它首先关系到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关系到农民经济的机械化和集体化，正因为如此，它一定能逐渐改造农民，逐渐消灭阶级，其中包括农民阶级。”^①

在苏联实行工业化的时候，斯大林还指出：“不能在制定工业建设计划上落后于工业发展。但也不能向前跑得太远，脱离农业，不顾我国的积累速度。”“我国国内市场需求和我国资源的规模——这就是我国工业扩展的基础。我国工业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比起美国工业来，我国工业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国内市场，首先是依靠农民市场。这就是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基础。”^②

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内部积累

实现工业化，需要巨额的资金。资金从哪里来？

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资金，通常是靠掠夺殖民地和战败国，或者靠借外债来筹措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不应当走这种道路。斯大林特别强调，苏联不能接受奴役性的外债，苏联“打退了所有的干涉者，并不是为了以后，在战胜干涉者以后，自愿地去受帝国主义的奴役”^③。

斯大林说，苏维埃国家唯一可走的，是自己积累资金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④。斯大林坚持的道路，正是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示的道路。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

^① 《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2页。

^{②③④}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0、115页。



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①

斯大林说，依靠内部积累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对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优越性。

一九二六年四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中，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积累的主要来源：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使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都变成了全民的财产；废除了沙皇政府所负的大量债务和利息；国有化的工业，商业，银行和对外贸易向国家提供利润，等等。因此，斯大林指出，依靠内部积累，能够提供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其实所有这些积累来源，归根结底是苏联工人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正如后来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一文中所说，国家积累的主要泉源有两个：“第一个是创造价值并把工业向前推进的工人阶级，第二个是农民。”^②

斯大林在内部积累的问题上，一方面批判了那种加重农民负担、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荒谬主张，另一方面也批判了不顾条件要求立即取消剪刀差的主张。他说，党的政策既不是扩大剪刀差也不是永远保持剪刀差，而是采取正确的政策，逐步缩小剪刀差。斯大林说，为了积累资金，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家除了向农民征收普通税（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征收一种实际上的“超额税”，剪刀差就是这种“超额税”。这种“超额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征收的，“税额”也是逐年减少的，农民能够负担得起。他又说：“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迅速发展的速度，采取这种办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是需要的。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工业的迅速发展，因为这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③

斯大林特别重视后备资金的合理运用和节约制度。他说，“问题不只限于并且不能只限于积累，还要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积累起来的后备，使人民的财产一个钱也不白费，使积累主要用在满足我国工业化最迫切需要的方面。”“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资金，——这是极其重要的艺术”^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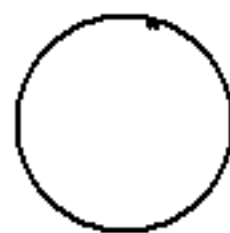
为了使资金不被分散、不被贪污、不被挪用在不必要的用途上，斯大林认为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手段。他指出：必须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制订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采用一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4—455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页。

③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页。

④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9页。



切手段和一切办法精简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必须和各种铺张浪费现象作坚决斗争；必须和贪污盗窃行为作坚决斗争；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劳动纪律。

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对贪污和浪费的容忍态度。他说，有些人“像猪一样地……跨进国家菜园，在那里饱吃一顿，或者是拿国家资财来表示自己的慷慨”^①。斯大林指出，苏联的国家机关、合作社和工会等机关中，“有羞怯的隐蔽的盗窃行为，也有勇敢的‘快乐的’盗窃行为”。这些盗窃人民财产分子，“单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不能把他们全部除尽的。这里必须采取另外的办法，采取更有效更认真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这些小偷周围造成公众普遍的道德抵制和憎恨的气氛。这种办法就是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掀起一个运动，造成一种道德气氛，使盗窃行为绝无发生的可能，使盗窃和贪污人民财产分子，不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都不能生活并存在下去。”^②

批驳托洛茨基的“世界分工”论

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击败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季诺维也夫分子，通过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代表大会以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勾结在一起，共同攻击党的路线。

托洛茨基叫喊的，还是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老调，不过他这一次拿出来新货色，是“世界分工”论。他认为，苏联不可能在世界分工当中保持住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决不能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根据这种“理论”，他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恶毒地攻击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给这个方针扣上什么“民族狭隘性”之类的帽子。他说，“如果我们想离开实在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隐居’，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在最近时期自力更生制造出全部机器或重要的机器，就是说，如果我们企图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并跳过造成我国现有工业这种状况的以前的经济历史，总之，如果我们走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而一切自己制造的话，这就必然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他认为，由于世界分工，苏联经济正在“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将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

斯大林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中，彻底批判了这种投降主义谬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都需要输出输入，需要互通有无。但是这种依赖是相互的，而且这种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是两回事情。苏联虽然和外国有贸易往来，“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因而丧失了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它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应当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经济

^{①②}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3、124页。



的小螺絲釘。應該把各国彼此間的依賴性和各国的經濟独立性区别开来。否认各个国民經济单位的絕對不相依賴，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經濟独立性。”^①

斯大林說，托洛茨基所謂的“和世界經濟結合起来”，就是把苏联經濟变成世界資本主义的附屬品。如果苏联經濟竟然落入托洛茨基所說的这种“結合”当中，那么：

“我們就沒有任何可能来保护我們的社会主义工业、我們对外貿易的垄断、我們国有化的運輸、我們国有化的信貸、我們对經濟的有計劃的領導。”

“我們就已走上使我們的社会主义工业蜕化成普通資本主义工业的道路。”

“我們就不会在我国經濟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資本主义成分作斗争的战綫上获得胜利。”^②

斯大林說，这正是資本主义豺狼的梦想。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由于坚持了无产阶级專政，苏联經濟在資本主义包围当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

托洛茨基像“受惊的市僧一样，患了迷信資本主义經濟制度万能的病症”^③。他甚至断言，苏联要用将近一百年的時間，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經濟制度比資本主义制度优越。

斯大林尖銳地批判了托洛茨基这种消极論調，他指出：

“領導我国生产的不是寄生虫，而是生产者本人，这个事实难道不是使社会主义經濟制度有一切机会足以一日千里地发展經濟，并在較短期間內证明自己优于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的极重要的因素嗎？”

“社会主义經濟是最統一最集中的經濟，社会主义經濟是按計劃进行的，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說明社会主义經濟会有一切有利条件足以在較短期間內证明自己优于被內部矛盾所分裂、被危机所腐蝕的資本主义經濟制度嗎？”^④

社会主义制度比資本主义制度优越，是因为社会主义經濟发展的动力根本不同于資本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談話中，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这个問題作了精辟的闡述。他說：“資本主义經濟的基本推动力是取得利潤”，但是，“取得利潤既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目的，也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推动力”。“究竟什么是我国工业的推动力呢？”

第一，“我們这里一切工厂都是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属于資本家的，管理工厂的不是資本家的僕从而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工人觉悟到他們現在不是为資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階級工作。这种觉悟就是发展和改进我国工业的巨大的推动力量。”“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把工厂看做和自己完全无关的、別人的財產，甚至把它看做牢獄；但是在苏維埃制度下，工人已經不把工厂看做牢獄，而把它看做和自己休戚相关的事业，他們深切地

①②③④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8—119、119、122頁。



关心这个事业的发展和改进。几乎无须证明，工人对工厂、对企业的这种新的态度，工人对企业的这种深切的感情，就是我国全部工业最大的推动力。”

第二，“我们这里工业的收入，不是用来使个人发财致富，而是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用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用来减低工农所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也就是用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的。”

第三，“工业国有化这个事实使整个工业经济易于有计划地经营。”

斯大林说：这些就是苏联工业的经常起作用的刺激力和推动力，“我国的工业愈发达，这些因素的力量和作用也就愈增长。”^①

利润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讲赢利。斯大林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赢利问题的观点，他说：“决不能用商人眼光，从目前着眼来看赢利问题。应当从整个国民经济，从几年的时间着眼来看这个问题。只有这种观点才能称为真正列宁主义的观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②

批驳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政策

寡廉鲜耻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贯玩弄两面派手法。他们骨子里是破坏和阻挠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是表面上却主张“超工业化”。他们装出一种激进的姿态，说什么工业发展速度太慢了，他们要求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对农民施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榨，以便取得“超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曾露骨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依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③。托洛茨基的另一个信徒斯米尔诺夫，甚至公开主张用同中农闹翻的政策来代替列宁关于同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政策。

“超工业化”的根子，仍然是托洛茨基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实质上是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放弃工业化的政策，使苏联在“世界分工”当中沦为外国附庸；在形式上有的时候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主张采取极端手段，用使农民破产、农业崩溃的办法“发展”工业，其结果必然要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到绝路上去。

斯大林尖锐地指出，“超工业化”计划乃是一个破坏工业化基础和分裂工农联盟的阴谋。

①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6、107、108页。

②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75—176页。

③ 转引自《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6页。



斯大林說：托洛茨基派认为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就会“加速”工业化，“其实这样做就一定会扰乱国内市场，破坏工业跟农业的结合，降低切尔文* 汇率，降低实际工资，因而就会破坏任何工业化”。同时，“高额出厂价格是使工业凋敝、使工业变成温室植物、使经济机关官僚主义化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托洛茨基派“口头上是工业化主义者，事实上却是工业化的敌人的帮凶”①。

斯大林又說，托洛茨基派“不懂得也不承认，忽视农业利益，损害农业利益，就不能推进工业。它不懂得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中樞，农业是我国工业可借以发展的基地。”②“由此就产生了把农民经济当做应受无产阶级国家‘剥削’的‘殖民地’的看法。”托洛茨基派的这种政策，“走上了使工业和农业间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方法的道路”③。这种方法，既破坏了工业和农业的正确关系，又破坏了工人和农民的正确关系。

在同托洛茨基派斗争中，斯大林坚持列宁的遗训，反复强调：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必须使工人阶级和农民密切结合，因为“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④。

一九二六年四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中指出，经济建设绝对不能脱离政治，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巩固，必须依靠工农联盟。他说：“发展工业，实行社会主义积累，实行节约制度，——所有这些任务，如果不加以解决，我们就不能战胜私人资本并消灭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存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任务就一个也不能解决。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因此，如果我们破坏或削弱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我们的一切任务就会悬在空中。”⑤

同年十二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⑥

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坚定地击退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他们的追随者的进攻，到一九二七年末，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已获得了重大的成就。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在变成工业国。”⑦“我们提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使

①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2页。

②③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5、256页。

④ 《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7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8页。

⑥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22页。

⑦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4页。

* 切尔文是当时苏联币制改革后的货币单位。



它的发展达到了打破纪录的速度，并且确立了它在全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虽然存在着敌对的国际包围，我们还是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向世界各国的工人表明了无产阶级不仅善于破坏资本主义而且善于建设社会主义”^①。

四 为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而斗争

不择手段、毫无原则的托季联盟

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为了推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路线，进行了一系列卑劣的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他们相互勾结，攻击以斯大林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图谋篡夺党的领导权，以便把布尔什维克党引入歧途，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早在列宁逝世前，托洛茨基就开始了这种骯髒的活动。一九二三年冬，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国家在经济方面也存在着不少困难。托洛茨基利用这种情况，纠集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的残余分子，发起了对党的猖狂进攻。他们的借口是：扩大和恢复“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他们的要求是：更换领导干部，让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有活动的自由。为了打断党的脊椎骨，托洛茨基竭力诬蔑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说什么他们“堵塞首创精神”，已经“官僚”化了，“僵化”了，说什么应当反对对他们的“偶像崇拜”。同时，托洛茨基又百般笼络青年，煽动他们起来反对党，说什么“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反应最敏锐”，说什么青年应当起来“战斗”等等。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发动这次进攻所追求的目的，是篡夺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

斯大林揭露托洛茨基所谓“民主”的实质，是利用“民主”来陷害党，而不是为了拥护党。他说：“有两种民主：一种是党员群众的民主，这些党员群众极愿意发挥自动性并积极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另一种是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这些党内要人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用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党一定会赞成第一种民主，并且要坚决地实现这种民主。党一定会抛弃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因为它和真正的工人的党内民主毫无共同之处。”^②

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击退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这次进攻。一九二四年一月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3页。

② 《关于争论，拉法伊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和萨普隆诺夫的论文以及托洛茨基的信》。《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12页。



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申斥了托洛茨基。

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分子继续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四年秋，托洛茨基发表《十月革命的教训》，其目的之一就是为彻底更换党的领导制造舆论，办法是散布谣言，说什么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多数委员原来是反对武装起义的。斯大林批驳了托洛茨基对历史的歪曲和捏造，揭穿了托洛茨基篡夺党的领导权的阴谋。

一九二五年，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一伙人又组成了所谓“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反对过托洛茨基主义，但是他们不久就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伙人在他们所控制的列宁格勒党组织中，进行了特别猖獗的活动。他们一只手向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要求“民主”，要求反列宁主义的派别活动自由，一只手取消他们所控制的党组织内的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禁止党员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打击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同伙中间挑选代表，出席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他们反对党的政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季诺维也夫等人发动的这次进攻，由于遭到党的坚决回击也失败了。

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在他们分别发动的进攻遭到失败后，力图联合起来。为此，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毫无原则的交易，由互相反对转到互相“赦免”，互相恭维。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曾经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反对武装起义的投降主义错误，把他们两人称为党内的右派，即半孟什维克。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托洛茨基却懊悔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竟然吹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党内的左派即革命派。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写过一大堆小册子，申斥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发动的对党的进攻。季诺维也夫曾说：“谁想现在和托洛茨基联合、和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合作来建党，谁就是背弃列宁主义基础。”可是，一九二六年七月，季诺维也夫声明说，托洛茨基派在一九二三年的反党活动“是正确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吹捧托洛茨基派是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派。

就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结成了一个反党联盟。斯大林在论及这个联盟的时候说：“谁也没有像我们的反对派首领们那样轻易地从一种原则跳到另一种原则，那样轻易地随便地改变自己的观点。”^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昨天还大骂托洛茨基，而今天就和他接起吻来了。”^②“反对派联盟在手段上的不加选择和在政治上的毫无原则，

①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0、313—314页。



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联盟存在的基础”^①。

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本来指望通过结成联盟来扩大自己的队伍，增强自己的力量。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既然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因而也就把自己弄得虚弱不堪。斯大林写道：“他们把力量加在一起，不仅没有扩大自己的队伍，反而把自己的队伍弄得小到极点，弄到瓦解的地步。过去季諾維也夫集团的力量何在呢？在于它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既然季諾維也夫集团放弃了自己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可以说，它就阉割了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力量。过去托洛茨基集团的力量何在呢？在于它对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錯誤和现在所重犯的这些錯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既然这个集团放弃了对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倾向的斗争，它就阉割了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力量。结果加在一起的是一些被阉割者的力量。”^②

季諾維也夫在为自己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党联盟辩护时说，列宁赞成任何一种党内联盟。斯大林严厉驳斥了这种謬言。他指出：“列宁从来不是对一切党内联盟都赞成的。列宁只赞成过有原则的和革命的反孟什維克、反取消派、反召回派的联盟。列宁始终反对无原则的和反党的党内联盟。”^③ 斯大林列举历史事例证明说，列宁为反对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即反对一个反党的无原则的联盟进行了三年的斗争；同时列宁又承认这样的联盟，即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二年，列宁主义者同普列汉諾夫分子为反对取消派联盟而结成的联盟。斯大林说：“伊里奇只赞成过这样的党内联盟：第一、它是有原则的；第二、它的目的在于巩固党而反对取消派，反对孟什維克，反对动摇分子。”^④

斯大林清楚地指出，在布尔什維克党的历史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联盟。一种联盟是反党的、以机会主义为基础的联盟，这种联盟使党倒退，使党瓦解。一种联盟是革命的、以反对机会主义为目的的联盟，这种联盟使党前进，使党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反对前一种联盟，应当拥护后一种联盟。斯大林说：“如果党内有一个联盟能提高党的战斗力，引导党前进，那末我们是赞成它，赞成这样的联盟的。”^⑤

所谓“恢复”列宁的党内制度究竟是什么东西？

如前所述，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一向打着“反对官僚主义”、“恢复党内民主”的旗帜，来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反对布尔什維克党。托季联盟继续沿用了这一卑劣的

①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6页。

②③④⑤ 《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5、212、213页。



手法。斯大林在同他們的多次斗争中，揭穿了他們的画皮。

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說：党的机关官僚主义化了，领导干部对党员群众实行官僚主义統治，必須彻底“整刷”党的机关。斯大林指出，他們所謂的反对官僚主义，其目的是唆使党员群众反对党的机关，破坏党的机关的威信。而党的机关体现着党的领导部分，党离开它就无法进行工作。“党的机关是由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组成的，我們对于这些人的錯誤可以而且必須加以批評，对于这些人可以而且必須进行‘刷新’，但是不能冒着瓦解党并使党解除武装的危险去誣蔑这些人。”^① 斯大林說：托季联盟“在这方面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解除党的武装，使党无从改善国家机关，无从鏟除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并领导国家机关。”^②

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伴叫嚷說，要反对“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有时是书记一人手中”。他們提出了所謂“建立集体领导”的蠱惑性主张。斯大林斥責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攻击，指出，“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誰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誰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③

托季联盟要求“党内民主”，容許派别活动自由，反对党的紀律和統一。斯大林駁斥說，决不当把党内民主和党的紀律对立起来，把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自由同党内民主混为一談。斯大林指出，把民主問題偶像化，把民主看做是超出時間和空間的东西，是极其錯誤的。广泛的、完全的民主是不会有的，民主随時間条件而轉移。应当发揚党内民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容許党员对党内的缺点和錯誤进行认真的批評，吸引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但是，“党内民主所以需要，不是为了削弱并破坏党内的无产阶级紀律，而是为了巩固并加强这个紀律；如果党内沒有铁的紀律，如果党内沒有靠着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来增强的坚固制度，那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④。发揚党内民主，决不意味着容許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有存在和活动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紀律和統一，必定会断送无产阶级政党，必定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把事情說成这样：他所厌恶的只是当时的党内制度，他是要恢复列宁建立的党内制度。斯大林說：“現在的党内制度就是在我們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間即在列宁生前建立的那个党内制度的正确表現”。“托洛茨基正在反对在列宁生前建立的而且是在列宁领导下建立的列宁的党内制度。”^⑤

①④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9、200頁。

② 《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9頁。

③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8頁。

⑤ 《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38頁。



为什么这样恶毒地攻击斯大林？

托季联盟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中央的时候，对斯大林进行了特别恶毒的攻击。

托洛茨基等人把斯大林說成“庸人”、“无声无嗅的小人物”、“小城市的政客”、“无賴”、“苏联的独裁者”、“亚細亚的暴君”、“专制君王”、“成吉思汗”。他們說，“虐待狂”是斯大林的特点。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的一次會議上，托洛茨基公开誣蔑說，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集团的独裁，把我們党置于恐怖之下”，“斯大林分子”布滿了“各个官方职位”，“斯大林主义……已經发展到公开耍流氓的地步”。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隨者就是用这样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語来誣蔑斯大林的。

他們还死死抓住斯大林早就改正了的缺点和錯誤不放，并且肆意夸大，甚至凭空捏造出所謂斯大林的“錯誤”，作为謾罵斯大林的口实。例如，托洛茨基說：“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后宣传过列宁称之为考茨基傾向的錯誤策略。”^①

斯大林列举确凿不移的事实回答說：“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誹謗。斯大林沒有‘宣传过’任何考茨基傾向。我流放回来后有过一些动摇，* 这一点我並沒有隱瞞，而且亲自写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那本小册子里了。但是，我們中間誰沒有过一瞬間的动摇呢？至于說到列宁在一九一七年的立場和他的《四月提綱》（这里所說的正是这一点），那末党知道得很清楚，我当时是同列宁同志站在一道并和当时反对列宁提綱的加米涅夫及其集团作斗争的。”“这里的魔术就是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弄成我了。”^②

为了駁斥托洛茨基之流的誣蔑，斯大林叙述了自己对待錯誤的光明磊落的态度。他說：“我从来没有认为而且現在也不认为自己是沒有过错的。我不但从来没有掩飾过自己的錯誤，而且也沒有掩飾过自己瞬間的动摇。但是也不能否认我从来没有坚持过自己的錯誤”^③。斯大林严肃地指出，“我們沒有绝对‘不犯錯誤的’人。这样的人是沒有的。但錯誤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錯誤，犯者并不坚持，而且不致由此形成政綱和派別。这种錯誤很快就被忘却。另外还有一种錯誤，犯者一直坚持，而且由此形成派別、政綱和党内斗争。这种錯誤就不能很快被忘却了。”^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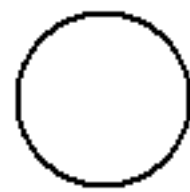
斯大林在一些問題上曾經犯过錯誤，但这是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錯誤，并且很快地得到了

① 轉引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59頁。

②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59、68頁。

③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57頁。

•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当时，斯大林沒有立即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而主张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政策。四月三日，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堡，第二天提出《四月提綱》，指出要使全部政权归苏維埃。斯大林同意了这个提綱。斯大林所說的瞬間的动摇，就是指这件事。



糾正。而托洛茨基所犯的錯誤則是非布尔什維主义的錯誤，是反布尔什維主义的錯誤，托洛茨基一直坚持这些錯誤。“这完全是另一种錯誤。党的任务就是要揭发这类錯誤并克服它們。因为克服这类錯誤是在党内确立馬克思主义原則、保持党内統一、消灭派別活动并保证不再重犯这类錯誤的唯一手段。”^①

托洛茨基之流所以刻骨地仇恨斯大林，疯狂地攻击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坚持了列宁主义，保卫了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不調和的斗争。他們反对斯大林，是为了反对布尔什維克党，是为了把党和国家引上反列宁主义的道路，是为了适应国内外階級敌人的需要，在苏联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資本主义制度。斯大林說：“他們的主要攻击所以针对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也許比我們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对派的一切詐騙勾当，要欺蒙他恐怕并不那么容易，于是他們就首先打击斯大林了。那又有什么呢，任凭他們去罵吧！”“不仅如此，反对派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我还认为对我是件光荣的事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如果蓄意破坏党的反对派竟恭維起保卫列宁党性原則的斯大林来，那才奇怪，那簡直是一种侮辱。”^②

一再挑起爭論，一再揚言停战，直到最后被粉碎

托洛茨基之流一次又一次地挑起公开爭論，发动进攻，而当他們处于不利的境地时，就一面伪善地要求停止爭論，一面准备和实行新的进攻。斯大林总是及时地揭穿这种两面派手法，教育人民坚定地把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托季联盟正在形成的时候，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就一再劝告托季联盟的首領，不要挑起全国規模的公开爭論，制造分裂。托季联盟的首領置之不理，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和十月初，发动了进攻。他們从一个支部到一个支部，宣揚其机会主义路綫，結果遭到了党员群众的坚决回击，失败了。于是，他們被迫退却，提議实现“党内和平”，說应当停止“党内糾紛”，不要“責备”他們，而要搞好“共同工作”。斯大林指出，要中央停止揭露和批評托季联盟的原則錯誤是办不到的，因为托季联盟并没有放弃其原則錯誤；托季联盟如果真的願意停止公开爭論，消除意見分歧，就应当公开承认錯誤，放弃机会主义路綫，解散机会主义的派別組織。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托季联盟的首領不得不发表声明，譴責自己所进行的派別活动，但表示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在十一月一日說道：“現在他們正在收縮自己的派別活动，因为如今时机對他們‘不利’。但是，既然他們不放弃自己的原則观点，既然他們决心保留自己原先的立場，那末，由此可見，他們是意存观望，等待‘良机’，以便积蓄力量之后一有可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70—71頁。

②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現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8、149頁。



能就重新反对党。”“因此，党的任务是：对反对派仍然保留的錯誤观点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揭露这些思想的机会主义本质”^①。斯大林认为，同托季联盟的原則錯誤进行坚决斗争是糾正这些錯誤的唯一手段，而糾正这些錯誤又是达到真正的统一的唯一道路。

为了阐明必須同托季联盟的錯誤进行坚决斗争，斯大林总结了联共党进行党内斗争的丰富經驗，指出：揭露党内矛盾和意見分歧，通过斗争来克服党内矛盾和意見分歧，是党的发展規律，是党成长和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他說：“我們党的历史就是党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是克服这些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巩固我們党的历史。”^②他又說，“問題不在于形式上的統一，而在于統一要有原則基础。”^③不应当在原則問題上妥协，采取所謂“中間”路綫。“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綫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綫’，是掩飾意見分歧的‘路綫’，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綫’，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綫’。”^④

托季联盟的首領在发表十月十六日声明的同时，仍然秘密地进行反党活动，并且，不久又发动了公开攻击。他們繼續誣蔑布尔什維克党蜕化了，有灭亡的危險。托洛茨基还說，应当把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所执行的“无知的和无耻的抄襲家的政治路綫像垃圾一样地扫除掉”^⑤。

斯大林彻底批駁了托季联盟发出的这种更为恶毒的誣蔑。他指出：既然还有敌对階級，既然階級还没有消灭，恢复旧制度的企图当然总是有的。因此，在苏联的确存在着一些人具有蜕化和复辟的傾向，托季联盟就是蜕化分子的集合点、巢穴和温床。而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坚决执行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在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斗争烈火中受过严峻的考驗，攻击它蜕化是可笑的，要想扫除它也是办不到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監察委员会联席會議上說，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只有放弃这类无稽之談，放弃一切分裂党的机会主义的派別活动，才能够繼續留在党中央委员会內。

于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在八月八日又发表声明，表示要“尽量消除一切派別活动因素”，但同时說“派別活动的因素是在党内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等人的声明表明，他們作了一定程度的退却，但附有条件，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利用它来进行新的进攻。斯大林說：“不要把反对派向我們提出的建議看做党内和平。不要为錯觉所迷惑。反对派向我們提出的建議只是暫时的休战。”^⑥“决不能凭几句

① 《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5—217頁。

②③④ 《再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5、7、6頁。

⑤ 轉引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監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8頁。

⑥ 《关于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的〈声明〉》。《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79頁。



話就相信反对派”，“而应根据反对派的行动来考查反对派”^①。

在行动上又怎样呢？托季联盟继续召开秘密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党会议，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并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而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和露骨的白卫反革命分子相勾结。托季联盟的成员还继续在党组织内掀起争论。

联共(布)中央在同托洛茨基等人争论的时候，把他们的一些文章、演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甚至把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几次全会的速记记录发给几万几十万党员阅读，以便使党员能够把中央的立场和托洛茨基派的观点比较一下，做出自己的判断。

托季联盟的首领总是喜欢用数字、用百分比来炫耀自己，说什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拥护他们。但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到十一月，经过全党认真的、民主的公开争论，七十二万多党员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党员，投票反对托季联盟的路线，拥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多人。托季联盟眼看自己即将遭到可耻的失败，就决定孤注一掷。十一月七日，他们集合了一小群人，组织了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示威游行。他们被广大劳动群众为纪念十月革命而举行的游行撵走了。

斯大林指出：“反对派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假仁假义的和善面孔，另一副是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孔。当党逼迫他们要他们放弃派别活动和分裂政策时，他们就对党摆出自己那副假仁假义的和善面孔，而当他们向非无产阶级势力、向‘街头’控诉党和苏维埃政权时，他们就摆出那副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孔。”^②

托季联盟既然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滚进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营垒，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就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同年十二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决议，并决定把托季联盟的其他首领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一并开除出党。托季联盟被彻底粉碎了。

托季联盟的首领在解释自己失败的原因时说：这是由于斯大林粗暴，由于党员群众盲目地跟着党中央跑。

斯大林嘲笑说：“多么廉价的解释呵！这是巫师说鬼话，不是解释。”^③他指出，托洛茨基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从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二一年曾经屡次反对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党，当时斯大林还没有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可是托洛茨基发动的那些进攻还是失败了，这总不能归咎于斯大林吧！只有没落贵族才会把党员群众看作是贱民，看作是跟着党中央跑的乌合之众。

① 《党和反对派》。《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22页。

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8页。

③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67页。



托洛茨基尽管有演说的才能，很会迷惑群众，有窃取领导权的欲望，但还是被群众唾弃了，失败了，这是有极其深刻的原因的。

斯大林概括地指出，托季联盟的首领之所以成为变节者，是因为他们犯了三个基本错误，即：反对列宁主义，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取消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获得胜利的学说；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企图破坏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托季联盟尽管竭力披上“左”的外衣来欺骗群众，“事实上是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表现，事实上在维护机会主义政策”^①。“反对派是我们党内的孟什维克派，反对派已经滚到孟什维克主义方面去”^②。

托季联盟的社会基础，是被打倒的资产阶级、自发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些社会力量，不满意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改变这个制度，力图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精神来“改善”这个制度。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他们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公开活动，于是就在俄国共产党（布）的领导者中间寻找自己的英雄，竭力从内部来突破共产主义战线。而这种情况就使俄国共产党（布）内部产生了反对派的情绪，给机会主义倾向建立了基础。”^③“由此可见，反对派所反映的不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情绪，而是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急切期待无产阶级专政瓦解和崩溃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④因此，“各种反苏维埃分子都聚集在反对派的周围。”^⑤托季联盟成了“资产阶级分子的工具”^⑥。

正因为如此，托季联盟受到了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的同声赞扬。也正因为如此，托季联盟在党员和广大群众中陷于孤立，最后终于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经过这次斗争，在联共（布）党内彻底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捍卫了列宁主义，实现了全党空前未有的统一。

五 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到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的政策

粉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以后，布哈林主义成了联共（布）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

①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1页。

②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6页。

③ 《关于波兰共产党》。《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33页。

④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51页。

⑤ 《党和反对派》。《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23页。



这是新的形势下面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一九二七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就，而农业的发展却和工业很不适应，特别是谷物业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

农业落后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基础是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在于富农在农村经济中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同时决定继续对富农展开进攻，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城乡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反抗的主要形式是：在农村中，富农进行凶暴的斗争，反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经济；在工业部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上层进行恶毒的暗害和破坏活动；在机关中，暗藏的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措施实行怠工以至破坏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出现了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从一九二八年开始，他们集中攻击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路线，反对进攻富农，反对农业集体化，反对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他们企图使社会主义建设迁就“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党的分歧是根本路线的分歧。显然，不粉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不击败它们的投降主义路线，就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因此，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击败托洛茨基主义以后，不得不立即转入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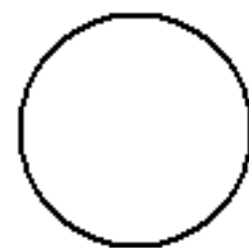
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的进攻，首先是在富农问题上展开的。在党加强对富农进攻的时候，他们公开站出来为富农打掩护。

他们掩护的富农，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呢？这个阶级在十月革命前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呢？

俄国的富农，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十月革命以前，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它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富农每年生产的粮食约占俄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八，每年提供的商品粮约占商品粮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这个阶级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在农村中的重要支柱，它极端仇恨无产阶级革命，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富农把粮食囤积起来，制造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企图困死苏维埃政权。富农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同外国帝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把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强加在工人和贫苦农民头上，妄想一举用暴力推翻刚刚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列宁当时写道：“富农暴动遍及全国。富农咬牙切齿地仇视苏维埃政权，恨不得把千千万万的工人斩尽



杀絕。”列宁指出了富农阶级的反动本质，他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①

针对俄国富农的特点和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凶恶的反抗，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镇压了他们的武装暴乱和其他形式的反抗，削弱了他们的经济力量。

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富农的力量又有所恢复。到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富农生产的粮食有六亿多普特，提供的商品粮有一亿多普特，虽然比起十月革命以前是减少了，但是这时它在经济上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力量。拿商品粮来说，富农提供的就占百分之二十，而且他们手里还掌握着相当多的存粮。

富农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到一九二七年，由于经过连续三年的丰收，他们的经济力量明显地增长起来，于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又达到一个高潮。这一年年底，富农又制造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公然拒绝出卖粮食，使红军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他们再次企图用饥饿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至少也迫使工人阶级作一次大规模的退却，让富农扩大自己的阵地。富农在粮食战线上的进攻，使国内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了。

布哈林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竭力保护的富农，就是这样一个剥削阶级。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联共（布）党之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就因为它反映着富农危险，而在大力开展农业集体化，向资本主义实行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富农危险是国内的主要危险。

在粮食战线上反对富农及其代理人的斗争

为了打退富农在粮食战线上的进攻，一九二八年春，党采取了非常措施来打击富农。国家以强迫手段向富农收购粮食，把违法的富农送交法庭审判，同时没收其余粮（在没收的粮食中抽出四分之一长期贷给贫农）。除此以外，还对富农加征了赋税。这些措施很快地收到效果，贫农和中农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富农的斗争，短时间内粮食收购情况就改观了。

党对富农的非常措施，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感到切肤之痛。他们大嚷大叫地吓唬党说，对富农的进攻“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他们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在于恢复和扩大富农经济，因此，他们要求宽容富农，不要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他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或

^① 《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38页。



向什么人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只要向富农让步，富农就会把粮食卖出来。

斯大林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这种要求。他指出，苏维埃政权必须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决不能依靠富农经济，决不能走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富农手里确实有余粮，但是富农决不会自愿放弃阶级利益。“富农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富农知道余粮不仅是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且是盘剥贫农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富农手里的余粮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①在規定收购价格和由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政策下，也就是在富农不能大发横财的条件下，富农决不会自愿交出粮食。

斯大林特别尖锐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妨碍富农经济”的主张。他说：“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②“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不了解富农是劳动人民的死敌，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死敌。他们不了解实行宽容和放纵富农的政策就是使我国整个政治状况恶化，使国内资本主义分子更有机可乘，使我们失去乡村的贫农，使中农灰心丧气，使我们和我国工人阶级决裂。”放纵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上都同列宁政策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原理绝对不相容”^③。斯大林斥责说，主张恢复和发展富农经济的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④

布哈林作为富农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理人，还竭力从右边曲解新经济政策，鼓吹“贸易自由”。他提议使市场“常态化”，也就是取消国家对市场的领导作用，使市场完全资本主义“自由化”。他提议提高粮价，也就是要国家放弃价格政策，跟在投机商贩后面，亦步亦趋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利于富农。

斯大林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斯大林说，新经济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另一方面是反对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斯大林强调说：“新经济政策决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决不是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而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限度、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⑤。

①⑤ 《論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79—80、40页。

② 《論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6页。

③ 《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7页。

④ 《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6页。



如果採納了布哈林的建議，在所謂市場“常態化”的條件下，跟在市場價格後面提高糧價，勢必造成嚴重的後果。斯大林說，不管國家怎樣提高糧價，都不能解決問題。“因為總有一些投機分子和包買商人又會用高出一兩倍的價錢來收買這些糧食。於是我們又必須準備再一次提高糧價，徒勞無益地爭取賽過投機分子和包買商人。”^①而且國家和投機商在提高價格上越是實行競賽，糧食持有者就越要把糧食囤積起來，等待價格繼續上漲，結果國家恰恰不能得到足夠的糧食。

斯大林還說，提高了糧價，就必須提高農業所生產的原料的價格，以保持各種農產品的一定比價。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就必須提高銷售價格，因而就必須加速提高工資，這樣一來，就必須提高工業品的價格。“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採取使工業品和農產品漲價的方針。”“不難了解，這樣‘調整’價格不能不弄得完全取消蘇維埃價格政策，取消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完全放縱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②

布哈林的提議實際上是把蘇維埃政權推上死路。斯大林指出，“我們如果不願意破壞蘇維埃制度，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放棄國家調節貿易的政策。”^③放棄這種政策，只會損害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僅僅有利於城鄉富裕階層。“工人和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將有充分權利來質問我們：我們是什麼政權，是工農政權還是富農耐普曼*政權？”“同工人階級和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破裂，同城鄉富有階層結合，——這就是布哈林的市場‘常態化’和按地區‘調整’糧價的必然結果。”“很明顯，黨不能走這條死路。”^④因此，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斷然拒絕了布哈林的提議，堅持了蘇維埃的市場和價格政策。

布哈林等人除了要黨向富農讓步以外，還曾經屢次要黨向西方資本家求告，依靠輸入糧食來解決糧食困難。

聯共（布）中央否決了這種要求，因為問題不在於是否可以輸入糧食和接受信貸，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不是一個通常的糧食貿易或者信貸的問題，而是關係到蘇聯國際地位的重大問題。外國資產階級在當時作出姿態，表示要貸給蘇聯糧食，並不是想作生意，而是一種惡意挑戰。斯大林分析說：“如果以為西方的資本家突然憐憫起我們來，願意幾乎白白地或者長期地貸給我們幾千萬普特糧食，那就可笑了。同志們，這是胡說。”“那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來各種不同的資本家集團想摸我們的底，想試探我們的財政力量、我們的支付能力、我們的堅定性……我們是否會上他們的鉤。”如果蘇聯在西方資本家的小恩小惠的試探面前彎下腰去，在政治上將是極大的失算。所以斯大林說：“現在的任務在於我們要表現出應有的堅

①②④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2、42、43頁。

③ 《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7頁。

* 耐普曼即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



定性和刚毅性，不要理睬关于貸給我們糧食的虛偽諾言，要向資本主义世界表明：我們不輸入糧食也行。”^① 事实证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是正确的。西方資本家的打算可耻地失败了，苏联在敌人面前稳固地屹立着，国际地位更加提高了。

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工农联盟 不包括富农，必須消灭富农阶级

布哈林之流为了维护富农，竭力給富农塗脂抹粉。他們否认农村的阶级对立，說什么富农“不过是穷人罢了”，因此，工农联盟就是工人阶级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

斯大林深刻地批判了布哈林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所主张的这种“阶级合作”的謬論，他指出：农民决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貧农、中农、还有富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貧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②。斯大林說：我們的政策是阶级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貧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誰认为在我們的情况下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誰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誰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③。

右傾分子說：反对富农，依靠貧农，会吓跑中农，使工农联盟破裂。斯大林批駁了这种說法，他指出，依靠貧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的任务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保证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是我們党的极重要的任务。但是，要保证这样的联盟，就必须对富农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須使貧农成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④。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如果不对富农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貧农还没有成为苏維埃政权的有組織的支柱，那么富农就会感到自己有力，中农就会倒向富农一边。相反地，如果加强对富农的斗争，如果貧农成为苏維埃政权的有組織的支柱，那末富农就会感到自己被包围了，中农就会倒向工人阶级一边。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始終执行列宁規定的“一分钟也不停止反对富农的斗争”的政策。斯大林說：“富农是苏維埃政权的敌人。我們和他們之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們对富农的政策是把他們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說我們一下子就能把他們消灭掉。这是說我們將設法包围他們并把他們消灭。”^⑤

一九二九年以前，反对富农的斗争表现为限制富农的剝削。当时苏維埃政权頒布了土地

①② 《論联共(布)党内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4、36頁。

③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監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1—42頁。

④ 《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員》。《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0頁。

⑤ 《答集体农庄庄員同志們》。《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7頁。



租佃法和雇佣劳动法，它一方面允许富农存在，同时又限制了富农对土地的使用和对雇工的剥削。苏维埃政权还向富农征收高额税并且责令富农按照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

一九二九年，情况起了变化。这个时候，“再容忍这些焚烧集体农庄、杀害集体农庄活动家并企图破坏播种的蜘蛛和吸血者，就是违反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必须以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那种最坚决最彻底的精神去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①一九二九年底，在集体农庄运动进入高潮的形势下，联共（布）中央由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转而采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即剥夺富农的生产资料，消灭富农剥削的政策。苏维埃国家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雇佣劳动法，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取消了禁止没收富农财产的法令，允许农民把富农的耕畜、机器及其他农具没收转交集体农庄。

六 农业集体化是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

不改造小农经济，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避免

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和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富农的保护者和代理人，当然要竭力反对农业集体化。他们认为，集体农庄在农业发展中不能起重大作用，应当全力发展个体经济。他们说：发展集体农庄会使国家没有粮食，加速发展集体农庄只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工农结合的破裂。他们还曲解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硬说列宁认为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不是集体农庄，而是供销合作社。

斯大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的实际，尖锐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这些谬论，从各方面论证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他指出：农业集体化是解决粮食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道路，是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道路，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根本道路。不实现农业集体化，资本主义复辟就必不可免。

斯大林指出，解决粮食问题，“是解决农业其他一切问题的钥匙”。不解决粮食问题，就不能保证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依靠小农经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斯大林说：“小农经济是什么呢？是出产商品最少、赢利最小、自给自足的程度最高的消费经济，它的产品的商品率只占百分之十二到十五。然而，我们的城市和工业正在全力成长，建设正在日益发展，对商品粮食的需求正在飞速增长。这就是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②小农经济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

① 《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8页。

② 《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9页。



解决粮食问题，是因为它不能采用新技术，不能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从技术上改造农业，就必须改造农村中的生产关系。斯大林指出：“建立大规模农业经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使大批农民破产而建立对劳动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大田庄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道路，是农民不会遭到破产、劳动也不会受到剥削的道路。”^① 斯大林说：“不同时改变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把个体小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不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连根铲除，就不可能改建农业的技术基础。”^② 因此，解决粮食困难的根本办法，发展农业的根本办法，就是“帮助贫农和中农把他们分散的小经济逐步联合为建立在新的技术和集体劳动的基础上的利益更大、出产商品更多的大规模集体经济。”^③

农业集体化是农民摆脱剥削、改善生活的光明大道。斯大林说，“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④。他深刻地批判了赞美小农经济“稳固”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说：小农吃得苦，耐得劳，“稳固”得很，大经济优于小经济的原理，在农业中是不适用的。斯大林说，把小农束缚在小商品经济上的东西，是土地私有制。小农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宁愿忍受各种困苦，宁愿陷入愚昧和贫困的境地。“这种‘稳固性’比任何不稳固性都坏。”事实上小农经济是不能稳固的，赞美小农经济的“稳固性”，实质上就是“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⑤。

斯大林论证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要比小农经济优越得多，不仅机械化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这样，就是依靠农民原有农具的初级集体农庄，也是这样。他说：“在集体农庄里面单是把农民的工具集合起来使用就产生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所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表现在……转上集体农庄轨道后播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而当他们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来并联合为集体农庄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⑥

斯大林痛斥了布哈林分子所说的农业集体化会使工农联盟破裂的胡说。他指出，布哈林分子既看不见农村的阶级对立，也看不见中农本身的两重性。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作为私有者，倾向于资本主义。如果不去改造农民，任他们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那么工农联盟恰恰不能巩固；要巩固工农联盟，必须改造个体农民，使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

① 《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8页。

②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5页。

③ 《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7—158页。

④ 《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3页。

⑤⑥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3、137页。



路。斯大林說，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阶级联盟，其目的必须是：“（甲）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乙）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作用，（丙）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对工农联盟的其他任何理解都是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社会革命党主义，无论叫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不能叫做列宁主义。”^①

斯大林指出，布哈林分子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农业集体化对立起来，是荒唐的。“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加引号的大道，这个计划包括农业合作社的一切形式，从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到高级形式（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当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合作社的低级形式即供销合作社是‘大道’，而当合作社的高级形式即它的集体农庄形式出现的时候，集体农庄就成为发展的‘大道’了。”他指斥布哈林分子冒充“列宁主义者”的市僧行径，“是侮辱列宁主义并证明自己愚昧无知。”^②

在同布哈林主义进行斗争中，斯大林根据列宁主义的原理指出，是否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不使社会主义去占领农村的广大阵地，如果不把小农经济联合为社会主义大经济，苏维埃政权在农村就会没有立足之地，就会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陷于失败。斯大林說：“个体农民是一个本身会分泌、产生和培养资本家、富农以及其他各种剥削分子的阶级。”^③“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户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的集体农庄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④

斯大林强调指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化以外，还必须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拥有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大规模的集体农业，作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唯一的稳固基础。”^⑤“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如果苏维埃政权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⑥。

农业集体化要有准备，要遵循自愿原则

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方面否认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一方面又借口条件不成熟，否认农业

①③ 《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81、82页。

② 《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7页。

④⑤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59、171—172页。

⑥ 《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8、219页。



集体化的可能性。他们断言：农民不会加入集体农庄。他们还說，机器和拖拉机不够，因此不能大量发展集体农庄，应当收缩集体农庄的陣地。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早就开始了农业集体化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这种准备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农民进行了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在农村广泛地发展了各种合作社，包括把个体农民耕种的土地联合起来共同劳动的共耕社；通过已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使农民根据切身体验相信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优越；对富农进行坚决的斗争，割断富农对劳动农民的影响；从财政上大力支持集体农庄的发展；从国民经济恢复到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初步建立了一些工业基础，为给农业供应机器准备了条件；等等。由于准备了这些条件，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农业集体化成为席卷全国的高潮。农民已经不是个别地，而是成批地，甚至整乡整区地加入集体农庄。起初加入集体农庄的基本上是贫农，在高潮当中，中农也大批地加入集体农庄。鉴于一九二九年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迅速扩展，同时社会主义在工业战线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所以斯大林把这一年称作“大转变的一年”。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的两面，在集体农庄运动迅速取得巨大胜利的形势下，一九三〇年初，有些人的头脑发热起来，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离开了党的路线，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用强迫命令手段来对待某些持观望态度的农民，强制他们参加集体农庄。另外，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公有化的现象。

党及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纠正这种违反党的路线的“左”倾错误。斯大林指出：“集体农庄政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政策是以集体农庄运动的自愿原则和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为依据的。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①“任何想用暴力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农庄经济的企图，任何想用强迫手段建立集体农庄的企图，都只能产生不良后果，只能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②

斯大林說，在当时，苏联集体经济的主要形式应当是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这种集体经济，公有化的范围只限于基本生产资料，它是广大农民群众比较容易了解的，它能够“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成功地使个人生活利益适应公共利益，从而有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昨天的个体农民。”^③

在反对集体农庄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时，斯大林始终没有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

① 《胜利冲昏头脑》，《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9页。

② 《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79页。

③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1页。



爭。他駁斥了那些看不到集体化运动的主流而专门对某些缺点錯誤指手划脚的右傾分子。他強調指出，“右傾危險过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的主要危險。”他說，反对“左”傾錯誤，乃是“胜利地和右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条件和特殊形式”。“左”傾錯誤引起了一部分农民的不滿，很快就被富农利用，便利了右傾分子破坏党的领导的威信，便利了他們进行反党活动。因此，“为了胜利地和右傾机会主义作斗争，必須克服‘左’傾机会主义者的錯誤。”^①

坚持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

到一九三二年底，苏联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拥有的耕地面积达到了农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到一九三四年，有百分之七十一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了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七以上。在集体化过程中，联共（布）中央注意了农业机械化问题。随着集体化的基本完成，到一九三四年，机器拖拉机站所服务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占集体农庄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九。

大批新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在組織领导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着許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而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则是：被打倒的富农阶级，在新的形势下改变了策略，钻到集体农庄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它严重地威胁着集体农庄。因此，加强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使新生的集体农庄巩固起来，成了当时的迫切任务。

从一九三一年起，联共（布）中央为巩固集体农庄采取了許多措施（包括一九三三年在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設立政治部）。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在同年二月召开的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論述了巩固集体农庄这个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說：“过渡到集体经济这一占优势的經濟形式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我們对农业的关怀，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共产党员在提高农业方面的领导作用。現在放任自流对农业发展事业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現在放任自流会葬送一切。”^②

斯大林批駁了这样一种錯誤观点：集体农庄既然建立起来，富农既然被打倒，农村中就没有阶级敌人了。斯大林說：富农被击潰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在集体化取得胜利以后，农村中的阶级敌人，改变了斗争策略，即由正面进攻轉为暗中破坏。因此，决不能泰然自若，决不能忘記阶级斗争。

斯大林生动地刻画說：“人們在集体农庄外面寻找阶级敌人，寻找面貌凶、牙齿大、脖子

^① 《答集体农庄庄員同志們》。《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0、191頁。

^② 《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9頁。



粗、手持半截枪的敌人。人们寻找我们在宣传画上所看见的那种富农。可是地面上早已没有这种富农了。现在的富农和富农的走狗，现在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大部分都是‘沉默寡言的’‘和蔼可亲的’人，几乎是‘洁白君子’。这种人用不着到集体农庄外面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他们就坐在集体农庄里面，在那里担任仓库管理员、事务主任、会计员、秘书等职务。他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说‘打倒集体农庄’。他们‘拥护’集体农庄。可是，他们在集体农庄里进行的怠工和暗害活动却使集体农庄大受其害。”①

在同敌对阶级作斗争中，斯大林把保护公有财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敌人“凭自己的阶级本能意识到公有制是苏维埃经济的基础，要危害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动摇这个基础。于是他们就真的用组织大规模盗窃侵吞的办法来动摇公有制。”“这些从前的人物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大规模盗窃侵吞国家财产、合作社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的勾当。”容许盗窃侵吞公共财产，就是帮助敌人来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因此，为保护公有制而斗争，是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斯大林号召全党，为粉碎垂死阶级对公有制的破坏，要运用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给我们规定的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去进行斗争”②。

斯大林提出了防止敌人利用社会主义的形式来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问题。他说：“我们许多同志对集体农庄这一新的经济形式估计过高，因而把集体农庄偶像化了。……他们不了解集体农庄本身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但是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危险，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反革命分子钻进集体农庄的领导机关，还不能防止反苏维埃分子在某种条件下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集体农庄。”③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苏维埃也罢，集体农庄也罢，虽然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但它终究是一种组织形式。一切都要以这种形式包含什么内容为转移。”④“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和苏维埃一样，是一种武器，而且仅仅是一种武器。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反对革命。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反对反革命。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服务。在某种条件下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服务。全部问题在于这个武器掌握在谁的手中，它被用来反对谁。”⑤

斯大林提醒全党警惕这种复辟危险，他要大家回忆下一九二一年白卫分子在喀琅施塔得举行反革命暴乱时的阴险口号：“拥护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斯大林说：“反革命分子懂得：问题不仅在于苏维埃本身，而且首先在于苏维埃由谁领导。”⑥

关于集体农庄内部的另一种阶级斗争，即由于农民的两重性而产生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曾经说过：“如果以为有了集体农庄，就有了建成社

①③④⑤⑥ 《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4—205、201—202、202、204、202页。

②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88、189页。



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那就錯了。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庄員已經变成社会主义者，那就更錯了。不是的，要改造集体农民，克服他們的个人主义心理，使他們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还必须作很多工作。”^①他告訴全党，不要忘記列宁这个指示：“改造小农，改造他們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經過几代的事情。”^②

为了巩固集体农庄，斯大林还提出了“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員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他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說，集体农庄建立起来，改善了貧农的生活，这只是第一步。“我們現在必須更前进一步，帮助全体集体农庄庄員，不論是从前的貧农或从前的中农，上升到富裕农民的水平。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們无论如何必須做到的。”^③

使全体庄員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它和布哈林在一九二五年提出过的“发财吧”的口号，是根本不同的。斯大林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第一，能够发财的只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和生活富裕的口号有关的不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是全体集体农庄庄員。

第二，“发财”必然和剝削联在一起，而使全体庄員生活富裕的口号是排除剝削的。

第三，“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員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不是孤立地提出来的，它是在集体农庄已經占了統治地位的时候，和“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維克的集体农庄”的口号联在一起提出来的。

因此，斯大林指出：“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資本主义，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員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却要用加强集体农庄的办法来消灭資本主义。

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击败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业集体化的种种阻撓，农业集体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牵涉到人数最多的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消灭在乡村中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經濟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这次革命，把苏联一个人数最多的剝削阶级富农的生产資料剝夺了；使苏联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即劳动农民，离开了滋长資本主义的个体經濟道路，轉上了集体經濟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国民經济基础部門即农业当中，給苏維埃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設的进一步发展。

① 《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45頁。

②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頁。

③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22頁。



七 批判布哈林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一切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拼命鼓吹阶级合作，抹杀阶级斗争。布哈林和他的追随者也是这样。为了维护富农阶级、反对党的路线，他们搬出一套“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对抗。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中，着重批判了他们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谬论。

富农和资本家决不能自流地“长入”社会主义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必经过阶级斗争，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就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体系，阶级敌人将会不经过抵抗而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应当使阶级斗争熄灭下去。为了宣扬这种修正主义理论，他居然歪曲列宁的思想，硬说列宁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好像是“一样的”，都认为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斯大林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批判了布哈林的这些谬论。他说：“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现在，按照布哈林的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① 斯大林指出，资产阶级自由派鼓吹“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长入资本主义”那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反社会主义的，可是，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然同时鼓吹阶级利益调和的理论，鼓吹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

斯大林说：“不能认为事情会这样，社会主义的形式将发展起来，排挤工人阶级的敌人，而敌人会一声不响地退却，为我们的前进让开道路，然后我们再向前迈进，而敌人再向后退却，最后，‘出乎意料地’，所有一切社会集团毫无例外，无论是富农或贫农，无论是工人或资本家，都‘突然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和波折就投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这种神话是根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② 他又说：“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在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分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幼稚公式中寻找出路。我国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按照布哈林的公式发展的。我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发展的。是我们打垮、压倒他们剥削者，还是他们打垮、压倒我们苏联的工人和农民，——

①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页。

② 《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0页。



同志們，問題就是这样摆着的。”^①

斯大林揭穿了布哈林对列宁思想的无耻歪曲。他指出：列宁讲过，苏維埃政权容許资产阶級在一定条件下存在，所謂一定的条件，恰恰就是要限制和排挤资产阶級，就是要同资产阶級进行絕不調和的阶級斗争，并在斗争中把它消灭。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現了一种所謂“平衡論”。这种理論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論的翻版。这种理論认为，国民經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資本主义成分），好像两个箱子，它們沿着不同的軌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等到它們相交的时候，就“有了”社会主义。

斯大林批判說，在两种經济成分后面站着阶級，“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級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按照‘誰战胜誰’的原則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②“平衡論”在表面上抹杀阶級和阶級斗争，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的陣地，把富农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化运动。

“平衡論”的鼓吹者，企图在发展大农經济的两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之外，走什么第三条道路。斯大林指出，所謂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是“想要我們回到旧制度去，回到个体經济去，不过不要地主和資本家。同时，他們想要我們‘只’容許富农和其他小資本家作为我国經济制度中的合法現象而存在。其实，这并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第二条道路，即走向資本主义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經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剝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維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結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維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級政府。成立资产阶級政府的結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資本家，恢复資本主义。”所以“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向前进，向上走，走到新的集体农庄制度；或者向后退，向下走，走到旧的富农資本主义制度。第三条道路是沒有的。”^③

和“平衡論”一起出現的，还有所謂社会主义建設“自流論”，这同样是布哈林那种資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論的翻版。这种理論认为，既然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农村会自发地跟着資本主义城市走，那末在苏維埃制度下，小农經济的农村也会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因此，不必为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而操心。

斯大林駁斥說：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农村之所以能够自流地跟着城市走，是因为城市的資本主义經济和农民的小商品經济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經济，都是以生产資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但是在苏維埃制度下，农民小商品經济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却不是同一类型的，因

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7頁。

② 《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8頁。

③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7頁。



此，它决不会自流地跟着城市走。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城市对小农经济的农村的领导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单靠这个因素并不能使农村自流地跟着城市走，要使“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①

“自流论”是一种否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的腐朽理论。斯大林指出，苏维埃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它变成现实，必须摒弃机会主义的自流论。“无阶级社会是不会按所谓自流的方式到来的。它是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的手段，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争得和建成的。”^②

斯大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布哈林的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③

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

斯大林在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时，引证了列宁一九一九年说过的一段话：“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的和旧社会民主党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④

斯大林概括地说：“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⑤

斯大林指出：“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⑥他说：“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的。”“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⑦

①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2页。

②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0页。

③⑤⑦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31、35、34—35页。

④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2页。

⑥ 《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0页。



国内垂死阶级的反抗，是和国外资产阶级相呼应的，因为存在着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斯大林说：“不能把资本主义包围看做单纯的地理上的概念。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有机会时就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①“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②

斯大林不断地告诫全党，决不能对国际资本做原则性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因此，必须估计到国际资本今后将继续给苏联制造各种各样的祸害。他严厉地批驳了想讨好帝国主义的人，说：“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执行解放的对外政策，同时又能博得欧美资本家对我们的这种行为的赞扬。我不想来证明，这些天真的人和我们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或者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③

针对着国内外阶级敌人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和破坏，斯大林强调指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斗准备。他说：“历史证明：最大的军队，由于骄傲自大，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过分轻视敌人的力量，由于沉睡，失去了战斗准备，在紧急关头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结果遭到了灭亡。就是最大的政党，如果它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如果它不时时刻刻加强本阶级的战斗准备，也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灭亡。”④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并不是临时的、瞬息即逝的任务，“在我们国内还有阶级、我们还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时候，加强无产阶级战斗准备这样一个任务就应该贯穿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⑤

曾经有人想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和国家消亡的理论，来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辩护。

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这种企图。他说：

“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

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5页。

②③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6、47页。

④⑤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7—58、59—60页。



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①

“我们主张国家的消亡。而我们同时又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这个至今存在的一切国家政权中最强大最有力的政权。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亡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矛盾的’吗？是的，是‘矛盾的’。但这是生活中的矛盾，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②

必须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布哈林分子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高喊阶级斗争应当熄灭下去，实际上他们这种言行本身恰恰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因此，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对敌对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必须同敌对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进行到底。斯大林说：“我们党的队伍里的种种脱离列宁路线的倾向，也就是垂死阶级反抗的反映。如果不同时和我们党内各种倾向作斗争，如果不克服这些倾向，能不能和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后方有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有不相信我们的事业并且千方百计阻碍我们前进的人，就不可能对阶级敌人展开真正的斗争。”^③

托洛茨基分子否认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的发展，结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布哈林分子的观点虽然在形式上同托洛茨基分子有所不同，但是实质上却是一样的。斯大林说：布哈林分子虽然“表面上承认在一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却不愿意承认建成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斗争方法和手段。他们不愿意承认，大力发展工业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钥匙。他们不愿意承认，必须同资本主义成分作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必须向资本主义展开大规模进攻。他们不了解，这一切方法和手段是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一套措施。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可以悄悄地、自流地建成，不必经过阶级斗争，不必向资本主义成分进攻。他们以为资本主义成分要就是无声无息地自行消亡，要就是长入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奇迹历史上不曾有过，所以右倾分子实际上是滚到否认在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上去了。”斯大林又说，布哈林分子表面上不否认有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否认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必不可少的方法和手段。”“他们认为目前主要的不是高速度发展工业，也不是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是‘放纵’市场的自发势力，‘开放’市场，给个体经济以至农村资本主义成分‘解除羁绊’。但是，

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

②③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0—321、307页。



富农是不能长入社会主义的，而‘开放’市场就等于武装富农阶级和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所以右倾分子实际上是滚到否认有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的观点上去了。”^①

斯大林指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联共（布）党内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柢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②。“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于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富农对党施行的压力。”^③

斯大林指出，如果容许右倾机会主义在联共（布）党内自由活动，就会使工人阶级解除武装，就会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就会使资本主义分子武装起来，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机会增多。因此，他说：“决不能把反右倾的斗争看做我们党的次要任务。反右倾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决定性的任务之一。如果我们在自己的队伍里，在自己的党内，在领导运动和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政治参谋部里，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动，而右倾分子正在企图涣散党，瓦解工人阶级，使我们的政策适合‘苏维埃’资产阶级的口味，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低头，——如果我们容许这一切，那末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准备逐渐消灭革命，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逃避困难，把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吗？”斯大林着重指出：“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背叛革命”^④。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正是坚决地、不调和地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进行了斗争，及时地反复地揭穿了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党的阴谋活动。

布哈林集团同党的分歧，早在一九二八年的七月中央全会以前就明朗化了。可是他们对党耍两面派手法。从一九二八年七月到十一月，布哈林等人同斯大林以及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曾经两次声明：政治局内部没有分歧。事实证明，布哈林等人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反党活动。就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布哈林等人在背地里和加米涅夫进行了幕后谈判，阴谋同托洛茨基分子组成反党联盟，企图更换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改变中央的政策。七月以后，他们的反党活动变本加厉起来。布哈林公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攻击党的政策，同时，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又拿辞职来要挟中央。一九二九年初，布哈林等人向中央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他们重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滥调，诬蔑联共（布）中央“没有民主”、“培植官僚主义”、“党内制度已经令人不能容忍”等等，并且，装着

①③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1—312、313页。

②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页。

④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4页。



“受屈”的样子，大肆诽谤党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恶意攻击”。

一九二九年一月至四月，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上，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布哈林等人卑劣的反党伎俩，并彻底揭露了布哈林分子关于他们和党之间不存在路线分歧的伪善声明。斯大林说：“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①

鉴于布哈林集团一再对党耍两面派手法，进行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反对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联共（布）中央一九二九年的十一月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严重警告了李可夫、托姆斯基等机会主义分子，责令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党的路线和决议的活动。但是，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们，继续在暗中进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党活动。因此，在一九三〇年六月举行的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分子。

经过这一系列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被击败了。

八 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从列宁逝世到三十年代初，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托洛茨基集团和布哈林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前进。在这期间，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斯大林，也为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了贡献。

当时，要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一方面继续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不进行这种斗争，各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就不可能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去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斯大林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揭穿了机会主义者散布的种种取消革命的谎言；他忠告各国共产党人要同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能姑息迁就；他提出很多正确意见，帮助了各国共产党人。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

①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页。



資本主义的暫時穩定决不意味着革命的死亡

从一九二四年起，資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暫時局部稳定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續到一九二八年。在这期間，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貿易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在改进技术和实现生产的資本主义合理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而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則暫時处于退潮时期。资产阶級为此弹冠相庆，欢呼資本主义統治巩固了，欧洲各国的革命将长期“擱置下来”。

资产阶級的走卒，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立即随声附和，唱起了歌頌資本主义的贊美詩，紛紛断言革命死亡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家”德国的希法亭宣称，資本主义已經得到了改造，“克服了自由竞争”，成了“有組織的資本主义”。英国工党的头目麦克唐納之流叫喊說，阶級之間沒有战争了，革命結束了，現在的事情可以用阶級合作来代替了。

共产党內的机会主义者，这样那样地重复着资产阶級和社会民主党的濫調。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之流认为，資本主义暫時稳定，就意味着革命事业的垮台，为了冒充“革命”，他們否认資本主义暫時稳定这个明显的事实。布哈林之流宣称，資本主义正在改造，內部矛盾緩和了，資本主义稳定是持久的、巩固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仅仅存在于国际市場上。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同样地拚命宣传这种論調。

当时，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国际形势，闡明資本主义暫時稳定的性质，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实践意义。对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來說，这是正确地制定斗争策略必須首先解决的重大問題。

一九二五年五月，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总结》中，对資本主义制度稳定的性质作了全面的分析。他一方面說明了資本主义制度稳定的事实，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这种稳定是暫时的局部的，它在使資本的力量增强的同时，必然使資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尖銳化。他說：“不加紧剝削工人阶級，不使大多数劳动者过半饥半饱的生活，不加紧压迫殖民地和附屬国，世界资产阶級各帝国主义集团間不发生冲突和糾紛，資本主义就不能发展。”^①因此，資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級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最后破坏資本主义的稳定。

以后，斯大林一再分析了資本主义暫時稳定和資本主义危机的辯证关系。他說，“正是从这种稳定中，从生产增长，貿易扩大，技术进步，生产能力提高，而世界市場、世界市場范围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势力范围仍旧相当稳定的情况中，——正是从这种情况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銳的世界資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从局

^①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80頁。



部稳定中产生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化，日益增长的危机又破坏着稳定，——这就是现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①

根据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分析，斯大林指出，同机会主义者的断言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众革命斗争的暂时退潮，决不是世界革命的末日，决不是世界革命的消灭。革命退潮一定会被新的革命高潮所代替。斯大林写道：“革命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继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经过进攻和退却、来潮和退潮的道路的。在发展进程中来潮和退潮锻炼了革命力量并且准备了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就是已经到来的革命退潮时期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平静时期的历史意义。”^②

事实充分证明了斯大林的论断是正确的。就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英国、德国、法国、捷克、波兰等国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奥地利工人发动了武装起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也发展了起来。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它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三年。这次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爆发的，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破坏程度之深，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局面结束了。机会主义者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胡说，在事实面前彻底破产了。

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发展生产是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却总是被他们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范围内，因此，就产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斯大林说，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预防或消灭危机是不可能的。“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③

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暂时局部稳定时期，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协约国在伦敦举行会议，通过了所谓“道威斯计划”。一九二五年十月，在瑞士罗迦诺举行了有英、法、意、德等国参加的会议，缔结了以反对苏联为目的的“罗迦诺公约”。这两次会议以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泛滥了起来。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宣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解决了，“罗迦诺公约”是“和平条约”，并且大肆宣传所谓“罗迦诺精神”。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4页。

②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78页。

③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5页。



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也扮演了这种角色，说什么帝国主义之間沒有斗争了，不再会有战争了，现在的事情可以用美国领导下的“普遍和平”来了结了。他们还說，罗迦諾公約是“和平工具”，国际联盟是“和平救星”。

斯大林彻底揭穿了这类欺騙宣传，指出：无论是伦敦會議，还是罗迦諾會議，都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只是暂时掩盖了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爭权夺利的斗争正在加剧，“它們之間的冲突日益成为不可避免，而它們既預察到新的战争，于是就用尽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来扩充軍备。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說各战胜国間現在並沒有友好的和平，而只有武装的和平，只有酝酿着战争的武装和平状态，那並沒有夸大。”^① 罗迦諾公約正是准备新战争的条約，“‘罗迦諾精神’的基本內容就是‘战争精神’”^②。

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在准备新的战争，它們才需要“伪善的和平歌手”来欺騙群众。斯大林說：“目前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及其国际联盟、‘和平’的宣传、‘制止’战争的叫嚷、‘废除軍备’的空談等等，就是麻醉工人阶级并使他們脱离反战争危险的斗争的最流行的形式。”“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詞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沒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③

第二国际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卖力地宣传和平主义，表明第二国际不仅是资产阶级腐蝕无产阶级的組織，而且是帝国主义国际联盟的直接附属品。斯大林說，“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說，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④

斯大林在揭露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总是指出革命的必然性。他說：“战争必然会使情况更加混乱。而且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发生問題，就像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⑤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决不能反对一切战争。斯大林指出，不区别战争的性质，借口战争恐怖而反对一切战争的人，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是一样的貨色。斯大林在給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們不是反对任何战争。我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战争。但是我們拥护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战争，虽然大家知道这种战争不仅沒有免于‘流血的恐怖’，甚至充滿了这种恐怖。”^⑥

①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32頁。

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0頁。

③④ 《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4頁。

⑤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1頁。

⑥ 《給阿·馬·高尔基的信》。《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4頁。



争取广大工人群众，使工人阶级革命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暂时稳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暂时低落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是什么？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革命立场，高举革命旗帜，决不能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放弃革命工作，决不能坐待革命高潮的到来。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退潮时期，必须进行艰苦的工作，以革命精神教育群众，积蓄力量，创造条件，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进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斯大林认为，在革命退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尽量利用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一切矛盾，来瓦解和削弱资产阶级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的阵地；加强和工人群众的联系，掌握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建立工人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用一切可行的方法争取农民群众，尽力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和平主义，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使“工人阶级革命化”，否则，其他任务都会落空。

要使工人阶级革命化，除了通过各国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领导下的革命工会进行工作外，还必须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进行艰苦的工作。当时的改良主义工会及其国际组织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控制着大批的工人群众。因此，必须系统地揭露改良主义工会领袖的叛卖行径，争取工人群众到革命方面来。斯大林说，要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单靠外面的工作是不行的，必须进行里外配合的工作。

但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却认为共产党人应当退出改良主义工会，反对同它建立统一战线。

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八月的一个演说中指出，托洛茨基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就批判过“退出工会”的口号，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的最大效劳”。斯大林说，采取托洛茨基的观点“就等于把工人群众交给阿姆斯特丹去任意宰割”^①。

斯大林指出，共产党人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反动首领在一定条件下达成政治协定和结成政治联盟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这样的联盟只有具备下述两个基本条件才可以缔结：保证我们有批评改良主义首领的自由，保证有使群众脱离反动首领的必要条件。”^②

^{①②} 《关于美俄统一委员会》。《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58、168页。



斯大林既批駁了“退出”改良主义工会、否认統一战綫策略的“左”傾冒险主义，又批駁了把工人階級斗争局限于改良主义工会范围的右傾机会主义。

一九二八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在德国魯尔区，沒有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工人群众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洪别尔—德罗和謝拉等机会主义分子却对这件事情感到奇怪，他們反对共产党人越出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来领导工人階級的斗争。

同这些机会主义者相反，斯大林热情地贊揚了魯尔工人的革命积极性，热情地贊揚了德国共产党人越出改良主义工会把工人群众組織起来进行斗争的革命行动，称赞他們勇于反对工会官僚的革命精神。他特別指出，魯尔工人的斗争表明，沒有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工人比組織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人更加革命，因为领导改良主义工会的是那些和資本家階級有千絲万縷联系的官僚主义分子。斯大林认为，各国共产党人应当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但是决不应当把群众工作局限于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内，决不应当做改良主义工会的規范和要求的奴隶。否則，就是要共产党去扮演无产階級斗争消极观望者的角色，就是放弃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斯大林說，既然改良派的领导和資产階級勾結在一起，那末，“完全可以設想有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必須违反那些卖身于資本家的工会头子的意志而成立平行的工人階級的群众性組織。”^①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要完成摆在自己面前的繁重任务，团结群众，积聚力量，反对垄断資产階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首先必須把自己鍛炼成为坚强的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革命政党。

一九二五年二月，斯大林总结了列宁締造的布尔什維克党的丰富的斗争經驗，指出了各国党要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应当具备的十二个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就是：

“（一）必須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須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費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来复去所說的那样；而必須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階級的階級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負有领导无产階級組織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二）必須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馬克思主义革命理論。

① 《論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59頁。



“（三）必須使黨在制訂口號和指示的時候，不是根據背熟的公式和歷史的比擬，而是根據對革命運動所處的國內外的具體條件的仔細分析，同時還必須考慮到各國的革命經驗。

“（四）必須使黨在群眾的革命鬥爭的烈火中檢查這些口號和指示的正確性。

“（五）必須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來改組黨的全部工作，特別是當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在黨內還沒有清除的時候。這樣，黨的每個步驟和每個行動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眾革命化，使工人階級的廣大群眾受到革命的訓練和教育。

“（六）必須使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最高的原則性（不能和宗派主義混為一談！）和與群眾最廣泛的聯繫及接觸（不能和尾巴主義混為一談！）結合起來。不然，黨不但不能教導群眾，而且也不可能向群眾學習；不但不能引導群眾並把他們提高到黨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傾聽群眾的呼聲和預料到他們的迫切需要。

“（七）必須使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險主義混為一談！）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及機動性（不能和遷就行為混為一談！）結合起來。不然，黨就不可能掌握各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不可能把無產階級的日常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利益聯繫起來，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配合起來。

“（八）必須使黨不掩飾自己的錯誤，使它不怕批評，使它善於用自己的錯誤來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幹部。

“（九）必須使黨善於把優秀先進戰士選拔到基本的領導集團中去。因為他們十分忠誠，足以成為革命無產階級的意向的真正表達者；他們有豐富的經驗，足以成為能運用列寧主義的策略和戰略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

“（十）必須使黨經常地改善自己組織的社會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機會主義分子，以便達到最大限度的團結一致。

“（十一）必須使黨制訂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這種紀律的基礎是思想的一致性、運動目的明確性、實際行動的統一和廣大黨員群眾對待黨的任務的自覺態度。

“（十二）必須使黨經常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的執行情況。不然，這些決定和指示就有變成空洞的諾言的危險，而空洞的諾言只能破壞廣大無產階級群眾對黨的信任。”^①

斯大林說，“沒有這些條件，各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②

在共產國際的支持和斯大林的幫助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學習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包括正面經驗和反面經驗，在同機會主義的鬥爭中，逐漸發展和壯大起來。

①②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5—37、35頁。



对机会主义决不能姑息迁就

斯大林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状况。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年轻的共产党的成员是复杂的，有一部分人是受过旧的训练的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有一部分人虽然原来不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但也没有受过足够的革命锻炼。党的领导干部中间，有不少人还没有完全和社会民主主义断绝关系。而共产党又面对着强大老练的敌人。一个是资产阶级，它拥有国家机关和各种宣传工具。一个是社会民主党，它在工人群众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它们都竭力在共产党内部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要成为能够引导群众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领袖，就必须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党内的影响。

斯大林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右倾错误的危害性。他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和倾向，就是使共产主义去迁就社会民主主义。“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总之，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保存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①。

当时在德国共产党内出现了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在法国党内出现了苏瓦林集团，他们支持托洛茨基分子在联共党内的反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国内执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他们的活动也得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支持。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德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同这些机会主义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把路特·费舍、马斯洛夫、苏瓦林等人开除出党和共产国际。而托洛茨基却说，共产国际开除他们是不正确的，要力争把他们重新接受入党。斯大林愤怒地斥责了蔑视共产国际决议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说：共产国际已经决定开除马斯洛夫等机会主义分子，而托洛茨基却企图撕毁共产国际的决议，把他们重新拉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来，以便保留一个“后备武器”，随时攻击共产国际。“可见在托洛茨基看来，无论党或共产国际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托洛茨基个人的意见。”^②

托洛茨基和他在别国的同伴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被清除后，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破坏各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坚决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面目。一九三〇

①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4—195页。

②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3页。



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里指出：“托洛茨基叛徒和右派叛徒在一切基本政策和策略问题上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同时无论其中任何一派都以社会民主党直接代理人的身份为极力瓦解共产党而从事完全一样的活动，这种活动竟发展到成立公开集团的地步（汉堡和中国）。”一九三一年，斯大林说：“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早已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了。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①

斯大林反复向国际共产党人说明，必须同机会主义者进行长期的严肃的斗争，把他们清除出去，决不能姑息迁就。战胜机会主义是一件复杂的重大的事情，需要深入地进行工作，“主要的问题是在原则性的斗争过程中从思想上和精神上粉碎右派集团，并把广大的党员群众吸引到这个斗争中来。”^②

当斯大林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布哈林叫嚷说，清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瓦解”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出，“当右倾分子正在散播社会民主党腐朽的思想毒素并且不断破坏党的纪律的基本原则，而调和分子还给右倾分子帮忙的时候，继续容忍这种‘秩序’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要求。”^③他说，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进行坚决斗争，“就是巩固共产国际，清除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帮助各国共产党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④。

为了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强调各国共产党在发生路线分歧的时候，要进行原则性的相互批评，决不能附和任何党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他说，“我觉得某些德国同志有时候喜欢要我们完全附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他们自己则时刻准备在一切问题上都附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我坚决反对这种相互附和。”^⑤他还尖锐地批评了这样一种错误看法，即如果苏联利益要求的话，西方各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右倾的政策。斯大林斥责这种说法是“荒谬绝伦的”。他说，“实行右倾政策是什么意思呢？无论如何这就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我不能设想苏联的利益会要求我们兄弟党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哪怕是一秒钟。”^⑥

① 《论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88页。

②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57页。

③ 《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60页。

④ 《论联共（布）党内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5页。

⑤ 《给麦一尔特同志的信》。《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0页。

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德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03页。



九 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上反对“左”右傾机会主义

从一九二四年以后，虽然資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轉入低潮，但是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革命的高潮震动了整个世界。

斯大林一貫重視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号召“不要忘記东方”。

欧洲革命轉入低潮以后，斯大林对东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更加关注。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間，斯大林为保卫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策略，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傾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銳的斗争。

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階級世界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

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內容，是关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把列宁在民族問題方面加进馬克思主义宝庫中的新貢獻，作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列宁的新貢獻在于：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殖民地的基本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說的严整体系；把民族殖民地問題和推翻帝国主义問題联系起来；把民族殖民地問題看作无产階級世界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

斯大林在《論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闡明了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并且猛烈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反动的民族观点。

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民族問題上是根本对立的，

(一)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通常都把民族問題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狹隘範圍內，他們根本沒有把东方被压迫民族看在眼里。这些“文明”的老爷們只关心欧洲民族的命运。斯大林写道：“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民族和非洲民族，通常都不放在他們的眼里。他們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論。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迴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劫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現象，拆毀了橫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間的墻壁，因而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来了。于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問題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問題，变成了附屬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問題。”^①

^① 《論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2頁。



(二)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曲解民族自决原则，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甚至把民族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他们认为被压迫民族只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然掌握在统治民族的手中。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吞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①

(三)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权”的问题，他们只满足于冠冕堂皇地发表“民族平等”的宣言，而不用实际行动去直接援助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援助，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②

(四)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看成一个改良的问题，看成一个孤立的问题，认为它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没有关系，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关系。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③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驳斥机会主义者缩小民族问题社会意义的企图时，强调指出：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被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从那时候起，国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太可笑了。”④

斯大林指出：“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国王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

①②③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2—123、123、124页。

④ 《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84—185页。



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领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份，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这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①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巨流的汇合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前提出发，他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系列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作了重要的论述。当时中国是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革命引起了全世界反动派的注意，他们联合起来，力图用最残暴的手段扑灭它。同样，这个革命引起了全世界革命派的注意，他们把中国革命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尽一切可能支持它，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这个期间，斯大林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论述，有很多都是通过对中国革命的分析而展开的。

当中国革命初露锋芒的时候，斯大林就预见到它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他在一九二五年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这种力量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它在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执政者看不见这种力量，不充分估计这种力量，他们一定要吃亏。”“真理和正义完全在中国革命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情并且将来还会同情中国革命，同情它为使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并把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斗争。”^②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又说：“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③

中国革命既然具有如此严重的意义，它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分子的注意。所以在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反动派镇压和破坏中国革命的同时，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也按照帝国主义的节拍活动起来。他们利用自己假革命的伪装，作出“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样子，力图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托洛茨基分子破坏中国革命的一个阴险手法是：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歪曲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以便使中国人民找不到当时主要的斗争对象，越过必要的革命步骤，

①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5—126页。

②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2、243页。

③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2页。



結果必然陷于失敗。托洛茨基說：中国沒有封建地主階級，在农村只有富农和高利貸者，这些都是資產階級，因此，中国革命沒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另外，托洛茨基虽然口头上承认中国革命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是却把这种任务归结为实现“关税自主”。他說：中国革命之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生产力发展受阻于关税受帝国主义控制”。根据这些胡說八道，托洛茨基企图使中国革命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他說：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对資產階級，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取得胜利的唯——道路”。

斯大林揭穿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正确分析。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說中指出：“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軍閥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軍、省长、將軍、张作霖之流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借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規模来說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①

斯大林指出：“土地革命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因此，他得出結論說：“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②

斯大林还指出，中国革命不仅有反封建的任务，同时还有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財政的和軍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所以，“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結合。”^③

事实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不仅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而且是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的基本任务。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一般都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决定了这些国家的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因此，斯大林对当时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論述，对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說，具有普遍意义。

无产階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革命 斗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的道路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革命的动力是哪些階級，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有根本不同的回答。在这个問題上，斯大林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原則性

^{①②③}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0、260、260—261頁。



的斗争。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看成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抹杀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劳动群众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没有把民族问题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总问题的一部分，而是想通过改良主义的“立宪”道路来“解决”民族问题。

斯大林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说：当民族问题已经变成世界问题的时候，“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财政剥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① 斯大林指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主要不在于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在于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被压迫民族的基本群众即农民群众，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斯大林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②

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从另一个极端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群众性。他们根本反对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企图把无产阶级置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他们硬说，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完全是反革命的，甚至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比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更“反动与卑劣”。

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是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敌人很强大，“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其他一切而外，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灵活的和考虑周到的政策，必须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裂痕，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③ 斯大林说，必须按照列宁的指示，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不触犯到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④。因此，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殖民地革命的一定阶段同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联盟和协议，不但是可以容许的，而且简直是必要的”^⑤。

斯大林强调指出了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性。当中国人民胜利地

① 《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84页。

②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61页。

③ 《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5页。

④⑤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1—12、23页。



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斯大林对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给以热情的支持。他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加强军事工作，“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①

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曾经有人认为，中国革命可以经过国民党这种几个阶级的联合组织，用和平的方法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坚决地批判了这种思想。他指出，在中国，既然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既然有国民党右派，“那就非打架不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无论是国内的（张作霖、蒋介石、大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等等）或国外的（帝国主义者），都太多太强了，不能设想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可以避免严重的阶级搏斗和严重的分裂与投敌行为。”他明确地断定：这些人所主张的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②

斯大林特别注意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他说，要使革命达到胜利，需要很多条件，但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党的政策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的领导者。”^③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时候，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④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支持革命，但总是利用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使共产主义的歌声“融合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合唱”当中。“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公开组织工农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⑤而且，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紧紧掌握住领导权，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才会走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支援殖民地革命，不能害怕得罪帝国主义

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始终把支援世界革命作为自

①④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322页。

②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8、229页。

③ 《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10页。

⑤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6页。



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

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就说过：“由于历史命运的支配，我们苏维埃联邦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先进部队”，“我们第一个突破了整个资本主义战线，由于命运的支配，我们走在一切人的前面。”^① 这种地位给苏联党和人民加重了支援世界革命的责任。他说：“或者我们把帝国主义的大后方——东方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发动起来，使它们革命化，从而加速帝国主义的崩溃”；“或者我们在这方面犯错误，破坏过去被压迫民族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失掉共和国联盟在东方心目中的吸引力，那末帝国主义就会胜利，我们就会失败。”^②

斯大林在谈到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时，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民族运动，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对这两种民族运动应当有不同的态度。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③

在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当中，支援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就要“得罪”帝国主义。有人害怕“得罪”帝国主义，因而不敢支援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是这样想的：“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④

斯大林批判了这种可耻的想法，指出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他分析了这种民族利己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的。他说：“不用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不是随时都能抵挡得住这种压力的，产生各种纠纷的危险往往引诱人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⑤

斯大林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伟大意义，给以极高的估价，他预见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将宣告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他在一九二五年说：“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

①②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92、193页。

③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4页。

④⑤ 《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0、141页。



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①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更明确地指出：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东方的革命运动“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命运不能沒有决定的意义”。“很明显，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觉醒預示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末日。”^②

十 結 束 語

“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③ 斯大林在他光輝的一生中，信守了这一誓言。

当列宁在世的时候，斯大林曾經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曾經为准备和实现十月革命进行了斗争，曾經为保卫革命果实进行了斗争；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和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领导苏联三十年，經歷了很多复杂和尖銳的斗争。最初的十年，他领导苏联人民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艰苦斗争的同时，是在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中度过的。

斯大林所坚持的列宁主义路綫同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路綫的分歧，实际上，是要在苏联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設，还是使資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問題。

实践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实践，对联共（布）中央和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集团所主张的路綫，作了最好的檢驗。

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坚持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坚持了繼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綫，坚持了正确的建設方針，社会主义在苏联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九二八年十月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計划，到一九三二年底就提前完成了。

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总结》中說：从前，苏联沒有鋼铁工业，沒有拖拉机工业，沒有汽車工业，沒有机床制造业，沒有巨大的現代化学工业，沒有真正巨大的現代农业机器制造业，沒有航空工业。現在，这些工业都已經有了。原来苏联在电力、石油和煤炭生产方面占最末位，現在已經升到最前列的一个位置了。由于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工业的巨大发

① 《关于东方革命运动》。《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92頁。

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1、242頁。

③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維希的談話》。《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頁。



展，“苏联从没有国防准备的弱国变成了国防力量雄厚的强国，变成了能够随时应付一切意外事件的国家，变成了能够大量制造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并将这些武器供给自己的军队去抵御外侮的国家。”^①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欧洲的第一位，世界的第二位。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不仅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而且由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变成拥有建立在社会主义集体劳动基础上的大规模农业的国家，富农的生产资料已经被剥夺，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的主人。

实践证明，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斯大林所坚持的列宁主义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伟大胜利，实际上是联共（布）党内自列宁逝世后所开始的这场大论战的总结。论战以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彻底失败告终了。

到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联共（布）经过十年的党内斗争之后，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因此，这一次代表大会以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例如，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一九三六年，斯大林过早地宣布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任何剥削工人阶级的可能都完全消除了；一九三八年，斯大林认为，就国内关系来说，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和建立起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是就外部关系来说，完全保证苏联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危险的问题，暂时还没有解决。斯大林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些错误中，有些是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分不开的。但是，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功绩比较起来，是第二位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终结，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5页。



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始终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在这场斗争当中，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总是力图使资本主义复辟。同时，苏联又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帝国主义国家支持苏联国内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力量，企图通过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武装侵略来扼杀社会主义国家。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产生的根源。

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同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集团的斗争以及后来苏联国内党内的多次斗争中，可以看出，不仅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会出现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只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只要国内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还没有进入无阶级社会，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也会出现修正主义、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采取实际措施来防止和克服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如果那里的党没有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如果党员和人民群众失去警惕，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就会乘机嚣张起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背叛本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路线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相反，如果那里的党，领导坚强正确，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经常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那末，就有可能不断地清除党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想情绪，使它不致形成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逆流，即便出现这种逆流，也能够及时地把它击退。

出现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一件坏事，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中，锻炼了自己，发展了自己，因而坏事就能变成好事。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①。

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大论战，使布尔什维克党锻炼成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这次大论战最伟大的政治成果。同时，这场论战还直接培育了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革命派，使他們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摆脱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统治，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共产党。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大论战，使联共（布）党更加巩固，保证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这就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这两次论战，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失败而告终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终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又会改头换面地钻出来。毒草既然要一茬一茬地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锄。不锄是不行的。斯大林说：“不同反列宁主义的流派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不战胜它们，我们党就一定会蜕化变质，就像第二国际那些社会民主党没有进行这样的斗争而蜕化变质一样。”^①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切违背历史规律、倒行逆施的人都在干着这种蠢事，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也不例外。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早就葬身于历史的垃圾堆里。继承他们的衣钵，步他们后尘的人，例如赫鲁晓夫之流，只会同他们得到一样的归宿。

千锤百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击败了很多敌人，今后也必将击败一切敌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敌人，不论来自什么地方，采取什么形式，耍什么花招，都逃不脱历史的惩罚。胜利终究属于真理，也只能属于真理。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多年前就说过：“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难道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挠？不能，不能，永远不能。

^① 《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第679页。

